

麻城文史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黄冈市

1706

麻 城 文 史

第 五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城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麻城文史》 内部资料 1996年11月

编辑出版：麻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开本：1/32
印 刷：麻城市印刷厂 印数：3000册 字数18万字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鄂黄图内字（1996） 第53号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麻城市工艺美术厂并题词

摄影：胡光前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中一镇棉花生产



江总书记接见麻城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干部



乔石同志视察盐田河板栗之乡



吴学谦同志视察长岭岗乡上畈村



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视察黄金桥开发区

摄影：胡光前



京九铁路麻城区段站

摄影：胡光前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京九铁路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吴信然在施工现场向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同志介绍京九铁路进展情况



曾蕙芳女士

目 录

来自北京 的关怀

江总书记在麻城……程胜利 郭方法 商义东 (1)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宋埠乡镇企业

…………… 屈迁生 董诗斌 (5)

永难忘怀的日子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中一镇棉花生产

…………… 刘泽良 (10)

情送农家

——记江总书记视察龟山乡花桥河村

…………… 周希仁 郭方法 (13)

委员长来到了界岭沟

——忆乔石委员长视察盐田河的板栗生产基地

…………… 胡法和 (16)

“吴组长”故地重游添新谊

老主席关怀备至爱麻城

——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来我市考察指导工作

…………… 何光咏 程胜利 (19)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

人士来我市考察…韩宗茂 夏玉郎 郭方法 (22)

领袖 与将军	毛泽东和许世友·····程仪(25)
	毛泽东和陈再道·····程仪(29)
大 京 九	我市隆重欢迎京九北京至深圳、深圳至北京 首发直快旅客列车·····程胜利 田胜辉(33)
	麻城至南昌581次旅客列车首发南昌 ·····程胜利 田胜辉(35)
	优质高速建设京九铁路阜九段,为麻城和沿 线地区经济发展作贡献·····吴信然(37)
	京九铁路麻城段简介·····沈红普(41)
市庆 欢歌	龟峰歌改革,京九颂辉煌 ——麻城建市十周年回顾···梅基金 朱青山(43)
爱国 一家	我所认识的曾惠芳女士·····王水姣(53)
历 史 回 顾	陈再道与武汉“七二零”事件·····李明 鲍帮林(56)
	我在麻南敌后抗战的一段经历·····刘永贤(66)
	处理一批救济物资的前前后后·····徐再先(77)
	砥柱中流 ——中共麻城县委创建麻城解放区斗争纪实 ·····梅光英(83)
	麻城惨案的前前后后·····白开基(99)
当代 风流	少年许世友·····何海波供稿(105)
	血沃商南肥劲草 ——记红32师党代表徐其虚烈士···胡梅兰(108)
	北伐将领王操如·····丁兴耀 李海咏整理(117)

人 物 春 秋	万古高风话毛玠·····刘 宏(119)
	风光旖旎留名士“绝假纯真”话秃翁 ——李贽与麻城·····范志斌(122)
	英王之妻与麻城·····祝和平(125)
	麻城旧县志总纂余晋芳·····王曙光(127)
	余佩澍事略·····余佩鸿(130)
	余佩笏事略·····余佩鸿(133)
	夏斗寅传略·····高卫华(137)
	顾敬之其人·····胡梅兰 李敏(151)
名人 轶事	梅之焕趣闻二则····· <u>王焕东</u> (163)
寇寇篇	智溺日寇·····罗文祥 罗学奎口述 黄昌益记录(167)
杏林 枝叶	从衡庐医话看胡衡甫先生的文学修养···胡金勇(169)
	家父程鹏远先生一生·····程敬顺(177)
	金针所至 十可九痊 ——记麻城著名针灸中医师王仲芳···王曙光(184)
鄂 东 史 话	楚吴柏举之战·····史智鹏(187)
	唐太宗李世民《题龟峰山》诗一首 ·····丁国安提供(189)
	跨上火箭篇·····郭沫若(190)
	张献忠在麻城东山再起·····刘 宏(191)
	太平军鄂东活动考述·····刘球记(193)

资料考辨	初访筷子巷……………丁国安(207) 《麻乡约》的由来与兴衰 ……………四川郑蕴侠 钟冲 蒋荣蓉 (209)
争鸣园地	道士塔……………余秋雨(223)
文艺天地	花挑简介……………黄家寿(231) 大别山区一奇葩 ——麻城东路花鼓戏……………宁永新(234)
编读往来	南京大学函……………(240) 武汉余品礼先生来信等三封)……………(241)
	政协麻城市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成 员名单……………扉页 编后……………(249) 《麻城文史》第五辑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252) 封面：白子秋荫线描……………吴礼安

来自北京的关怀

江总书记在麻城

(转载麻城报)

程胜利 郭方法 商义东

九月的麻城，园田翠绿，山青水秀，万物展示着勃勃生机。

正当麻城百万老区人民抢抓京九机遇，昂扬奋进打响“九五”扶贫攻坚战，彻底甩掉贫困帽子的时候，心系群众疾苦、心系老区人民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抱着“走京九，看扶贫”的热望，由安徽阜阳乘专列抵达京九六大编组站之一的麻城区段站，踏上了麻城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

9月18日上午8时15分，身着浅黄色衬衣的江泽民总书记，从麻城火车站，满面笑容地走出列车车门，步入1号站台。江总书记同在站台迎候的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和麻城市委书记陈定国、市长万桃元互致问候之后，乘坐面包车由麻城火车站向红安方向驶去。

下午3点15分，江泽民总书记一行不顾旅途疲劳，风尘仆仆驱车来到麻城市宋埠、中驿、龟山和麻城一中，进车间、下棉田、入农户、到学校，察看麻城扶贫开发情况，了解工人、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看望学校师生。

在麻城制动阀厂、湖北英联营养食品有限公司、麻城市工艺美术厂，江总书记仔细询问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情况，并到车间与工人们亲切交谈。江总书记对麻城依靠引进联合发展汽配工业，依托资源发展外向型、创汇型企业，提高扶贫造血功能的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还对在场的省、市领导说，国有企业关系重大，必须下决心抓好。

下午4时，江总书记一行来到中馆驿镇桃园村的棉田。江总书记看到一株株棉花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很是高兴，他轻轻抚摸着棉叶，同在场的市、镇领导谈起棉花的单产、收入和抗灾夺丰收等情况。总书记叮嘱陪同的省、市领导，要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当得知，麻城东部山区比较贫困，农民靠养蚕致富时，江总书记执意要去看看。

下午4时10分，江泽民总书记一行离开中馆驿镇，驱车由106国道抵达市区，然后顺胜麻公路到龟山乡花桥河村柳林河湾，先后到农民鲍家腾、鲍家伟家中看望。鲍家腾、鲍家伟做梦也没想到，江总书记竟成了家中的座上宾。在两位农民家中，江总书记亲切地同鲍家腾、鲍家伟交谈，询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养蚕情况，征询农民对发展蚕桑生产的意见，希望蚕农发挥优势，大胆闯市场。

当总书记看到鲍家伟家贴着一首“盛年不再来，一日难

再晨，即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人贵有志。人的一生全靠奋斗”的自励诗时，高兴地说：“老区人民就要有这种精神风貌。”

国家兴盛，教育为本，老区脱贫，教育先行。老区的教育情况怎么样哩？江总书记惦记着学校师生。下午 5 点 15 分，江总书记乘坐的面包车，穿过市区夹道欢迎的人群，徐徐驶进麻城一中。顿时，全校一片欢腾，神采奕奕的江泽民总书记走下面包车，微笑着向欢迎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并同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我市四大家领导和市一中领导握手和合影留念。

江总书记对陪同的省、市领导说：“老区发展的根本在教育，在培养人，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陪江泽民总书记到我市视察的中央和各部委办领导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农业部部长刘江、铁道部部长韩杼楦、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腾文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喜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雍哲、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贾延安、广州军区政委史玉孝。

贾志杰、蒋祝平、邓国政、徐师樵、刘荣礼、贾天增、刘友凡、蔡伦祥、李明波、陈定国、万桃元等省、市领导陪同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在我市考察。

下午 5 点 50 分，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带着麻城百万人民在红色土地上谱写的一份份满意的答卷，留下一茬茬激励、关怀的话语，意犹未尽地离开麻城。憨厚、勤劳、奋发向上的

麻城人民，从总书记视察中受到莫大的鼓舞，街道两旁自发前来夹道欢送总书记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和情不自禁的欢呼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感谢您，江总书记，您带来了党对麻城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宋埠乡镇企业

屈迁生 董诗斌

大别山南麓，举水河之滨，有座享有“小汉口”美誉的“楚天明星乡镇”——麻城市宋埠镇。她既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过去，又有着乡镇企业超常发展的今天。96年全镇乡镇企业发展到1899家，产值达12.5亿元，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0.8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200万元，农民人平纯收1618元。各项经济指标居全市首位。

1996年9月18日，是一个吉祥而又令人神往的日子，对于宋埠6万多人民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和鼓舞的日子。全镇街道上繁花似锦，彩旗飘扬，秩序井然，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们翘首以待，盼望着江总书记的到来。“江总书记来了，江总书记来了！”15点05分，江泽民总书记一行乘坐的面包车，在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依次驶进了宋埠镇的麻城市制动阀厂，身穿军绿色夏装的江泽民总书记，走下面包车，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同等待在此迎候的宋埠镇党委书记屈迁生、镇长董诗斌一一握手，互致问候。走进厂区，江泽民总书记边走边与陪同的该厂党支部书记李金秋攀谈起

来。“你们这个厂叫什么厂？”“叫麻城市制动阀厂。”

“生产什么？”“生产汽车刹车。”江总书记想了一会又问：“与一汽、二汽有协作关系没有？”“有”“跟主机配套各占多大份额？”“销售收入二汽占10%，一汽占5%”李金秋回答说：“我们的产品还销往南汽、杭汽和新汽。”

在精一车间，江总书记指着一台设备问：“这是不是你们自己改造的？”“是自己改造的。”李金秋回答说：“我们称它为电子数显系统。”江总书记满意地点着头。同时关切的问工人周剑波：“你进厂几年了？”“6年。”“啊！”江总书记握住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伸出大拇指和小拇指有力地晃动着说：“已6年啦。”“嗯”。

接着，江总书记又转身问李金秋：“你们厂有多少人？”“400人”。“年销售额有多少？”“年销售额为4000万元。”在总装车间，江总书记饶有兴趣地看着静特性试验台上摆动着的指针，以询问的口吻说：“是不是每个都试。”“是的，每项都试。”“对，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当总书记看到当班工人陶继新穿着印有“力美”字样的衣服时，亲切地问道：“这是不是你们厂的厂服？”“是的，这是印有‘力美’产品商标的厂服。”

离开总装车间，江总书记一行来到该厂产品展台前，参观了东风系列、解放系列产品样品。当总书记抬头看到玻璃窗内贴有省委书记贾志杰视察该厂的照片时，风趣地对贾书记说：“老贾，这上面还有你进厂的情影哩。”贾书记笑了起来。

走进毛坯车间，江总书记指着一台机器问身边的李金秋：“这些设备的性能如何？”李金秋回答说：“电脑控制，

性能很好。”总书记又问：“你们生产用的材料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们为珠江冶炼厂提供原料和化学成份表，让他们为我们炼出锌合金。”江总书记又指着一台机床问：“这台设备是不是今年买的？”“不是今年买的，已经用了两三年。”“你们的设备保养水平还挺高的吗！”

江总书记边走边看，边问边谈。“江总书记，请你为我们厂提几个字吧。”“好的，我来签个名。”江总书记欣然应允李金秋的请求，兴致勃勃地挥毫泼墨签字留念。

临别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高兴地握着屈迁生、董诗斌的手说：“你们有这么好的乡镇企业很不错，了不起。”

离开麻城市制动阀厂，江泽民总书记一行又驱车前往湖北英联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考察。穿过干净清新的厂区，江总书记走进车间察看了生产工艺流程。在产品实验室，江总书记看了实验程序和数据后，同公司董事长汪宗德亲切地聊了起来：“你们厂是个合资企业吧？”“是的”。“是哪个国家投的资？”“英国”。“对方投资多少？”“35万美金。”江总书记又问：“厂里今年创汇多少？”“去年创汇300万美金，今年可创汇500万美金。”“效益不错嘛。”

接着，江总书记说：“你们生产出口浓缩蜂蜜主要选哪几种花蜜？”汪宗德回答说：“主要选用紫云英、槐花、油菜、荆条花蜜。”“这些花蜜是哪里产的？”“都是我们大别山区产的，有几万农户依靠养蜂脱了贫致了富。”“好哇！”江总书记高兴地说：“你们将资源型企业发展成为外向型企业，通过生产加工促进了农业，带富了贫困户，不简单！”

走出实验室，江总书记来到产品展示厅，目睹了琳琅满

目的产品样品。他俯身看着一个商标上的日文，用日语读了起来。“不错不错。”江总书记高兴地说：“这是中国输入蜂蜜，是你们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样品。”最后，江总书记满怀激情地为该公司签名留念。

与湖北英联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这个甜蜜的事业交相辉映的是工艺美术厂彩纸灯笼赚洋钱的工艺。当江泽民总书记一行走进二楼生产车间时，受到厂长段青松和工人们的热情欢迎。

江总书记热情地向工人们招手致意。他边走边看，兴趣十足。这时，陪同考察的温家宝同志问厂长段青松：“你们一年出口创汇多少？”段厂长回答说：“一年创汇140多万美金。”江总书记调过头来接过话茬说：“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总书记接着又问：“出口到哪些国家和地区？”

“主要出口到欧洲、德国和荷兰。”“是不是阿姆斯特丹那个荷兰？”“是的。”段青松回答说：“我们主要靠手工密集型的劳动。”“这个活外国人做不了。”江总书记恳切地回答道：“这是工艺品，只有我们能做。”

在一个加工台板前，江总书记和蔼地问工人熊金枝：

“你一月拿几多工资？”“四五百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干了几长时间？”“干了10年。”

“你原来学过没有？”“进厂时学了两年。”“你是不是干部？”“我不是干部，但我比干部的待遇还要高哩。”总书记和工人们一起开心地笑了。视察生产车间之后，江总书记问段青松：“产品内销过没有？”“几乎没有。”“为什么哩？”“主要是内销卖不起价，出口价值高。”“啊，是这样。”走进成品展厅，江总书记立即被大大小小、五光十

色、新颖别致的纸质彩灯所吸引，情不自禁地说：“啊，很好看，很好看。”这时，段青松迫不及待地对江总书记说：

“江主席，请您为我厂题题字吧。”兴致正浓的总书记恳切地说：“我要题的，我要题的。”“这个最好看。”江总书记高兴地问：“这是什么灯？”“这是太阳灯，这是月亮灯。”“啊，这是太阳灯，那是月亮灯。”“总书记，送给您一对作个纪念吧？”江总书记笑着摇手连声说：“不用啦，不用啦！”

看完展厅，江泽民总书记兴高采烈地提笔挥毫为该厂签名。下午3点50分，江总书记一行在宋埠人民的热烈掌声中离开了宋埠，但他给宋埠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宋埠人民奔小康，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和莫大的鼓舞。

一九九六年十月

屈迁生：中共宋埠镇委书记

董诗斌：宋埠镇镇长

永难忘怀的日子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中一镇棉花生产

刘泽良

九月十八日，对于我和中驿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而永难忘怀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带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带着对棉农的深切关怀，带着对基层干部的殷切期望，来到我镇桃园村，深入棉田，实地察看了我镇棉花生产。

下午四时整，视察车队到达我镇桃园村的棉田边。车刚停稳，江总书记便步伐稳健地走下车来，他面带微笑，神采奕奕。等候在此的干部群众立刻欢呼起来：“江总书记来啦！江总书记来啦！”我站在欢迎的人群中，浑身似有股暖流通过，顿时热血沸腾。惊喜、兴奋、激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是随着人们欢呼。省、市领导把我介绍给总书记，总书记伸出温暖的双手和我感动得有些颤抖的双手握在了一起。当党的总书记和我这位共和国最基层党委书记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心中的那份感动，那份激情真是难以言表。握着总书记的那双温暖、巨人般的双手，望着总书记亲切慈祥的面容，我感受到了总书记的厚望，感受到了自己肩负

的重任，暖流涌上心头，热泪湿润了双眼。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只知道一个劲地说：“总书记，您好！”总书记连声说：“好，好！”，便径直走向棉田。

在参观的棉田里，我有幸始终站在总书记的身边，亲身感受到总书记对老区人民，对广大棉农的殷殷深情。总书记看到满畝的棉树郁郁葱葱，结满棉桃，显得格外高兴。他指着棉田问：“每亩能产多少斤？”我回答说：“每亩产量在250斤以上。”总书记露出满意的笑容，说：“不错，不错”。总书记抚摸着—株棉树接着问：“每株多少桃？”，我和在旁的副市长陈远亮同志异口同声地答：“每株30个桃，每亩3000株，能产9万个桃”。总书记听后微笑着点了点头。总书记对植棉技术也非常关心，他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象湖南那样做钵育苗？”我连忙回答：“是的，我们全部都是营养钵。薄膜覆盖，麦林进钵。”总书记笑着连说了两个“好”字。总书记还详细询问了棉花生产过程，农业抗灾情况，种棉、种粮的比较效益，农民种棉的积极性等问题，并叮嘱随行的省、市领导，一定要保护农民种棉种粮的积极性，总书记对每个问题都问得那样仔细，那样认真，对我们基层干部又是那样的和蔼，那样的平易近人，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全都装在他那博大的胸怀里。

视察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在总书记身边多站一会儿，可是，繁忙的工作在催促着总书记启程。临上车前，总书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书记呢？”我赶忙迎上去，再次同江总书记握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幸福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在短暂而繁忙的视察

中，把我这样一位普通的基层党委书记放在心中，叫我怎不万分感动，无比荣幸！这不正体现了总书记对基层干部的重视、关怀、慰问和厚望吗？

江总书记视察我镇虽已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我的心仍难以平静，总书记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总书记的深切情怀，一次又一次地令我兴奋不已。激励我要努力工作，把江总书记的关怀化作无穷的力量，团结全镇广大干部群众，把中驿镇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日

刘泽良：中共中馆驿镇委书记

情 送 农 家

——记江总书记视察龟山乡花桥河村

周希仁 郭方法

9月18日，微风吹拂翠绿的桑林。下午4点30多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乘坐的面包车，徐徐驶进风景如画的龟山乡花桥河村柳林河垸。

当身着黄色军夏装的江总书记神采奕奕地走下汽车，等候在垸头的乡亲们顿时欢呼起来。江总书记微笑着不停地鼓掌、挥手。江总书记健步走过荷塘岸，来到农民鲍家腾家中。鲍家腾握着江总书记的手，显得有些紧张地请江总书记坐。江总书记拉着他的手笑着说：“同坐，同坐。”江总书记坐下后，抱起家腾的小女儿鲍玲，同家腾拉起了家常。江总书记问家腾全家几口人，小孩在哪读书，家中主要经济来源靠什么，年收入有多少，鲍家腾一一作了回答。鲍家腾说：“这全靠党的政策好。”总书记说：“党的政策总是希望农民越来越富强。农民要富起来，还要靠实干。”当谈到养蚕时，江总书记起身走进鲍家腾的养蚕室，他仔细地看了竹羌上的蚕问鲍家腾的爱人魏国花：“这蚕有多大了？（指龄期）”魏国花说：“刚好一个星期。”江总书记又问：“到产茧有多长周期？”在一旁的周希仁同志介绍说：“一般40多天就产茧。”江总书记点了点头，伸手拿了一撮已切细的

桑叶，边轻轻地撒叶喂蚕边笑着说：“我小时候也养过蚕，那时还是小学生。”听着江总书记风趣的话语，大家都放声地笑了。走出养蚕室，江总书记又转身面向屋内向主人打招呼，并与魏国花握手告别。

走出鲍家大院，江总书记连连微笑着向聚集在小巷中的乡亲们鼓掌、挥手。出了巷口，他不顾劳累，又健步走上坡度很陡的7级台阶，来到农民鲍家伟门口。鲍家伟8岁的女儿鲍圆跑出门，向江总书记敬了个队礼，用稚嫩的普通话说：“江爷爷好！”江总书记弯腰拉着鲍圆的手说：“好，好。”走进堂屋，江总书记让鲍家伟、毛春秀夫妇及孩子坐在自己左右。毛春秀觉得在江总书记的上首不好意思，江总书记说：“坐吧，坐吧！”江总书记问坐在身旁的鲍家伟：“养蚕有市场价格、供需关系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你的，你感觉有什么办法来解决。”鲍家伟说：“我们还是不放松养蚕，我们发展的劲头很足，技术上精益求精。”听到这里，总书记高兴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连连点头，当江总书记得知鲍家伟搞家电维修，便问：“搞了多少年，损坏了的收音机、电视机能不能及时修好？”鲍家伟很自信地说：“已干了17年，坏了的能及时修好。”江书记笑着说：“我和你还同个行哩。”听着这亲切的话语，满屋人都开心地笑了。

接着，江总书记起身看了看停在堂屋边的摩托车，用手摸了摸车把、车座，问是什么牌子，多少钱，鲍家伟回答说：“是太阳牌A型，不到8000元。”有人告诉总书记，鲍家墙上有二幅“座右铭”，总书记抬头看去，上面写着“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即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人贵有志。人的一生全靠奋斗”一段话，总书记连连称好，说：“老区

人民就要有这种精神风貌。”

满屋的人都热烈鼓掌致意。江总书记说：“好，写得好。”

时针快近5点，江总书记要离开鲍家。毛春秀拉着江总书记的手说：“欢迎江总书记再来，再见！”江总书记笑着回答：“再见，再见！”江总书记走下台阶，乡亲们鼓掌相送。江总书记和几位农民一一握手，然后走上汽车，再次向乡亲们挥手。

汽车启动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目送江总书记的汽车渐渐远去。

（转载麻城报）

周希仁：中共麻城市龟山乡党委书记。

郭方法：《麻城报》记者。

委员长来到了界岭沟

——忆乔石委员长视察盐田河乡

的板栗生产基地

胡 法 和

那是1990年10月13日的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乔石同志，视察大别山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来到了盐田河板栗生产基地——界岭沟。

那年天气暖和，虽已是深秋，界岭沟依然是郁郁葱葱，到处充满生机。上午9时许，乔石同志在省委书记关广富、地委书记杨祖炎、行署专员刘荣礼、麻城市委书记黄远志、市长周祈江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界岭沟。车刚停下，身材魁梧的乔石同志身着灰色中山装，从前面的一辆中巴车走了出来。我和时任乡长的刘兴田连忙迎上前去。乔石同志一面听黄远志同志的介绍一面握住了我的手，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黄远志同志示意我们边走边谈。我随着乔石同志沿着山沟公路向前走，他侧过脸问我：“书记，今年多大了？”“家住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爱人在干什么？”“这地方为什么叫盐田河？”语调里充满了长者的关怀。我一一回答完乔石同志的问话，紧张感觉消失了，话语也流畅了。

乔石同志接着问起了扶贫工作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我向他汇报说，这几年盐田河乡的群众算遇上了好光景，一是党中央的扶贫开发，为我们发展山区经济，脱贫致富，订了一个好政策；二是政府的“棉布赊销”，解决了大批群众的生活困难；三是各级领导经常来指导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光是省里就给了100万元的周转金，还为我们免了6年的农业税，这为我们的山区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机遇。

乔石同志边听边点头，说：“这里群众的主要收入靠什么？”

我指着前边的山说，主要经济收入都在山上，我们这里耕地少，种田地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大力发展板栗生产，收到显著的成效。一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先是房前屋后，田头地边，再是连片山林，凡是能栽板栗的地方我们都栽上了板栗，现在最少的家庭也有十几棵板栗树。二是省里、市里先后派来了不少专家、技术人员，指导生产，板栗的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三是市场价格一直看好，前几年每斤板栗只能卖到0.5元，现在能卖到3元，所以这几年群众收入成倍增长，大部分农户已经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盐田河的板栗产量高、质量好，产品在市场上很俏销。我们还是“全国板栗第一乡”呢。

听完我的介绍，乔石同志停下来，激动地说：“了不起，了不起，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就是要走这样的路。”接着他又关切的问：“全乡的情况都一样吗？”

我回答说，不一样，我们在发展经济林时，采取的是低山种板栗，中山种杉树，高山种松树、油茶，由于地理气候的差异，高寒山区群众的收入还很低，虽然这几年有了很大

改变，但脱贫的任务还很大。

乔石同志感兴趣地说：“你们这种分层次开发的办法好，就是要因地制宜，只有这样，我们的扶贫工作才会有实效。”

乔石同志还详细地了解了社会治安的情况。他强调，农村治安工作的重点是要教育农民，要在农村开展普法教育，让老百姓懂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乔石同志最后还询问了基层组织的干部队伍情况。他特别指出要加强后进支部的建设，增强支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我们边走边谈、时停时走，不知不觉走了500多米远。乔石同志始终兴致很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两次向他提醒时间，他都摆摆手，表示不要紧。当工作人员第三次提醒他时，他用商量的口气说，“大家能不能照张像？”照像时，我把省里来的领导往中间推，乔石同志却拉住我说：“你来，你来，我和他们经常见面。乡长呢？乡长呢？”我招呼来乡长，我们一左一右地站在乔石同志身边，和随来的领导一起，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纪念。

短短的十几分钟过去，日理万机的乔石同志实在太忙了。上车前他和我们一一握手，车临行时，他再一次把我叫过去了，和我握手道别。握住乔石同志温暖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什么也没说出来，从他那慈祥的目光里，我体会到了那份情意，那是关心，那是鼓励，那是期望。

胡法和，原任盐田河乡党委书记，现任麻城市农委副主任

“吴组长”故地重游添新谊

老主席关怀备至爱麻城

——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来我市考察指导工作

何光咏 程胜利

5月8日至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在省政协副主席袁照臣、地委副书记刘友凡和地区政协联络组组长杨春生等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我市考察指导工作。

1964年9月至1965年2月，吴学谦同志曾作为中央“四清”工作组成员，在我市长岭岗乡上畈村库家前垅工作了半年时间。30年来，吴老一直惦念着麻城这块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8日下午，吴学谦副主席不顾长途跋涉之疲劳，在省、地、市领导的陪同下，健步走上市区街头，先后到鼓楼集贸市场、新建街和麻城大礼堂等地参观视察。在市大礼堂，吴老深情地摸摸木座椅，记忆犹新地说：“我曾在这里开过会和看过戏。”

下午3点，吴学谦同志满怀激情地驱车到阔别30年的长岭岗乡上畈村库家前垅，看望乡亲，共叙旧情。库家前垅的上百名群众，听说当年的吴组长特意来看望大伙，激动得彻夜未眠。当吴老走下汽车时，外面早已等候着自发相迎的群众。吴老一眼就看出了站在最前面的两位老汉，高兴地说：

“你就是库元友，你就是库流润是不是？”“是的”“库成方和库元明呢？”，“他俩都去世了。”

吴老同年长的村民们边走边交谈，并到老房东库流润和库元友家登门看望。详细询问了全垸的生产、生活情况，勉励群众抓住京九铁路建设的机遇，发展建材等村组企业，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吴老还应邀同老房东库元明的儿子库流安、库成方的女儿库元香合影留念。临别的时候，吴老紧紧地握着库流润和库元友的手，激动地说：“过去，我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就想着你们，只是事务繁重、身不由己，不能来看望你们，今天才实现了这个愿望。再过两年，京九铁路通了，我们可以常来常往，并接你们到北京做客……”离开库家前垸，吴学谦同志一行，又到长岭岗乡政府，听取了乡党委、乡政府的情况报告。

9日上午，吴学谦同志在市委二楼会议室，听取了市委副书记、市长万桃元，代表市委、市政府所作的情况汇报。吴学谦同志说：“这次来麻城，了却了一个心愿。我们看到的麻城比想象中的麻城强多了，麻城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是变化是巨大的。农村住上了砖瓦房，有的还住上了楼房，厨房贴瓷砖，家家户户眉开眼笑，这说明老百姓变富了，对现行政策是满意的。下一步，麻城应该抓住京九铁路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制订和实施依托铁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规划，做到先急后缓，该做、该办的事情要快办和办好。要注意抓好教育，培养人才。要开发土特产资源和旅游业，比如枸杞可形成系列，将来可以上火车。旅游方面，我回去后，将组织专家学者前来考察，寻求合作伙伴。总之，麻城只要抓住铁路建设机遇，全面振兴地方经济是大有希望

的。”

上午10点，吴学谦同志还到铁一局京九铁路制梁场、麻城火车站、黄金桥科技经济开发区、台湾街等地视察。

吴学谦同志在麻城期间，亲切接见了我市四大家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万桃元、柴敦善、胡超、冯福贤、娄永欢、梅基金、李蔚青、何正明、郑科元自始至终参加接待并陪同考察。

（转载麻城报）

何光咏：长岭岗乡乡长

程胜利：《麻城报》记者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 和无党派人士来我市考察

韩宗茂 夏玉郎 郭方法

5月20日，麻城市城区，风和日暖。喜气洋洋的老区人民迎来了来自首都北京的客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雷洁琼、王光英、程思远、吴阶平，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钱伟长、万国权和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等140人组成的考察团。

这次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大型考察团，是经中共中央批准，专程到麻城市考察老区建设和开发情况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满怀深情地说：“麻城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是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来到这里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一直十分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和建设。”

来自首都北京的考察团领导到达我市后，不顾年迈体弱，兴致勃勃地参观考察，听取汇报，不停地向陪同的省委书记贾志杰、麻城市委书记陈定国询问情况。老区的建设发

展牵动着他们的情感，老区人民的冷暖挂在他们的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里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还不够快。各民主党派中央希望能为老区经济振兴出力献策。今天我们到麻城，有了亲身的感受，为参政议政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老区的发展和扶持更尽一份心，多出一份力。”当他们得知黄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麻城借铁路机遇，发展老区经济而兴建的省级开发区时，一致称赞做得好，同时表示要向海外经济界人士介绍，动员海外人士到这里投资建设。

大别山火力发电厂是麻城及周边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希望，已经列入湖北省“九五”计划，并由电力工业部向国家计委提交了“项目建议书”。麻城人民盼望早日立项建设。考察团领导郑重地记下了这一要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说：“我们考察团回去以后，要就老区的发展建设问题，认真地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做到知情出力。”

麻城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绩都令考察团领导高兴。由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题名的台湾街，是麻城市委市政府为调动800名去台人员及其2万名亲属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而兴建的。如今已有380户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吸引台资近700万元。蔡子民主席今天身临其境，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亲手把他扶到前排就座，听取台湾街建设的情况汇报。

具有光荣历史的麻城一中，革命先辈董必武曾在这里讲学，著名将领王树声曾在这里就读。它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建设人才。如今，美丽的校园与高素质的教育相得益彰。

彰，令考察团领导欣喜不已。考察团一行打破预定安排，情不自禁地走向教室，与老师和学生们亲切交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说：“麻城一中以育人为本，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这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要举措。”

麻城目前经济发展缓慢的状况引起考察团领导的极大关注。当他们了解到全市有9万多人没有解决温饱时，心情特别沉重，当即向省市领导提出加快老区建设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徐采栋着重提出：“要进一步改善融资环境，多方面疏通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的外资。”

考察团还向麻城敬老院捐赠了30万元建设资金和一批电脑、图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落实一些支援老区建设项目，虽然数额不大，但代表了考察团为革命老区作贡献，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一点心愿，尽了绵薄之力。”

京城、麻城，遥隔千里，但是开发建设老区的共同目标，把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同老区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

（转载麻城报）

领袖与将军

毛泽东与许世友

程 仪

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南巡乘专列抵达上海。这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狗急跳墙，正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谋杀毛泽东的罪恶行动。毛泽东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已经觉察到了某种不正常的气氛。他到达上海后，立即命令随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火速飞来上海。第二天清晨，许世友乘专机飞抵上海。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许世友和上海市及东海舰队的负责人，而把那个负有刺杀毛泽东任务的林彪死党王维国抛在一旁。同许世友等人交谈之后，许世友又立即飞回南京。在许世友等人离开后，毛泽东突然命令列车启动北返，打乱了林彪死党策划的暗杀阴谋。

许世友，1906年出生在麻城县的乘马岗许家寨，后来这块地方划归河南省新县，但许世友不管这些，他一直认为自

己是湖北麻城人。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许世友，在青少年时代就有着许多传奇的故事。他为生活所迫，曾出家到少林寺当过小和尚，在那里学得一身好武艺。他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义勇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以南会师，这时，许世友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两支主力红军会合后，混合编队，许世友的第四军编入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率领。大概就在这时，许世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的率领下，继续北上，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跋涉，走上了荒无人烟草地，到达四川的班佑、巴西地区。这时，敌胡宗南发现我军经草地北上，派一个团控制了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包座。为了打开北上通道，必须消灭包座守敌，许世友率第四军投入了包座之战。乘着天黑黄昏，许世友指挥部队以迅速的动作逼近求吉寺，突然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很快拿下了外围几个据点，乘势突入寺院。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也攻占了包座。

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在胶东半岛战斗八年，威震山东。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打了许多硬仗，其中包括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1953年许世友率部队出国赴朝，打击美帝侵略者。1955年4月，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

转眼到了1967年夏天，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全国形势一片混乱，许多老干部被罢官、批斗。许世友也在

劫难逃，家被抄了，警卫员也被赶走了。许世友被迫转移到安徽省金寨县的部队农场。这时，毛泽东巡大江南北，来到了上海，许世友听说后，立即叫妻子田普亲往上海送信。毛泽东看了信，问随同巡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许世友在哪里？”

“在大别山里！”

“许世友是个大军区的标兵，”毛泽东对杨成武说，“打倒许世友，其他几个大军区的，例如，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不都要被打倒吗！许世友不能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接来吧！”毛泽东对这一批跟随他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领是深有感情的。

许世友从金寨到上海，一下飞机就去见毛泽东。这位性情豪爽，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将军，一见到毛泽东就哇地哭了起来，说不出一句话。毛泽东安慰他：“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掌握好，你要靠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好好干。”许世友破涕为笑，大声回答：主席，你放心，我有几个军，敌人来它几十万，我也能够打垮它。”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四人帮”又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对许世友等曾跟随他南征北战、经过严重考验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寄予殷切的期望，不断地给他们以启示。1973年12月，全国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调动时，毛泽东接见了各大军区的负责人。步入会场后，毛泽东发现许世友坐在后排，他特地把许世友叫到前排。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

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许世友事后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大家看《周勃传》呢？他找了《汉书》看，才知道原来周勃跟随刘邦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汉朝，后来吕后的私党诸吕要篡汉夺权，周勃等人把诸吕消灭了，保卫了刘汉王朝的江山。许世友看到这里，很快明白了，毛泽东是要他们这些老干部担负起保卫我党我军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重任，防止有人篡党夺权。

毛泽东对许世友给予最大的信任，同时也从培养提高的目的出发，鼓励他保持优点，发挥长处，通过学习，弥补不足。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经常指点教育，还多次勉励许世友学一点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1973年12月的那次接见中，毛泽东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的中文合印本交给许世友，要他转交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嘱咐许世友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还问他：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答看了。毛泽东又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毛泽东还说：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

《红楼梦》，你们搞武的也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许世友的健康。1971年冬天，许世友犯了肠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和李德生召见许世友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周总理亲切告诉她：你父亲病了，毛主席很关心，让我们转告你父亲，要注意治疗，好好休息。许世友听了女儿的转告，激动得热泪盈眶。

（转载《黄冈日报》）

毛泽东与陈再道

程 仪

陈再道，1909年生于湖北麻城，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戎马半生，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对陈再道这个放牛娃出身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毛泽东一向是关心和爱护的。早在1952年10月，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住在开封。有一天，毛泽东视察黄河，路经开封，要停留几天，陈再道负责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当时开封条件很差，陈再道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居住，他临时住在毛泽东下榻附近的房子里，经常去看毛泽东。这是陈再道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在一次又一次的交谈中，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陈再道的家庭、出身、经历和工作、毛泽东听了陈再道的回答以后，情不自禁地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可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毛泽东还对当时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要求陈再道在做好军区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地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还特地嘱咐，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5年陈再道调武汉军区工作。1956年6月毛泽东来到武汉。这一次毛泽东在武汉三次横渡万里长江，兴致勃勃地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陈再道不爱读诗词，但对毛泽东这首词，他读了又读，记住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名句。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陪同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游览长江，陈再道和省里的负责同志，也陪同他们登上了汽艇。毛泽东看见陈再道来了，就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通过身边一位翻译转述，蒙哥马利同陈再道握手，毛泽东又接着介绍：“他是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蒙哥马利听了毛泽东的介绍，使劲地摇晃着黄再道的手，注视的目光中带有钦佩和惊异。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陷入混乱状态。陈再道在武汉军区受到冲击，日子不好过，毛泽东决定亲临武汉，解决问题，出发前他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4日早晨，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当晚，毛泽东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住进了东湖宾馆。

1967年春夏期间的武汉，形势混乱不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造反组织动辄挑起武斗，制造事端。武汉军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行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军区“支左”方向问题的争论，由争论而引发的矛盾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

参与变得更加复杂化。毛泽东来武汉后，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开会，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的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带着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梅岭一号，毛泽东正在客厅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场。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好，显得很热情，一见陈、钟到来，就站起来同他们握手，并让他们坐在他的旁边。

这天晚上，陈再道思想转不过弯来，不承认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则显得很轻松，对陈再道耐心劝导。他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当陈再道说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马上在大会作检查时，毛泽东说：那可不行，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陈再道担心在那种情况下军区做工作起不到作用，就要求中央文革出面说话。王力认为这是陈再道“将”他的“军”，满脸不高兴，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毛泽东听明白了陈再道的意思，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要被打倒的，致于做工作那更是不可能的。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泽东沉静片刻又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泽东的这番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稳定局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都按照这番话去做，武汉的形势是会逐步好

转的。然而，由于谢富治、王力等人阳奉阴违，当着毛泽东的面点头称是，后来不仅不去落实，而且故意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这就造成武汉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这天晚上谈话之后，毛泽东很客气地把陈再道、钟汉华一直送到走廊上，在走廊上正巧遇到几位服务员，毛泽东就招呼他们过去，要他们同陈再道一一握手，并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他又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在周恩来当晚返京之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月20日，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在陈再道制止无效之后，拉走了王力。武汉地区的群众在这一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七·二〇”事件以后，陈再道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在这危难关头，毛泽东在批阅中央给武汉军区的复电中，亲笔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这段经毛泽东批阅后的电文是这样写的：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正是毛泽东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才使他在一生中最严酷的时候免于死。

（转载《黄冈日报》）

大 京 九

我市隆重欢迎 京九北京至深圳105次 深圳至北京106次首发直快旅客列车

程胜利 田胜辉

1996年9月2日上午，麻城二级火车站彩旗飘扬、鼓乐齐鸣。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南昌铁路局领导及红安、罗田、英山、大悟、新县等兄弟领导和数万名群众，汇集麻城区段站喜迎京九首发列车。

8点01分，由北京西站至深圳的105次直快旅客列车准时进入麻城区段站，顿时全站人声鼎沸，一片欢腾。市领导陈定国、万桃元、成昌平、李蔚青等走上站台，同随车的铁道部领导、特邀嘉宾和下车乘客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热烈欢迎他们途经麻城。市领导还同江忠长等从首都乘坐京九首列车到我市的麻城籍3名旅客一一握手，祝贺他们成为京九第一列火车上的乘客，并为搭乘105次列车到深圳的10名麻城籍旅客送行。

1996年9月2日20点05分，由深圳首发北京的106次全程空调直快旅客列车，在喜庆的爆竹声和悦耳的锣鼓声中徐徐

开进麻城区段站。市委副书记刘志江、副市长王水姣在一号站台上同上万名群众一起，热烈欢迎随车领导及乘客，并在京九106次荣誉旅客簿上签字留念。李凤春等5名麻城旅客由深圳抵达麻城，易世孝等20名旅客幸运登车北上。

京九铁路于1993年初拉开建设帷幕，总投资近400亿元，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一次性建成线路最长的大干线。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的98个市县。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包括同期建成的天津至霸州和麻城至武汉的两条联络线在内，全长2553公里。京九铁路跨越麻城市西张店、顺河集、罗家铺、王福店、浮桥河、南湖、中一、白果、铁门、宋埠、歧亭等12个乡、镇、办事处、途经66个村、264个自然垸，全长为84.46公里，境内设西张店、罗铺、麻城、白果、宋埠4个火车站、预留中一、歧亭两站。是京九沿线铁路跨越里程最长的县市之一。

京九铁路于9月4日正式交北京、郑州、济南、上海、南昌铁路局和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管理。营运初期，新增直通旅客快车5对，货运开行图定货物列车20对，其中，麻城区段站每天接发直通旅客列车4趟。北京至深圳105次列车每天8点01分进麻城站，8点11分发往深圳，麻城至深圳票价为每张125元，深圳至北京的106次列车，每天18点35分到麻城站，18点45分发往北京，每张票价109元。

（转载麻城报）

麻城至南昌581次 旅客列车首发南昌

程胜利 田胜辉

1996年9月2日清晨，京九铁路十大站之一的麻城区段站盛况空前。联结大别山和井冈山革命老区的麻城至南昌581次旅客列车首发仪式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上午6点10分，南昌铁路局麻城临管处主任王兴汉宣布：“京九铁路麻城至南昌581次客运列车首发式现在开始。”接着，麻城市市长万桃元、京九铁路阜九指挥部总经济师李泽佑、南昌铁路局副局长龚道增先后讲话。对581次旅客列车由麻城首发南昌表示热烈祝贺。李泽佑、龚道增、陈定国、万桃元、成昌平、李蔚青兴致勃勃为581次首发列车剪彩。

6点30分，麻城火车站站长方干军跑步上前向中共黄冈市委常委、麻城市委书记陈定国报告说：“麻城至南昌581次首发客运列车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发车时间已到，请下达发车命令。”

陈定国看着手表正好是6点30分，果断地下达了：“581次现在发车！”的命令，列车长按下启动电钮。麻城至南昌581次旅客列车，在震耳欲聋的锣鼓鞭炮声中，鸣笛纳号徐徐驶出麻城区段站。

据了解，麻城至南昌581、582次对开旅客列车，由北

往南途经麻城、白果、新洲、淋山河、黄州、朱店、浠水、横车、蕲春、栗山、蔡山、孔垄、庐山、马回岭、德安、共青城、军山、杨家岭、永修、新祺周、乐化、南昌北、南昌等21个火车站，跨越湖北、江西两省，全长达358公里，列车在途行驶时间为10个半小时。麻城、南昌两站始发时间分别为每天上午6点30分和6点20分。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出席581次旅客列车首发式。红安、英山、罗田、大悟、新县等兄弟县领导应邀参加首发式，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转载麻城报）

优质高速建设京九铁路阜九段 为麻城和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作贡献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
阜九铁路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吴信然

1996年11月7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沿线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拼搏，京九铁路阜阳至九江段胜利建成，于1996年8月31日18时交付运营，提前实现了“三年铺通，一年配套”的预定目标。

—

阜阳至九江段（含武汉联络线）位于京九铁路中段，全部是新线一次建成，穿越安徽、河南、湖北、江西四省18个县市，全长544.366公里，其中正线461.902公里，武汉联络线82.464公里。建设单位是铁道部京九铁路建设办公室，设计单位是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和大桥局勘测设计院。施工总承包单位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参建单位有铁道部第一、四、五、工程局、大桥局、电化局、四院承包公司和武汉铁

路工程总公司。高峰期施工人数达4万余人。

主要工程数量及完成投资情况：路基土石方6638.09万立方米，桥梁236座36225.71延长米，隧道5座3345成峒米，房屋994栋35.75万平方米以及通信、信号、电力、给排水等工程。截止1996年8月累计完成投资85.5亿元。

二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高度重视京九铁路建设。为了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组织领导，在麻城设立了阜九铁路指挥部，总经理陈效达同志亲任指挥长，副总经理吴信然同志任常务副指挥长。挑选了总公司系统最精锐的队伍和最精良的设备投入阜九铁路大会战。阜九段是1993年1月30日正式开工的。在铁道部党组关于京九铁路“奋战三年、铺通全线”总目标的指引下，阜九段施工以“创四个一流”为目标，强攻硬上，顽强拼搏，精心组织，科学施工。1993年重点突击路基和桥隧涵工程，首战告捷；1994年基本完成线下工程，6月站后工程全面开工，9月开始铺架，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1995年进行铺架施工总决战，9月29日提前双线铺通，12月31日实现分流运输；1996年全力以赴投入房建、通信、信号、电力等配套建设，于8月31日建成并完成现场交验工作，胜利实现了“9.1”投产运营的目标。

阜九铁路会战始终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广泛开展了“立功创模”、“阜九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多种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各项任务的完成。通过培育和发扬“爱国、奉献、拼搏、进取、求实、协作”的京九精神。激励广大职

工奋发向上、建功立业，全线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涌现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技术干部和管理人才，锻炼了一支能打硬仗的“四有”职工队伍。

京九线阜九段大会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亲临现场视察，国务院有关部委、沿线各省、市、县各级政府及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尤其是麻城市党、政各级领导及人民群众，表现出革命老区所特有的奉献精神，象当年支援革命战争一样支援京九铁路建设，在征地拆迁、施工住房、水、电和地材供应、生活供应、治安联防等方面都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做出了无私的奉献。铁路施工单位本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处处注意保护群众利益，节约用地，修桥补路，平地造田等等，努力为当地群众办好事，干实事。可以说，京九铁路的胜利建成，是路地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晶，是一曲路地携手共建的凯歌。

三

阜九铁路施工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第一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科学管理、文明施工，以“保部优、创国优”为目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质量创优活动，收到显著效果。经过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共同努力，使阜九会战做到了“快速、优质、安全、高效”。合格率100%，优良率达到90%。有15座特大桥和29座大桥被评为优质样板工程，28个区间站前工程被评为大段落优质样板工程。站后施工中又有房建及“三电”等46项工程被评为创优样板工程。

在线路方面，裂上路基提高了基床密实度等级，软土地基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进行加固，路基工程采取各种形式的防护措施，几年来，经受住了多次灾害性暴雨和洪水的考验。轨道采用大型机械化养道，首次开行的旅客列车时速即达60公里，这是铁路新线建设史上的第一次。桥梁工程的质量，内实外美。隧道施工推行新奥法等新工艺，做到了隧道无渗漏。站后工程大量采用了新技术和新设备，站房选用一站一景的个别设计，新颖别致；通信采用了光同步数字传输设备和程控电话交换系统，信号工程采用了带超速防护的18信息集中移频自动闭塞，代表了国际上九十年代先进水平。

前不久，江泽民总书记乘京九铁路列车到麻城视察，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江总书记指出，京九线建成通车，将有力地带动中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发展。我们相信，江总书记的预言一定会实现，因为中央的扶贫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有了京九铁路，加上中央扶贫政策的落实，麻城的经济发展一定会驶上快车道。衷心祝愿麻城人民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发挥自己的优势，把工业、农业、能源、交通等建设尽快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麻城市建设成大别山区一颗璀灿的明珠！

京九铁路麻城段简介

沈红普

举世闻名的京九铁路是我国又一条南北铁路大干线。其正线从河南新县进入麻城市，途经西张店、顺河集、王福店、罗家铺、浮桥河、南湖、中驿、铁门、白果等乡、镇、街道办事处，进入新洲县。京九——京广联络线在麻城站接轨，经中驿、宋埠、岐亭进入红安县。京九铁路贯穿麻城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库，66个村，352个村民小组。全长88.4公里，其中正线58.5公里，联络线29.9公里。在麻城境内设麻城区段站及西张店、罗铺、白果、宋埠等四个中间站，预留中驿、岐亭两站。麻城境内有大中小桥27座4305.03延米，涵渠364座10.26万横延米，隧道1座264米。麻城段概算投资15.6亿元。

麻城站是京九线上十大站之一，属路网性区段站，其规模为二级站，位于麻城市城区西南7公里的陡坡山。占地约1800亩，投资5.4亿元。站区长4.4公里，近期（2000年）17股道，一级两场（到发场、编组场），远期（2010年）24股道，一级三场（到达场、发送场、编组场）。站内设有机务折返段、工务段、电务段、建筑段、水电段、站修所、供电所等10多个段、所管理机构，设计建设能满足600名旅客同

时候车的客运站房及二级军工站，货场年货物吞吐量 为 120 万吨。麻城站生活区设有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及职工宿舍。

麻城站分别位于京九线和阜九段中端，北距北京1102公里，南离九龙1268公里，担负着阜九线和麻城至武汉联络线的机车编组、行车、给水、通讯控制等综合作业任务。是京九线上重要的枢纽站。是大别山地区的中心站。京九铁路贯通后，鄂豫皖三省20多个县市的客货均通过麻城站中转，货物年中转量为3800万吨，旅客日均流量1.7万人次，高峰期3万人次，吸引区面积5万平方公里。辐射范围北到阜阳、南到九江、东到合肥、西到武汉，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

麻城段铺轨架梁已于5月24日完办，线上房建、“三电”等附属工程全部开工。阜九段9月底铺通，年底京九全线铺通，一九九六年边配套、边分流。

京九铁路及麻城站的建设，给麻城带来了宝贵的机遇，对于麻城改革开放，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麻城市拟修建两条地方铁路专用线，进行砂石转运、货物储存、中转和进行铁路相关项目建设，已预留了专用线接轨道岔。

（一九九五年十月）

市 庆 欢 歌

龟峰歌改革 京九颂辉煌

麻城建市十周年回顾

梅基金 朱青山

麻城市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中段南麓。地处鄂东、豫南、豫西交界处。市域南北最大距离82公里，东西最大距离76公里。是南北公路交通要道。往北经河南省的潢川、信阳，可达郑州、北京市；往东经安徽省的六安，可到合肥、南京、上海市；西南至湖北省会武汉市130公里，南距黄冈市127公里。全市版图面积为3747平方公里（合561万亩），约占湖北省总面积的2%，全市人口112万。

京九铁路跨越麻城市西张店、顺河集、罗家铺、王福店、浮桥河、南湖、中一、白果、铁门、宋埠、歧亭等12个乡镇、办事处，途经66个村、264个自然垸，全长为84.46公里，境内设西张店、罗铺、麻城、白果、宋埠5个火车站，预留中一、歧亭两站。是京九沿线铁路跨越里程最长的县市之一。京九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后，对于促进麻城的开放开发和经济腾飞，加快老区脱贫致富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产业带，实现奋战三五年，建成中等城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麻城人杰地灵，名胜众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三台八

景”和五脑仙山。“三台”为白云台、雁台、钓鱼台。白云台又名天台，位于城区北部麻姑仙洞处；雁台，位于城东白泉山之南；钓鱼台，位于城东凤陂河。“八景”为龟峰旭日、白泉飞泉，麻姑仙洞、万松石亭、桃林春色、柏子秋荫、凤岭朝云、龙池夜月。白泉飞泉位于城东25里处的白鸭山，麻姑仙洞位于城区西北6公里的五脑山主峰北山腰上，万松古亭位于城西7里处山岗上，桃林春色位于城东15里处的桃林河，柏子秋荫位于城东北10公里的九龙山上，凤岭朝云位于麻姑仙洞之侧，龙池夜月位于龙池桥办事处辖区内，龟峰旭日住于城东30公里处的龟峰山。龟峰旭系麻八景之首。

远眺，山形如一只巨大的乌龟，头微缩，尾高翘，主峰海拔1250米，是麻城诸景之首。登上龟山观日出，能使人心旷神怡，射目荡心。山上清泉，盛夏冰凉，寒冬温暖，豆大泉眼，四季长流，清澈晶莹。人们称为“龟涎”，素有“龟涎泡龟茶，天下第一家”之说。龟山气候奇异，山腰鸟语花香，山顶却天寒地冻。1960年湖北省洪山宾馆在西部山腰建了楼房，辟为龟山风景区避暑胜地。盘山公路直达龟山。1974年，在能仁寺废墟上，兴建了电视调频转播台。1981年架起了62米高的铁塔，成了鄂东骨干转播台。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视察时，游览龟山欣然赋诗云：昔日游击地，今为产茶区。龟峰名久著，姑岭德不孤。烂漫红花久，蒙茸绿茸铺。此山潜宝物，前进莫踌躇。

五脑仙山，住于五脑山国家森林公园辖区内。山南有一座帝王庙，又名天星观，历来是道教的活动场所。自北宋建庙以来，几经沧桑，屡废屡兴。现有庙观，系清嘉庆丙辰年（公元1796年）重修。庙群建筑分为一亭（静心亭）、二门

(一天门、二天门)、三宫(紫微宫、玉清宫、威灵宫)、四殿(拜殿、帝主殿、祖师殿、娘娘殿)。另有斋观、凉亭、宿舍、厨房等。周匡山环雾绕、气势磅礴、茂林修竹、环境清幽。

麻城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武装斗争从未间断。先后有13.7万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记载在册的革命烈士一万余人。抗日战争初期，麻城属第五战区，是武汉保卫战的前沿。李宗仁曾设司令部于宋埠镇。郭沫若两度带队来宋埠宣传抗日主张，慰问前线将士。李宗仁指挥军队在麻城与河南接界的小界岭青山沟阻击日军南下，同日军展开血战，终因日军绕道江西九江，溯江而上，武汉失守。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麻城辗转战斗，留下许多光辉的业绩。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麻城人民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可贵的贡献。

从1986年国务院批准麻城撤县设市到今天，麻城这个年轻的城市，已有十年的历程。过去的十年，是麻城艰若创业的十年，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十年，是城乡面貌巨变的十年，是成就辉煌的十年。

十年来，麻城山在变，水也变，人更变，农村大变样，城市大发展，社会大进步，取得辉煌成就：

——干部群众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精神振奋，斗志旺盛。人民从封闭落后狭隘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为着建设开放性、多功能、现代化的城市目标拼搏，“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深入人心，“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功过得失、判断是非成败的唯一标准，干部群众“奋战三五年，建设中等城”

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增强，人心思发展，众志成城，党员讲奉献，干部树风范，是今天麻城人民思想道德和精神面貌的写照。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一浪高一浪。**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启动了资金市场、人才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建立了一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份合作制企业，变企业资产的“全民公有制”为内部职工“共有制”，形成公平竞争的金融保障体制，加速人才和房地产的合理流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以建设黄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成立大别山经济开发协作区为标志，麻城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国务院批准麻城为对外国人开放的城市和取得外贸自营出口权，标志麻城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内外贸易和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1995年，完成外贸出口供货额1.9亿元，是1985年的8.3倍，年均增长25%，已建“三资”企业12家，引进外资达到1000万美元，结束了麻城无“三资”企业、无外资的历史。

——**经济建设突飞猛进，速度、质量、效益跃上新台阶。**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9.5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2.2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43元，分别是1985年的4.8倍、4.6倍、2.7倍、4.9倍、均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由10年前的60.5:19.4:20.1调整为36.3:38.2:25.2。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85年的劳平1564元增加到1995年的3862元，农业初步形成了中南平原、东部山区、北部丘陵的三大区域经济特色，

1995年实现农业总产值9.3亿元，是85年的1.5倍，年均增长4%，95年与85年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72.9%，农业综合商品率上升7.6个百分点，粮食、棉花播面稳定，产量增加，成为全国“商品粮大市”和“商品棉基地”，油料产量比1985年增长64.2%。工业形成汽车配件、纺织服装、饮品食品、燃化医药、皮革制品、建筑材料为主体的16个门类的工业体系，1995年，工业产值达到33亿元，利税达到9480万元，分别是1985年的11.2倍和4.2倍，年均分别递增27.3%和15.4%。三年苦战，消灭了荒山。山水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多种经营已形成蚕桑、畜禽、干鲜果、茶类、菌类、菜类、水产、药材八大支柱产业，17个乡镇和387个村基本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经营格局，涌现了湖北蚕桑第一乡、第一村、板栗第一乡等一大批多种经营明星乡村。全市多种经营基地达到100万亩，且有18个万亩大基地，多种经营产值达到6.8亿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46.7%上升到73.1%，上升25.6个百分点，成为全省多种经营十强县市。乡镇企业达到24102家，产值达到47.5亿元，撑起了我市的半壁江山，95年乡镇工业占全部工业的份额达到74.8%。个体私营经济更是如雨后春笋遍布城乡，95年其规模达到4873家，是建市前的18.8倍。财政形势好转，1995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并实现当年收支平衡。金融状况日益改革，1995年全市行社存贷款分别达到11.2亿元和12.3亿元，分别是1985年的9.5倍和4.6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2亿元，是1985年的3.9倍，年均递增14.6%。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年来，全市近20万农民摆脱了贫困，一大批乡村开始迈步小康，城镇居民人均生

活费收入2799元，人均居住面积23平方米，农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5.1平方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86119万元，是1985年的15.2倍。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造血功能”日渐提高。10年间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7亿元（不含京九铁路），建项目567个。交通建设，争取了京九铁路在麻城设立二级区段站和汉麻联络线在麻城接轨，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北京到九龙，麻城当正中，一市跨两线，四面采春风”，交通枢纽地位已经形成。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接通了断头路，改造了低等路，改善了运输条件，扩大了客货流量，95年客运量和货流量分别是85年的6倍和3.2倍。邮电通讯建成了以市区为中心，联结城乡，沟通国内外的现代化通讯网络，完成了万门程控电话，黄麻光缆和大部分乡镇程控改造工程。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新兴电话业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正在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中。95年邮电业务总量是85年的24.4倍，年均增长37.7%，市话和农话用户分别较85年增长16.2倍和2.1倍，年均增长32.9%和11.8%。电力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20万千瓦火电厂前期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正在争取国家立项。十年来，共兴建220千伏，110千伏，35千伏输变电站8座，并均与华中大电网并网供电，95年全市供电总量达到16980万千瓦小时，是85年的2倍，可以说，10来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电、通路、通邮。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旧貌换新颜。建市之初，市政府就编制了麻城市总体规划，首次将麻城的城市建设纳入规划管理的轨道。“八五”期间，又经专家论证，确定为大

别山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铁路枢纽城市，提出“奋战三五年，建设中等城”，93年又按中等城要求进行总体修编，此举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首肯和麻城112万人民的拥护，拉开了中等城建设的序幕。几年来，先后投资1.73亿元，进行新老城区主干道的改造、新建和硬化，形成了老城区“五纵四横”和新城区“三纵五横”的道路骨架。

特别是进入“八五”以来，我们按照“一年一个主题，一年一个目标，分步实施，逐步推进”的思路，大搞城市建设。1991年至1992年以治理脏乱差为主题，打开了临街房屋一楼门面，基本实现了摊点归位，菜担进点，市容市貌初步好转。1993年以“奋战三五年，建设新型城”为主题，起步了开发区建设，初步拉开了中等城道路框架；1994年以“配套完善老城区、加快新城区开发”为主题，开通了市区四路公共汽车，实现了市水厂二期扩建工程供水，新区开发一片火红，基本形成了中等城市雏形；1995年以“建设示范街，创建卫生城”为主题，通过对市区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城市主体景观的改善，达到创建“省级卫生城”的目标。

这五年中，我市直接投入城区建设资金1.73亿元，义务工360万个，使城区面积由7.9平方公里扩大到22.6平方公里，市区人口由10万人增加到18万人，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实现了十大跨越。

1992年至1993年，我市以跨世纪的眼光和开放型的战略思路，对原麻城县域的总体规划按30万人口40平方公里规模进行了修编，重新确定了城市性质，发展方向，功能分区，配套完善了水、电、路、文、卫、厕、教、科、医、商等专业规划；33个乡、镇、场、库、办事处政府所在地以及境内铁

路站场都编制了规划，城区控制性详规覆盖面达70%以上，并始终坚持了“规划一张图、管理一个法、归口一家管、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的“五一”管理办法，做到管有依据，建有目标。

道路建设上，外抓进口线，内抓联接线，打通断头街，扩宽狭窄路。五年来，共新、建、改、扩建道路29条，总长52.9千米，其中包括陵园路、工业路、将军路、建设路、西正街、金桥大道北段、商苑路、车站路、下关厢街九条水泥路石的铺设；北环路、东环路、南环东路、麻北路、河东路、麻白路、金桥大道南段六条黑色路面铺设；仙姑路、北环东路、陵五路、西环路、闵五路五条沙石路面铺设；京九大道、货场路、西陵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松合路六条土路基形成。使老城区形成了“四纵五横”，新城区形成了“四横三纵”的道路格局，拉开了中等城市的道路框架，活了交通，促了流通，繁荣了经济。

市区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春有花，夏有荫，秋有实，冬有青，街头有景，夜晚有灯，成为大别山的一道美丽的都市风景线。台湾街、开发区、火车站、南湖公园、五脑山森林公园、龙池商场、金桥宾馆、一中、师范、影剧院、广播电台、电视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医院等项目的建设，使城市功能日臻完善，日供水能力提高2.1倍，绿化面积增长8.5倍，就医、就学条件齐备，已跻身于省级卫生城和省级双拥模范城的行列。与此同时，集镇建设如火如荼，一批新兴乡镇矗立在麻城大地，形成城乡一体、联动发展的格局。全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35.8个百分点，城市绿化率提高1.4倍。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保持了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10年来,全市共创办各类科研机构近200所,获地级以上科技进步奖456项,其中省部级以上17项,各类科技人员达1.4万人。教育事业蓬勃兴旺,普教、职教、成教、特教协调发展,麻城师范作为湖北省首批重点中师通过了国家教委的检查验收,实现了中师办学条件标准化,市一中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考察,在全省乃至全国成为一流的重点高中,普九工作成效显著。体育事业欣欣向荣,群众体育全面开展,竞技体育成绩优异,并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体育人才,分别被国家体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全国体育先进县市”和“全省体育综合实力十强县市”。卫生事业人才济济,医风端正,医德高尚,技术先进,拥有CT等一大批现代化一流的医疗设备。获“全国中医先进市”称号,市人民医院进入二等甲级医院行列。文化事业坚持“双百”方针,为“五个一”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涌现了一批名人名著名戏,艺术团体进京演出,获得多项奖励。广播电视事业一年一个新台阶,广播电台、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等传播手段一应俱全,在全国各县市中名列前茅,获国家人事部、广播电视部嘉奖。计划生育率达到75.2%,计生事业不断进步,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增强,党的威望不断提高,党群众关系日益密切,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改善,工作热情高涨。纪检、政法、组织、宣传、统战等党务部门在党的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人大、政协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党风、行风、民风、社会风气明显好

转，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蔚然成风，涌现了一大批“双文明”单位，市纪委、市广播电视局、气门厂等一批单位获国家有关部委、湖北省、黄冈市的嘉奖。

回顾过去的10年，百万人民豪情满怀；展望未来15年，历史责任更加重大。未来15年，麻城具备多种优势，麻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良好机遇，是麻城振兴崛起，赶超发达地区的关键时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让麻城百万人民携起手来，弘扬老区精神，抢抓历史机遇，团结拼搏，为把麻城建设成为京九线上的明星城市而努力奋斗！

梅基金：中共麻城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

朱青山：麻城市建委主任

爱 国 一 家

我所认识的曾惠芳女士

王 水 姣

我认识曾惠芳女士，是在九五年春节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那天，天气很冷。她穿着黑色裘皮大衣，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使每个与她接触的人都感觉到亲切。她是香港妇女团体的领袖之一——贤毅社中央联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主席。贤毅社由香港政务司钟逸杰先生创办，全港有36个分社，社员达8000人。它的宗旨是鼓励基层妇女，特别是新市镇内的家庭主妇，善用余暇，积极参与各项娱乐、教育和康乐活动，以增长知识，提高生活质量，培养妇女的公民意识及睦邻精神，为社会公益作贡献，她了解到麻城已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对外开放城市，便主动地表示要把麻城介绍给香港。她说，九七年香港要回到祖国怀抱，现在要加强交流，多做工作，祖国统一事业，人人都要作贡献。

今年三月，我到广东。她在十分繁忙中抽时间来看我，多次商谈要组织贤毅社成员到麻城参观。9月27日，她受全国妇联邀请，到北京参加港澳妇女团体领袖座谈会和社团活动的图片展览。结束了在京活动，她于10月1日风尘仆仆赶

到麻城，具体制订了贤毅社成员参观计划。每一项安排，每一个细节，她都是亲自审定；主要参观地点，她都不辞劳苦亲自去实地考察。她说：“这是香港妇女界人士第一次组团到麻城，我们现在多辛劳点，就会更加圆满。”

最使我难忘的，是陪同她去阎家河镇黄秀畈村看小学。这天是10月8日。7日晚，因为两天来一直下雨，我担心道路泥泞，怕她受不了一路的颠簸，打电话询问她要不要改期。她对我说：“不用改期，不用担心。我决定的事一定要做到，不管有多大的困难。”8日清晨，她穿一件襟边点缀着五色小花的深色中长毛衣，配一条粉红色的长裤，系一条浅色的丝巾，精神抖擞出现在我面前。她有些得意地露出浅色雨靴说：“泥水没有什么可怕了。”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机耕路上颠了一个半小时，同行的人都觉得很抱歉。她下车含笑着对大家说：“我小时候喜欢骑马，今天乘车就好象是骑马。”她的幽默冲淡了我们心中的歉意。多么善良的人啊，其实，她已是64岁高龄了。她的乐观和勇气鼓舞着我们，感动着我们，使每个人心头都涌起一种神圣的感情。到了小学，她仔细查看了校舍，询问了师生的情况。归途中，她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知道了许多我从前不知道的事。这里的孩子很乖，很可爱。他们都是下个世纪的人才，我们要多关心他们，为他们多作贡献。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金秋十月，曾惠芳女士率领香港贤毅社中央联会一行五人到麻城进行为期三天的参观活动。到光荣院看望老人，到特教学校救助聋哑儿童，到黄秀畈村小捐资助学，她把慈爱和关怀送给每一个人。她说：“九七年香港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还要更多的交往，还会有更多的人到麻城来。”

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仁爱，乐观，勇敢，曾惠芳女士就是这样的人。临别之际，我在心中默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996年重阳夜

王水姣：中共麻城市委委员，麻城市政府副市长

历史回顾

陈再道与武汉“七二零”事件

李 明 鲍帮林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1967年7月，武汉。

十几天的持续高温，使这座著名的“火炉”城市更加暴热。太阳终日火辣辣的，射得大地直冒烟。街道两旁葱茏的树木无可奈何地垂下了高昂的头颅。

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形成了正比。十几天来，两派斗争不断升级，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机关瘫痪，工厂停产，社会动乱，武斗频繁。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直接插手，操纵煽动所谓“揪军内一小撮”致使维护武汉局势的中流砥柱——武汉军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责难，无法开展工作。

武汉地区日趋严重的形势，很快反映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在院中踱了片刻，对周恩来说：

“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0日，周恩来电话通知陈再道，毛泽东将南巡武汉解决“武汉问题”，要他作好汇报、接待工作。陈再道高兴万分，很快就落实了首长到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14日早晨，周恩来到达武汉，随行的有海军司令员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到四川解决两派争端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4个人，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武汉。晚上，毛泽东抵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王力住在百花二号。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钟汉华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各路人马齐聚武汉，武汉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陈再道对此充满信心。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擅自指定武空副司令刘丰带路，上街观看大字报，有意地在群众中公开身份。并亲自到造反派组织那里发表煽动性讲话。果然，第二天，武汉造反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并口口声声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把武汉广大军民搞得稀里糊涂，不得要领。

7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李作鹏等，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的情况，并讨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方法。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

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护你们……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公开支持造反派，并要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于其它的，陈再道还容易接受，但要他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护你们……”

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陈再道、钟汉华到梅岭一号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们怎么啦！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有点气呼呼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成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接着表示：“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做他们工作，要做得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泽东的一番话，使陈再道、钟汉华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们觉得毛泽东对武汉军区还是信任的，决心忍辱负重，把工作做好，使武汉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

王力定调：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毛泽东会见陈再道、钟汉华之后，周恩来因回京开会，

离开了武汉。

毛泽东指示谢富治、王力专门设一个接待站，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谢富治、王力阳奉阴违，迫不及待地窜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又是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并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疯狂地喊叫：“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许存允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以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反复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把武汉三镇搅得一片混乱。广大军民怒不可遏。“百万雄师”更是怒火中烧。一时间，声讨谢富治、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打倒谢富治！”

“打倒王力！”的震天呐喊响彻江城。

这天晚饭后，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汉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来到军区大院的门口，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乘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笛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陈再道知道，如果不及时地控制局面，后果不堪设想。他一面派人做群众的工作，一面将情况告诉谢富治、王力。但是，王力既不接见群众，也不采取具体措施控制事态扩大，似乎“浪头越大越好看”。

等候在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一齐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数百名群众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去，被激怒的群众强行塞进了汽车……

7月20日清晨，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他刚进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的二百多名代表就愤愤然地冲进来，强烈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二百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群众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一看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武汉三镇象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

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这次游行示威行动一直持续到23日。

群众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再道留在东湖宾馆，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钟汉华他们赶到军区大院，通过多方面做工作，才将王力悄悄地弄出了军区大院，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二十九师师部六号楼。

周恩来得知武汉发生的事后，感到事态严重，当日从北京赶到武汉。为了保证王力的安全，他指示武汉军区迅速将王力接到东湖宾馆。可是，当军区负责人赶到六号楼一看，王力却“失踪”了。周恩来立即命令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找回王力。

原来，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窥测形势，认为有机可投，便编造谎言对刚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叫喊着要抓王力。于是，王力便跟着张昭剑躲到了六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

21日中午，刘丰得知王力藏在小洪山上，立即窜到那里，他一见张昭剑便破口大骂武汉军区，并问张昭剑：“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再道的？”张昭剑狡黠地说：“我

是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徐丰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决定转移上海。

7月22日，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军区负责人开会，并让李作鹏、刘丰参加，决定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军区工作，并要陈再道、钟汉华赶快表态，争取主动，以利于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之后，周恩来因外事活动，便匆匆离开了武汉。

周恩来走后，李作鹏有意扩大事态，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指使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声称：“七二〇”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同时，还授意东海舰队发表《严正声明》，攻击武汉的军民。

“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刘丰也从中制造手脚，把从吴法宪那里得到的消息马上告诉张昭剑，并煽动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于是，张昭剑公开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扬言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各地举行“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所谓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他们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他们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这一决定，把周恩来处理“七二〇”事件的设想全部推翻了。

第二天清晨，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

“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陈再道知道大祸降临，但是相信党会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的，并抱定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兵的赤诚，去承受那将到来的一场“惩罚”。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召集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的电报。翌日清晨，陈再道、钟汉华等飞抵北京。陈再道、钟汉华一行一住进北京京西宾馆，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先是北京文艺口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后是“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他们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北京街头还贴满了“打倒陈再道！”“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江青、叶群、戚本禹、关锋在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

陪同下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7月25日下午，按林彪的部署，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亲自出席了大会，还邀请了在京汇报工作的黄永胜、洗恒汉等人参加。欢迎大会气氛凝重，火药味浓。最后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声中结束。

康生扯长了那张老驴脸训斥道：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7月26日下午，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常委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当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进入会场，即被安排在被告席前，不许就坐，只许站着。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放炮，定调子，急不可待地声言：“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接着，吴法宪疯狗似的乱扑乱咬：“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这一马拉松式的斗争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陈再道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他见

康生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他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能讲一句话，也许能早点收场。

出于这种动机，陈再道大声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了……”陈再道话还未说完，康生就拉长了他那张老驴脸，恶狠狠地训斥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接着，给陈再道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这次碰头会实质上是对陈再道等武汉军区负责人的一次批斗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种法西斯式的人身攻击，恐怕是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会后，林彪、江青一伙又逼着与会人员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〇”事件的态度，进行了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测试。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消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的交椅。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今天，陈再道将军和武汉“七二〇”事件虽然已经走进历史，但给人们留下的一串思考却是沉重而又冗长……

（原载《湖北档案》93年第5期）

我在麻南敌后抗战的一段经历

刘 永 贤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原地区，我豫鄂边区党委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打通长江以北鄂皖通道，与华东新四军兄弟支队沟通联系，于一九四〇年三月，组织了以张体学、刘西尧为领导的鄂东纵队独立团。根据边区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形势。鄂东地委决定开辟麻南（黄安、麻城、黄冈、黄陂四县交界的地域）敌后根据地，组织武装抗日反顽斗争，建立税收机构和地方政权，以保证汉麻公路中段我军的交通安全和抗日部队的给养。同年十一月，鄂东地委领导人刘西尧同志，将我从鄂东纵队独立团抽调出来，委任为鄂东麻南办事处主任兼税务第四分局局长和安麻独立营副营长。按照鄂东地委的指示，我带领小方等七位同志和三条半枪，来到麻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麻南地区，北迄中馆驿，南抵五湖，东起潘塘，西至八里坨。地处交通要冲，历来为敌人重点驻防之地。宋埠，为麻城日伪县政府的所在地。日本侵略军一个大队的本部（“本”，日语读“洪”，故老百姓称“洪部”）也设在这里，约三百人的兵力，以后减至百余人。“本部”以下设有宋埠地区警

备队为特务班，还有便衣队计十余人；伪县府设有保安大队；伪警察局下设一个情报课，也组织了一支特务便衣队。此外，在岐亭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伪保安队的一个班。仓子埠、柳子港、李家集、中馆驿、郭三屋垵、门前垵、永家河、桃花等地均有日军据点。犬牙交错，日伪布防相当严密。而我方，包括曾朗廷的便衣队在内，总共只有二十多人，十几条枪，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因此，只有依靠群众，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在这里扎下根来，打开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是年底，我带着队伍从陂安南回到家乡岐亭一带开展工作。夜间到达张家洲，正好当地维持会会长张楚良在祠堂开大会，内面敲锣打鼓，搞得很热闹。我通过熟人将张楚良叫了出来，他见我后很是恐慌。我说：“你不要怕。我带新四军回来了，你这个维持会长要注意接待我们，掩护我们，还要为我们工作。你可以三面维持会长的身分，既可应付日本人，又可应付顽军。有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张连声称是，我们让他回到祠堂续续开会去了。接着，我们又摸到岐亭乡找到伪乡长李柏池，我和李同住一个小镇，从小就熟悉。先向李交待了我军的政策后，希望他利用伪乡长的身分，为我们工作。注意收集日伪顽军的情报，当好我军耳目。通过一夜长谈，终于将李乡长争取过来了。岐亭镇附近余家寨有个邓汉平，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副营长，因官场失意，退役回家。但他家境贫寒，有一定的爱国心，又是汉流邦会组织的三爷，很有社会影响和一定的活动能力。还有一个叫张国东的青年，革命热情很高，政治上也比较可靠，决定吸收他们二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继之，我们大胆地吸收

了一些抗日热情高的同志参加活动，如杨德俊、何永善、陈宏咏、罗七姐等，至此，我们在岐亭一带有了立足之地。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离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们多于夜晚进行活动、离据点较远处，则白天开展工作。汉麻公路两侧，村落较为密集，我们走村串户，一天要活动好几个村庄。每到一地，首先布置哨兵警戒，然后通过熟人串连。或上门做工作，晓之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或组织小型会议，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方针。这样，群众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都说“刘永贤带着新四军队伍回来啦！”穷苦百姓都觉得有依靠，心宽胆壮。抗日烽火点燃了，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又适时地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使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接着，我们以新四军麻南办事处的名义，到处张贴布告，并利用庙会、戏场等群众集会场地，采取不同形式，有时散发传单，有时作公开讲演，宣传我党的十大抗日主张和税收政策，造革命舆论，长人民志气，煞敌伪顽的威风。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新四军在当地的影响愈来愈大。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初步打开了麻本地区敌后抗战的局面。一九四一年春夏之间，鄂东地委又组建了安麻县委会和安麻行政委员会，张正亚任书记，董绍明任县长。同时还建立了工委，陈志远同志任书记；我任安麻行政委员会委员、工委委员兼工委党支部书记，分工主管军事和税收工作。以后，任士舜同志继任县委书记，董绍明任县长。

在敌后开展税收工作，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十分尖锐。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有一股虎劲，加上广大人民群众是爱

国的，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坚实基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税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首先，是建立税收工作队伍，为加强麻南的工作，上级派钱运华同志来任副局长，张厚珠同志任会计。还将曾朗廷的便衣队编为麻南办事处青年警卫班。我们还在当地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当税务人员，争取了一些伪政府的税收人员为我方做税收工作。如伪税收人员巴荣青，在岐亭一带征税时，欺侮穷人，对肩挑背驮的小商小贩收税过重，搞得群众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我们把他杀掉。为了贯彻刘西尧同志“采取‘老瓶装新酒’的方法，开展敌后税收工作”的指示，我们立即抓住巴荣青，揭露其欺压群众的行为，宣传我党坚持抗日的道路和主张，向他指明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道路。通过教育后，把他放了。巴荣青为感我们对他不杀之恩，按照我们的意见，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如经常向我税收人员汇报敌情，将其收缴的税款大部分上缴给我税务第四分局，小部分交伪财税所抵差，我方税务人员还利用巴的身分证章在岐亭汉麻公路上公开收税，即使碰上了日本人，只要说一句“一字凯的”，日本人不仅交税，还翘起大拇指说：“大大的好！”这种以敌人的名义，实为我方公开设卡纳税创造了敌后收税的先例。后来，何家富、杨德俊等同志都按这个办法设卡收税。最后巴荣青也成为我们的税收人员，通过改造，争取敌伪税收人员，利用他们的旧机构、现班子为我们做税收工作，发挥了“老瓶装新酒”的作用。这样，我们的税务人员增多了，力量加强了。为适应税收工作的需要，我四分局在原有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以小方为队长的手枪队，共有十多人（枪）。地委又选派张波为队长的手枪

队，计二十余人（枪），掩护税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又在青年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有五、六十人（枪）的税警中队，共有二百多个税收人员。

第二是设立税收机构。四分局下设税务所，税务所下设卡。我们首先在岐亭设立了第一个税务所。开始由贺加富任所长，后由杨德敬继任所长。杨曾被日军抓去，经过严刑拷打，但他只字未招，立场非常坚定，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宋埠城内，设有一个税务小组，负责对城内坐商的收税工作。后来，在潘塘、夫子河、古龙集、三店、桃花、谢店、八里垸、五湖等地相继建立了税务所和四十多个税卡。

第三是开展税收工作。起初是下条子。我们派员到各地摸清当地富裕户、殷实户的基本情况，然后开条子。封面上写着“上芒下芒：救国公粮”；内面写上某某人，限交款多少，并送某某地方交某人收。这样搞了一个短时间，收到一定成效，但远远不能保证我军的给养。后来，我们决定争取一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来为我们做工作，以扩大税收范围。开始由工委书记陈志远等同志负责，找当时的伪县长朱甲卿、伪保安大队长朱步瀛进行秘密谈判，并且达成了协议。二朱被争取过来后，为我们做了些工作。后因失密，朱甲卿被日寇杀害，朱步瀛也逃跑了。我们又选择了宋埠猪行老板陈良汉为突破口：设法做他的争取工作。陈为汉流邦会成员，在宋埠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于是由我带领一个班，夜里摸进陈良汉的家里，捉住后将其眼睛用黑布蒙上拉了出来，带着他在岐亭九骡山一带转了一个星期，边转边给他做工作。终于将他争取过来了。陈表示支持我方在宋埠开展抗日救亡和税收工作，并动员商人向我方交税。我们以后通过

新四军购买了许多药品和急需的军用物资，由于税收工作的新局面。那时宋埠有两个日本商人，产品的倒卖生意，他们将牛皮、猪鬃、牲猪等运往牟取暴利：过去，无人敢向他们征税。后来，我们命伪税务局的我方人员出面，向日商收税，日商因惧怕没收其货物，只得乖乖交了税款。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在麻南敌后的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一批优秀的热血青年，积极同我们一道参加战斗，最后成为我们忠实的同志和朋友。如罗姐，系中共党员，她丈夫为税卡卡长。他们夫妇为抗日做大量工作，后为革命英勇牺牲；陶幼臣，歧亭人，做过检查税务，搜集情况的工作，他经常深入敌人内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争取敌伪人员弃暗投明，历经艰险，成绩显著，外号为“无字天书”的陈德堂同志，五湖人，工作非常积极，为四分局征得了很多税款；贺永善，歧亭人，曾任我的警卫员，后为手枪队员，机智勇敢，忠于革命；还有张国东、杨德敬、陈洪永、李斗安等同志，均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好同志，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艰苦工作，才使我们的税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一九四一年一、二月间开始收税，每月税款只有几千元法币，后来每月税款收入增加到两、三万元法币，还有部分银元。根据鄂东地委的指示，我们严格遵守财经纪律，所收税款及时派手枪队员护送，由经济交通员直接解交给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同志那里。所有开支，由他统筹安排。麻南的税收工作，有力地保证了鄂东抗日部队的给养。

根据鄂东地委的要求，帮助建立“三三制”地方政权，

是我们麻南办事处的又一工作任务。它既能领导群众与敌人开展持久战，又能保证我方征粮筹款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物色了一批信任我党我军、在当地有一定名望的人物到伪政权中任职。如王子义，歧亭人，他是接近我们较早的抗日积极分子。我们就让他出任伪桂家岗商会会长，还挑选了进步人士赵彩练为方山乡之我方付乡长；张国东为歧亭乡我方乡长；之后，陈××（名字忘了），为宋埠区我方工作人员。

三三制的地方政权建立以后，普遍推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使革命形势进一步好转，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为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我们一手抓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一手抓打击罪大恶极顽固分子，开展锄奸活动。

一天晚上，铁门大窑寨附近一个村庄搭台唱戏。我们事先得知日本“本部”豢养的几个密探，要来戏场敲竹杠，企图发洋财。平时，我们已将这些密探的姓名、出身、家庭住址、罪恶事实平时表现等主要情况都摸清楚了。于是，唱戏以前，作了周密的部署，布置部队和群众中的抗日积极分子把守来往要道。天黑后，五名密探果然混入了戏场，我们即以两人盯住他一个。开演前，我和罗七姐上了戏台，她讲了几句后由我宣讲抗日形势，最后我宣布说：“现在，有日寇的汉奸，特务混进戏场来了，企图捣乱，破坏抗日。大家不要怕，不要乱了秩序，配合我们抓住汉奸。”台下的五个密探一听就慌神了，开始往外挤，但已来不及了，全部被我们逮住。这时戏场又恢复了平静，好戏开锣了。我们带着这五名密探到村子里审问。我打开小本，将他们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和罪恶一一数了出来，密探吓得像筛糠一样，一个个跪在地上磕头

求饶。最后我对他们说，论你们的罪行，已够得上枪毙的条件了，但新四军以宽大为怀，只要你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为新四军提供情报，我们表示欢迎。他们磕头如捣蒜，一一接受了我們提出的要求。将他们放回去以后，按我们指定的地点，多次为我方提供了情报。

我铁门情报站站长陈宏咏之子陈远耀，充当了日伪汉奸，参加了本部便衣队。其父陈宏咏多次向组织提出要将儿子从本部拉出来。我们考虑，只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还是让他留在本部有利。遂决定让其父亲做儿子的工作，结果陈远耀被教育过来了，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作了些工作。

还有伪保安大队长项济民，我们了解到他是“汉流”成员后，即派邓汉平以其“汉流三爷”的身份，进宋埠与项秘密会谈。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达成协议。项同意我们提出的三条要求，即掩护我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在宋埠开展工作；为我方提供敌人情报；不搞敲榨勒索等等。我们还选择了伪军中表现较好的郑德昌、朱友斌、杨福田等五人，派张国东将他们拉了出来，交待了具体任务，让他们当“钉子”，做“内线”，为我们工作。

对于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的铁杆汉奸，我们决不心慈手软，坚决铲除。伪县政府情报主任陈端祥，其儿子陈荣正是日本本部所辖“宋埠地区警备队特务班”的班长，父子狼狈为奸，投靠日寇，深得日军小兰队长的信任，杀害了我们很多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是万民痛恨的父子汉奸。于是，我和地委联络科科长王建平等同志多次研究过，决定除掉陈端祥。我又与张国东、邓汉平等研究决定采用“离间计”铲除陈氏父子。让张国东利用我方一位同志与陈端祥的儿子陈荣

正（佑平）是同学这一关系，借机上陈家玩，将我们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带至陈家，巧妙地夹在他的书中。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新四军欢迎陈家父子与抗日政府取得了联系，鼓励他们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等等，信尾署了一个假名字。张国东从陈家出来以后，我们又写了一封检举信投进了日军的告密箱，揭发陈端祥父子私通新四军。日寇收到密报后，立即赶往陈家搜查，果然搜出了陈家父子所谓“通共”的书信，信以为真，立即将陈端祥、陈荣正父子解往何家河堤刺死在一个坑内。消息传开，人人拍手称快，有人给他父子写了一幅挽联：端偏不正；在维持会虐民，在区公所虐民，开始

亏弟兄拍马；

祥变为殃，到县府不准保，到洪部不准保，临终

要父子摸鱼。（注1）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我奉调到鄂东纵队司令部工作。我离开麻南后，日寇黄陂本部派来了一个特务队到宋埠、歧亭一带从事镇压革命活动，加之我们内部个别领导同志决策上的失误，工作上出现了漏洞，使革命队伍遭到了沉重打击，我政府、地方工作人员、税务人员、武装干部及来往过境交通人员被敌人捕、杀达数十人；财政税收网络几乎被破坏殆尽，税款收入下降。一九四二年初，鄂东政府又派我回麻南参加攻打宋埠的战斗。

为迅速恢复麻南地区的工作，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同时解决我方经济困窘状况和军用物资问题，区党委决定攻打日伪麻城县政府的所在地——宋埠。上级派五师付政委——任质斌同志率领的特务团和三十九团，来到两道桥，与我们鄂东纵队会合。任质斌、何耀榜同志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

了边区党委关于攻打宋埠的决定。会后，命我率纵队警卫连，从两道桥出发先行，其任务是：找一可靠向导，了解敌伪兵力部署情况，选择攻城地点，作好攻城准备。布置主力部队负责封锁郝家铺和歧亭刘结子河的日军据点和从西北方向攻打宋埠。我找到地下交通员李斗安同志当向导，掌握了宋埠西门警戒稀少，又系伪县保安队防守这一特点，就选择西门作为进攻目标。攻城命令下达后，我们很快登梯进了城内，俘虏了敌人一个哨兵和保安大队付队长朱振勋，速速打开城门。接着我三十九团、特务团也打进城了。日本鬼子吓得钻进地洞不敢出来。我军很快包围了伪保安大队部，从侧门攻了进去，打死了伪分队长夏巧桥，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还有大量的布匹和生活用品。整个攻城战斗，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战斗结束后，我们集中了被俘翻译、伪县府秘书毛明荣、伪政警人员、商会会长、伪保安大队兵士及一些豪门绅士和商户老板，约两百人。将他们带到两道桥，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向他们交待了我军的俘虏政策，指明出路：谁要是继续顽抗到底，与人民为敌，充当汉奸走狗，我军将严惩不怠。一星期以后，将他们全部放回。这次战斗，在敌人内部发生了强烈的震动，在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发展，为恢复麻南的工作创造了条件，使这里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

※

※

抗日战争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我也成为年近古稀的老翁，记忆就不那么准确了，有些情节难免有误。请当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战斗过，而今又健在的老同志、老朋友和熟

悉这段历史的诸位同志补充更正，使这段史实日趋完善。

（注1）关于有人送陈端祥父子的挽联是后来听群众介绍。

作者原为福州军区福州基地副主任，现已离休。

注：此回忆录经周密、杨文榜、戴定钦、白开基、杨秀槐、蔡业振、李敏等同志的协助，经过多方调查核实修改而成，特此向上述同志致谢意！

刘永贤1986.12.18

处理一批救济物资的前前后后

徐 再 先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中原大地，阴雨绵绵，新四军第五师正在准备实行中原突围的战略转移，在部队行动的前几天，我和一部分同志，经组织安排，化装成老百姓，冒雨从湖北省广水镇乘火车北上，很顺利地到达了河北省的古城邯郸我二野司令部。经过一个余月的休整，就调我到华东第三野战军去工作。九月下旬，我到了山东，被华东野战军任命担任了山东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日寇投降，蒋介石乘机发动的全面内战，没有捞到便宜。之后，便变换手法，搞重点进攻。一九四七年秋，蒋介石纠集了五十六个师、旅共六十余万人压到山东战场上，山东解放区军民面临的局势依然很严重。特别是部队的物资给养，更成为突出的问题。对此，我这个做后勤工作的真是着急得很啊！

恰逢此时，山东省军区转山东省委指示，通知我到小清河의 出口处羊角沟去接收一批救济物资。得到这个任务，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这批物资对于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真好比是雪里送炭，雨中送伞。当天，我就

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第二天赶到了羊角沟。在接收物资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这批救济物资，是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和爱国人士，经过统一战线，以救济灾民的名义，从联合国国际救济总处搞到的，用以支援解放区军民，几经周折，才海运羊角沟的。我一面认真地清点物资，一面由衷地对党的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和爱国人士产生无比崇敬之心！为了取得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该有多少志士仁人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忘我奋斗啊！物资接收完毕，我很快调集了三十多、小帆船，将这批数以万吨计的药品、布、被服、十多辆大卡车，迅速地运到了小清河柳桥段两岸，在百多华里的村子里，并作好了随时供应部队的准备。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早日将这批物资补发部队放战争。

在我们接受物资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实施的临朐战役也先后在激烈地进行中。这两个战役，因，特别是遇到连日大雨，山洪暴发，给部队机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两个战役均未达到预定的目的，部队受到较大的损耗。战役失利，物资补给更显得迫切。加上部队也准备撤到黄河北岸去休整。这时，我更是希望能早日把这批物资补发到部队去。可是，一直没有接到上级的调令。

一天黄昏，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周骏鸣同志一行几人，骑马来到我们物资接收工作队的驻地小营。见面后，周副参谋长作了自我介绍，并且说明了来意。原来，周副参谋长是奉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之命，前往山东省委和山东军区联系救济物资支援部队的事，可是，山东省委和山东军区个别主要负责同志却拒口否认有救济物资。后来，周副参谋长打

听到救济物资存放在小清河柳桥段两岸，得知我们物资接收工作组住在小营，才找到这里来的。我听了周副参谋长介绍的情况，联想到山东省委和山东军区个别主要负责同志曾经对我们提出的“这批物资要保密，不能向外泄密”的要求，我感觉到了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全局利益，不利于粉碎国民党匪军的重点进攻。再说，部队又准备北撤，这批物资如若不尽快补发给部队，会落到敌人手里。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会遇到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当时，要不要把物资情况向上级反映，我的思想是有过强烈斗争的。两利相比则取其重，两害相比则取其轻。为了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不顾牺牲个人的一切，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大胆向上一级党组织和负责人讲真话。这天晚上，我把接收和存放救济物资的经过、地点如实向周副参谋长作了汇报，把三大本物资登记簿交给他查阅，还揭发了山东省委和山东军区个别主要负责同志要我“保密”的问题，并建议尽快处理这批物资。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晚很晚……

第二天清晨，周副参谋长一行人，早饭也没有吃，就启程赶回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素镇。也就在这天下午，周副参谋长带着三位领导同志，两个连的部队，还有一部电台，又赶到了小营。见面后，周副参谋长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张云逸同志，这位是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同志，这位是华东野战军队政治部副主任张凯同志。”接着，又把我向三位领导同志作了介绍，几位领导同志分别与我握手问好，交谈部队的战斗情况。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这么多主要领导同志，这样紧迫

地来到小营，我知道事关重大。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几位首长召集我们开会，讨论支前问题。会上，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趁部队北撤之机，抢发这批救济物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救济物资处理委员会”，由周骏鸣副参谋长任主任，我和山东省三分区地委书记任副主任。两天后，几位首长离开小营，还一再叮嘱我们“要抓紧把这批救济物资补发给部队，千万别留给了敌人！”

送走了几位首长，我们就全力以赴投入到抢发救济物资的工作中去了。我们很快组织了两千多民工，将存放的物资搬运到几条大路的两边，凡是北撤的我军部队，支前民工，一律发给物资，能带走多少就尽量带走多少。经过十天左右不分白天黑夜地抢发，总算将大部分物资带到了黄河北岸。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紧迫，敌人赶来后仍然抢去部分物资。我站在黄河北岸，眼睁睁望着敌人抢捞物资的情景，心中真不是滋味！感到没有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甚觉对不起那些战斗在敌人心脏，历尽千辛万苦搞到物资的同志们以及广大指战员和大量伤病员。

部队北撤后，我带的一个连是最后达黄河北岸的。上岸后，我带着战士，忍心将大木船的船底打穿，让其沉了以后，我在沉船的地点做上暗号，心想，等部队反击南下时，还要让这条大木船浮上水面，重渡南岸，为革命再立新功呢！

将船沉了以后，我就组织部队在北岸抢修工事，准备坚守渡口。这天上午，我还向华东野战司令部报告了南岸敌人的动静。下午，华东野战军就责令渤海军区一个留弹炮营调来，由我指挥向南岸实施炮击，阻止敌人北渡黄河。当炮声一响，南岸的敌人即刻乱了阵脚，一时的狂欢不知飞到那里

去了，纷纷向南逃窜，可能他是以为我军援军已到。从此，敌人便放弃了北渡黄河的企图。

可是不久，我就接到山东省军区的通知，叫我进党校整风学习。在此同时，免除了我的山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职务。军人吗当然要服从命令。到党校后，我被选为一个学员队的党支部书记，很快也被撤职。于是，就对我开始整起“风”来了，唯一的错误，便是说我违背了山东省委的指令，泄露了救济物资的秘密，并且私自调五师突围干部一辆十轮卡车和一车医药、布匹等物资未经山东军区批准，揭露了省委个别主要负责人的本位主义问题。这时，我才了解到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内容，心里也便踏实了。我想，在处理救济物资这个问题上，自己问心无愧，因为这样做，对战争、对人民、对革命都有利，所以，自己个人受点委屈到算不了什么。何况，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归会澄清事实的。

有一天，党校通知听报告。我坐在前面，一看，是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到党校作报告。在中途休息时，邓找到我便问：“你怎么在这里？”我答：“犯有错误，到党校来学习。”邓接着又问：“犯了什么错误？”问话时神情有些惊讶！我照直回答：“就是向周骏鸣副参谋长泄露了那批救济物资的秘密。”邓听了之后，“啊”了一声，接着说：“原来是这样。”这天吃中午饭，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和党校校长温青春同志，把我找去，邓指着我对温校长说：“徐再先是个好同志，在处理救济物资的问题上，坚持了原则，顾全了大局，向上级讲真话；事后，又经受住了委屈，不怕受打击。没有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真正错的不是徐再先同志，而

是那些搞本位主义的人。”听了这一席话，一股暖流汇入我的心田！我们的党不会冤屈一个好人，即使一时冤屈，终究会得到澄清的。当面，我对邓说：“我不计较个人的什么，只是那批救济物资没有全部补给部队，后来仍然让敌人抢捞去一小部分。每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很难过！”邓对我夸奖说：“你这样想是对的，你这样做是好的。”邓走后，第二天，党校就恢复了我的学员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一个星期后，我就接到华东野战军的任命，提前离党校，到华东野战军后备兵团第一师担任政治委员，随着华东野战军，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

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戴启斌整理

说 明：

①这一批救济物资，据说是宋庆龄同志出面搞的。

②徐再先同志是老红军，已在湖北省麻城市病逝，级别为正军级。

③“南麻战役”、“临朐战役”资料，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选编》（南京军区编）

砥柱中流

——中共麻城县委创建麻城解放 区斗争纪实

梅 光 英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毛主席指出的三个前途中的最好前途。中共麻城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同敌顽所进行的殊死搏斗，是这场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为麻城人民的彻底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恰似那中流砥柱，巍然屹立在大别山峦之中。

在急风暴雨中展开

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迅速实施战略展开，6纵18旅于8月31日首克麻城，接着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抢占鄂东10县，将南下干部及军队干部分遣到地方开辟工作。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麻城党的组织应运而生，县区乡村政权逐步建立；为了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均田均粮；地方财税机构和财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保

证了地方及军队的供给；县、区、乡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配合主力平息了“麻东暴乱”和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清剿”。

1 组建工委、县委：

我军进山之初就划定各纵展开工作区域。9月初，6纵司令部挺进麻城阎河一带，并召集纵队领导人会议，决定成立鄂东工委、下辖二级工委（相当地委）、三级工委（相当县委）。为了有利于工作，鄂东工委在麻城设立麻东、麻西两个工委，麻东工委书记薄怀奇，麻西工委书记郭久恒。9月29日，任爱生率太行二地委南下干部队由金寨漆家店到达木子店。10月初，改工委为县委，麻东县委书记任爱生，麻西县委书记郭欠恒。同时，两县爱国民主政府及区乡党政机构相继建立。麻东县长张剑石，麻西县长张振兴，麻东县辖8个区：东木区：书记何英才、区长胡大祥；黄白区书记谭申平、区长丁连三；张家畈区：书记刘其玉、区长梁栋；梅庄区：书记李仕俊、区长刘光；木栖河区：书记吴德简、区长×××；龟山区：书记李国珍、区长李凤翔；阎河区：书记孙辛酉、区长张力；东河区：书记张力友、区长梁启杰。麻西县辖5个区：林店区：书记侯占太，区长何××；张店区：书记程晓侯，区长吴泽芳；乘马岗区：书记于江，区长晏仲平；福田河区：书记傅维新，区长王扶民；黄土岗区：书记兼区长李本松。两县摆摊子、搭架子已经就绪，100余名南下干部分赴到各地开展工作。

2. 发动群众均田均粮

工委组成后，首先安民，安定秩序，联系保、甲，调查了解情况，建立工作点，并开始宣传群众，提出“打大恶

霸，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0月，根据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麻东在丁家坳姚家冲和白果树垸办起了训练班，有百余人参加了培训。麻城县委书记郭欠恒等深入村户蹲点，领导土改运动。至初冬，麻城的土地改革已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接着进行打土豪分浮财，开始分田均田。到12月中旬止，麻东县已有81个村初步完成了分田均田。麻西最早是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张店乡进行土改，接着在大河铺、乘马岗也铺开了。整个麻西范围内，有近10万人进行了打土豪分浮财。这项工作的进行，给穷苦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和胜利的希望。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斗争热火朝天。麻东县的夏家垸是反动军阀夏斗寅的家乡，这里的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夏斗寅的23石稻田分给了164户贫农，而且分光了他家的衣物、家具，农会也搬进了夏家的高门大宅。木子店群众不顾地主豪绅的武装威胁，3天内就将胡之进、李德明等3家土豪的浮财分光了。

尽管土改工作后来出了一些偏差，但由于发现早，纠正快，造成损失也不大。麻城县委通过开展以土改为中心的扎根串联工作，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初步站住了脚跟，打下了开创解放区的良好基础，使麻东这块世代不容外来人立足之地，第一次插上了共产党的旗帜，也使麻西这块老苏区有了新的复苏。

3 平息麻东暴乱

正值土改工作蓬勃开展之际，11月4日，麻东发生了震惊鄂东的反革命暴乱。麻东土匪头子郑家贤、郑家佩、郑家字等，裹胁群众2000余人，趁我主力南移，只留人数不多的武工队和部分伤病员之机，武装攻打任家垸乡政府，进攻台

子垸县委、县政府驻地，杀害了县委委员、工作队队长余清等70多名干部及300多群众。这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向人民的一次疯狂反扑，气焰嚣张、手段残忍，麻东群众非常恐慌，争相跑反，古城、任家垸、井边垸、台子垸、邱家垸、张家垸、八字垸、游家冲等垸子的人全跑光了，“一个多月工夫没有人下种”。

在严酷的斗争面前，麻东县委迎难而上。首先，配合四分区武装两次追剿暴乱的小保队，迫敌逃至宋埠。12月3日，将其大部歼灭。这次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煞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对群众作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对参与暴乱的群众和暴乱的首恶分子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大多数人做好安抚工作；对保甲长进行审查登记，依靠群众管教一些不法保甲长；对过去的贫民团进行整顿，对其中投敌或动摇的贫民团干部开群众大会宣布除名。在武装镇压敌人，政策安定人心的基础上，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4. 建立财税制度，发展地方武装

1947年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在《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中对新区的供给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各地政府一经建立，均应立即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建立正当合理的田赋（公粮）、税收制度，使部队供给制度化。”

县区财税机构尚未建立之前，地方干部分散就食、大军冬衣筹款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10月中旬，鄂东工委决定废除保甲，建立财政制度。县成立财粮科、税务局，区有征税员。征税种类主要有坐商税、行商税和副业税三种。税率一般不超过5%，对于消费品，迷信品则提高税率，如烟、酒

等为30%，迷信品为35%至40%，仅福田河镇坐商有150多家，每月可收坐商税100多银元。除县区地方干部提开支外，还上缴专署解决财政短缺问题。与此同时，地方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乡有部分基干武装，区有区干队，县有县大队，麻东、麻西两县武装约有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清剿”。仅12月3日，宋埠一段就歼灭县自卫队，土顽2400余人，为我之战略展开、开辟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腥风血雨中坚持

1948年3月，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由于我大别山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敌人的战略中枢，被敌视为心腹大患，意欲必除。故此我主力转出后，敌人立即以整编40师、48师、28师及反动地主武装首先对我大别山南部的四、五分区进行“扫荡”。这次敌之“合围”、

“扫荡”，不仅在人数、装备上有绝对优势，而且在策略手段方面，也较前更为毒辣。一是在占领我地区后，大量扶持土顽，广设据点，实行“驻剿”与“分剿”；二是加行筑寨并村，驱赶群众集中，并辅以政治诱骗，欲置我于孤立之境地；第三，受取所谓“反复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术，疯狂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突袭我县区武装，其残酷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为了协调行动，反敌人的“清剿”，麻东与罗田合并成立罗麻县委，罗麻、麻西县委根据鄂豫区党委、4地委指示，端正政策，讲究斗争策略，组织“拳头”灵活机动的进行游击战争，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

人，终于坚持了阵地，扭转了局面。

1. 转变政策和策略

我主力转出大别山后，之所以很快形成不利于我的局面，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原因，但也与“左”的恶劣影响有很重要的关系。由于打击面过宽，脱离了基本群众，破坏了统战关系，致使在强敌围攻的严重关头，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进一步恶化了我之艰难处境。县委痛定思痛，追根溯源，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扭转局面，根据党中央、中原局对新区工作的指示，在端正政策和纠正前段“左”的错误方面，着重抓了四个转变：一、停止过火作法，安定人心，保护群众利益。县委强调“团结工农兵学商及一切反蒋爱国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共同对敌”。并“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租”，对“过去分了中农田地，允许中农收回，分了中农浮财，能退回则退回，不能退回由政府赔偿，过去划错阶级者，将来重划”。“为保护群众利益，并照顾地主生活，对已经分田地区，不准地主倒算收回土地和浮财，如系群众自愿退还者，不予追究，对于遵守民主政府法令、不向群众倒算者，保障其安全，并予奖励，欢迎地主回家乐业，如回家无法生活者，政府设法帮助”。这样，基本群众纷纷返回，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愿为我服务。梅庄、木子店等地有66名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群众说：“过去80%的反对你们，今天是80%赞成你们。三千人向火——共产党，八百人向灯——国民党”。二、发展生产，救济春荒。“保护与发展一切工商业，欢迎工商业家恢复营业（包括地主富农在内），政府决定停征营业税，减轻行商税，禁止乱收税、乱没收货

物，给小商贩以各种便利，过去错分或没收之工商业由政府赔偿”。“废除蒋匪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多者多出，少者少出，无者不出，清理过去，负担过重减轻，超过者抵今年公粮”。在农村，则以组织春耕救灾为中心。对受敌摧残严重的无人区，尽快争取群众回家春耕，对于缺粮种子的农户，设法调济。三、禁止乱打乱杀，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对罪大恶极又毫不改悔者，坚决打击；对有意回头者，尽力争取；对放下武器者，实行宽大优待；对携械投诚者及暗中帮助解放军者，则给予奖励；对土蒋官兵家属与一般人民以同样待遇，并保障其安全”。四、改变前一段将保甲一脚踢开或全面摧毁的作法，转而对其改造，逐步建立两面政权，让其在为我办事的同时，允许其应付敌人。“除罪大恶极又死心塌地者外，其平时办事公正，爱护地方不压迫群众者，保障安全；欢迎对土蒋消极怠工，拖延办事；欢迎对解放军及民主政府公开或秘密办事，并论功嘉奖”。

由于县委大力贯彻党的新区政策，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使局面改观。我党有错必纠的态度和断然实行顺应民情的转变，不仅重新赢得了基本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信任，而且连那些对我抱有成见甚至敌对情绪的人，也慢慢改变了看法。

2. 开展“三查三整”

在上述转变政策、争取时局好转的过程中，麻城县委还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开展了以查思想和整肃军纪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活动，并结合进行了形势教育，以提高干部战士对坚持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从而树立信心，增强斗志，自觉克服一些不良习气。同时，还针对一些不团结的因素，下力气做好消除隔阂，促进团结的工作。

县委成员由于来自不同单位，各自经历、政治修养等均有不同，因而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剧烈的斗争中，发生一些摩擦是较为自然的现象。对此，麻西县委自1948年7月起，利用斗争间隙，先后在黄土岗乡的周家楼、福田河乡的将官、甘家垵、新屋咀等地召开县委党小组会遵照鄂豫区党委“六月六日指示”精神，结合县委班子的实际，以自我批评为主，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整风学习。通过摆问题、讲道理、疏通了思想，增强了县委的内部团结。

3. 组织“拳头”，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1948年3月初，敌对我实施大规模扫荡，占领麻东木子店，罗田僧塔寺一带。我对敌之扫荡开始思想准备不足，兵力集中不及时，甚至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致使区乡干部、武装受到很大损失。5月5日，我4分区部队及麻西县大队在燕子寨被敌合围，牺牲和被打散了的有四五百人。

为了调整部署，集中兵力组织“拳头”，打击敌人。1948年5月下旬，麻东县委率县大队及县区干部辗转 to 河南商城长竹园，在鄂豫军区王树声司令员的主持下，将四分区48团7、9两连和刘邓司令部派来的警卫3连，连同罗田、麻东两县县大队合编为罗麻独立第10团，共5个步兵连，1个警卫连，约500人枪。团长郑铎，政委傅甲三，副团长赵天云，副政委谭申平、刘敏。同时，将罗、麻两县工作队合并，成立罗麻干部大队（辖麻东4个基干连，3个大区干队），队长吴德简，副队长马次堂，随10团行动。与10团成立的同时，原麻东的一个连，教导团的一个连，麻西的两个通讯班，三个区干队、三个基干连，还有一部分干部组成鄂

豫军区独立第11团，团长于振河，政委张振兴，组成时400来人，6月回到麻西时只剩294人。另将原侦察队改为教导队，43人全为班至连级干部，队长刘振海，政委王扶民。10团、11团组成后，于9月初进入麻城境内，分别在麻东麻西开展军事斗争。它们象两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给敌以有力的杀伤。

10团进入麻东后，6月12日打下木子店，俘小保队45人。这一仗，使麻东局面由被动变为主动。接着，6月21日激战滕家堡，10团与分区48团一道，歼敌整编7师171旅512团2个连，毙俘敌150余人，缴获马步枪130余支，轻机枪9挺，大大打击了敌正规军的嚣张气焰。敌人由开始扫荡的连进攻改为营防御。

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针对部队内部实际，10团于8月份开展了以查斗志为中心内容的三查运动。在三查中，由于团领导带头检查工作中的错误，群众发动好，运动比较成功，受到了分区的表扬。

11团进入麻西境内后，主要是坚持麻西游击斗争，保护群众利益，进行过两次大的战斗。8月19日晚，11团奔袭乘马岗东北的傅家垸之敌，击溃县4个自卫中队、5个乡保武装2000余人。11月15日，11团由福田河将官村出发，翻3座大山，经3小时，到黄土岗东南消灭罗玉山部乡保一个自卫分队。这两次战斗后，分别召开了贺功大会。10月，为加强领导，11团所属各单位均实行了政委制。3连政委王扶民，2连贾萍，教导队张建村，工作队傅维新，团直郑俊。11团在县委领导下，以开展军事斗争为主体，狠狠打击了地方土顽，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在麻城地方武装与强敌巧妙周旋，进行

游击战争的同时，9月16日，鄂豫军区教导1旅1团（原6纵18旅53团）和3团（原6纵17旅51团）、4分区第12团（原6纵16旅48团）、新洲县大队，在王树声、张体学、李友九、汪进先等指挥下，从罗田固基河出发，以一夜百余里的行程奔袭（黄）冈、麻（城）交界处的李胜垵，歼敌乡保武装200余人。这次战斗，拔掉了鄂豫四分区身边的一颗毒钉，使麻东与黄冈解放区连成一线。

根据鄂豫区党委的指示，罗麻、麻西县委，在集中兵力打胜仗的同时，有重点地开展地方工作，创造小块游击根据地逐步向大块根据地发展。罗麻、麻西两县委分别把白石山、杨旗岩和福田河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地区，采取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分子，调解中小地富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比较稳固的小块根据地。

4. 开展政治攻势

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配合军事斗争，是我军建军的重要原则之一。

根据1948年11月21日《中原局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和前段行之有效的经验，麻城县委一方面出示剿匪布告，晓喻土匪投诚自新，以争取宽大处理；一方面动员进步士绅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亲属给在敌军中的亲戚朋友写信，寄送宣传品或直接出面劝降。由于政策对头，方式得当，加上我军连获大胜的声威震慑，政治攻势颇见成效。

遵照地委指示，“争取罗麻地区变为优势的游击区”，“力争罗北，游击麻东”，开展统一战线，建立两面政权。11月23日，罗麻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先从白石山、杨旗岩等地开始，以军事打开局面，开展两面派工作。25日召

开全县干部大会进行思想动员，提出“剿匪安民建立根据地”的口号，把争取社会力量作为工作的中心和关键。会后，先后对平湖、黄白两乡公所发动了进攻，基本打垮了该敌，紧接着召开群众大会，灶边个别谈话，对俘虏教育后释放等一系列工作，使群众敢接近我们，土顽开始动摇分化，保甲工作展开。

麻西两次召开释放俘虏大会开展对俘虏个别谈话，给受伤俘虏治伤，给饭吃等。

麻东地区经过我一段工作后，地富虽一般地相信了我们的政策，但开始仍回避见面，一、不甚放心，二、怕要他为我们办事，三、耽心他们站不长，游击走了，国民党又返回，四、有恶绩的怕惩办。总的来说是对政策不了解。因而，政治工作，最基本的、首位的就是如何争取见面，这是攻势的前提。见了面能减少地富的顾虑，缓和对立的情绪，是争取向我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很快推动工作，先见面的要力争找主要统治人物，影响作用大，往往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主持见面顺序先本地干部后外来干部，安排前来见面的人先开明后顽固，进行见面的方式先秘密后公开。大多数见面后，少数未见面者甚感孤立。上层一接头，下面群众对接近我们就大胆起来。

见了面第二步就是要争取为我办事，主要是维持，维持内容包括为我征粮，并清理去年负担，保护我少数工作人员，安置伤病员。麻东梅庄、黄柏、栖里等3个乡5个自卫中队计340人，274余枪，被我歼70余，瓦解回来的140人，约占总数44%，初步打开了军事局面，土顽头子态度在转

变，最顽固的徐庆南也开始动摇、消极。知识分子已靠近我们，并愿出来为我工作。麻东滕家堡、梅庄、东木、黄白、樨里等五个乡有106名知识分子出来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政治攻势和我军连续打胜仗，大大振奋了群众的情绪，很多土匪插枪不干，社会秩序日益安定，麻城敌败我胜大局已定。

在春风泽雨中解放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根据形势的发展，4地委指示罗麻县委分开，两县委单独工作。

1月间，地委派姜一到麻西，3月将麻东、麻西合并，成立麻城县委和麻城人民民主县政府，下辖10个区。县委书记姜一，县长梁百朴。3月11日，鄂豫军区独立师一举解放麻城，县委由福田河迁至城内办公。

县委成立后，主要筹集粮草支援大军渡江作战，清剿残匪，安定社会秩序，着手经济建设，迎接新中国诞生。

1. 全力支前

县委合并后，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鄂豫区党委及支前司令部的指示，主要任务是支前、剿匪和发展大好形势，最紧迫的是迎接大军南下和渡江作战。3月11日，新组建的鄂豫独立师由商城南下收复了麻城，击溃敌175师的一个营及保安团一部。3月25日，南下大军前锋二野四兵团陈赓率部进抵麻城，先后有13、14、15军及四野43、44、45、46、47、48军共9个军的部队从麻城过境。并先后在麻城、

白果等地驻扎，在夫子河一带进行了半个月整训、演练渡江。麻城县委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迎送大军工作。尽管正是春荒季节，县委还是千方百计地以筹粮筹草为中心，备置了大量的急需物资。4地委和麻城县委在麻城境内沿两路口、福田河、黄土岗经麻城至白果，自麻城经中馆驿、宋埠至歧亭，由西张店经顺河集、林店、料棚、中馆驿至宋埠、歧亭3条路分别设立了麻城、白果两个交通总站，麻城、中馆驿两个交通分站及白果、麻城、福田河、西张店、林店、宋埠等6个供应大站和木子店一个供应小站，并沟通了麻城至白果的通讯线路和麻城至白果，麻城至中馆驿、宋埠至歧亭的电话线路，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支前网、线、点的综合供应系统。县委针对本县地区新干部少、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通盘计划，细密分工，动员全党全军及全县人民开展支前立功运动。很快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支前高潮。县委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对征粮标准，方法、任务及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领导亲自动手，工作以点带面展开，自始至终贯彻民主摊派，合理负担精神，征粮工作健康迅速开展，按时、保质、超额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截止3月29日为止，据城关、闵集、中馆驿、宋埠、歧亭、高迎（即现迎集）、白果、中静（即现夫子河）等几个区乡的不完全统计，完成征收大米（内有一部分属谷物、布匹等折合大米）计450.3万斤。其中仅宋埠第34保3天内就公平合理地征到4万多斤粮，受到县政府的表彰。

在支前的同时，3月下旬，13军进抵麻城县城之前在陡坡山与桂系部队激战一天，把400多名伤员交给麻城县委、吃、住、医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特别是其中100多个重伤

员急需送往黄冈大崎山陆军医院就医，县委很快集中了400多名农民将伤员送走。

2 · 清剿残匪

围绕支前中心工作，对县境内的残余顽匪进行了清剿。当时在麻城有匪徒800多人，受匪扰区人口11万（占全县65万人口的17%），受匪扰区田亩11万斗，受匪扰区粮户产量1150万斤。主要在麻东、三河口、隘门关、福田河、歧亭等地活动，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迫切要求剿匪安民。黄冈地委抽独立3师9团（驻木子店）、8团（驻松子关）分别组成麻东和龟山剿匪工作委员会。

为防止敌人破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5月1日，县委作出决定，强调对搜缴的土顽武装的枪要加强管理，严格手续。

6月13日，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委深入调查了解，掌握本地区暗藏敌人的活动情况，全面摸底，登记造册，加强控制。

武汉解放，大军过境，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使麻城的情况有很大变化，自卫队交枪投诚，土顽内部分崩溃散，乡保武装人员也来缴械，历史上最反动的杨太宏，也不得不送枪枝，反动地主被迫离开武装来守法出粮，大批学生也来参加革命工作，但是，敌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必然走向暗藏的、隐蔽的反动破坏，仍有长期抵抗的企图，准备潜伏力量再来暴动，其表现是：交枪打埋伏，交坏枪，交没栓的枪，有的假借交枪，带有证件来联络反动武装，有的带数箱子弹来供当地反动武装使用，有的利用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大肆活动，如木栖河有一贯道300多人。这些都是变化了的新情

况。由于提高了警惕，加强请示汇报，收缴了散藏在土顽手中的枪支，监督乡级自卫中队长以上人员的行动。使社会秩序日益安定。

3.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剿匪安民，掩护了支前，也促进了大好形势的发展。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结合当前的剿匪工作，县的党、政、军各系统组织也相应发展、健全、完善起来。

3月1日，麻城人民民主县政府根据鄂豫行政公署命令发出命令公告，将麻东县与麻城县合并为麻城县，并将全县旧有乡制划分为10个行政区，并于4月底前配齐了区的主要干部。为了解决基层干部过于缺乏，全境解放后又急需大量干部这一矛盾，县委对县内过去坚持斗争、当前剿匪支前春耕生产中的贫农积极分子和贫农知识青年进行培养训练，尔后分配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指导帮助。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但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而且也全面转入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更为麻城解放后的生产和建设工作准备了极其宝贵的干部队伍。

4月23日，县委关于进城后工作要求中强调指出，当前及今后的中心任务是从发动群众入手，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共渡春荒。农业、手工业、商业、教育事业，都要全面发展，财政收入要不断增加，为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麻城，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更好地领导全县的生产、经济建设的开展，县政府相应设立了有关机构：财政科，科长王崇道；民政科，科长陈明志；建设科，科长×××；教育科，科长崔秀印；工商局，局长彭柏如；公安局，局长马次堂，副局长兼宋埠镇分局局长赵怀德；银行经理袁克成；税务

局，局长刘汉文。

4月9日，县委就武装发展建设问题作出决定：为巩固解放了的麻城形势，6月底前发展武装1200人，以充实县武装和各区干队。至6月底，罗麻独立第10团和麻西第11团合并为麻城县大队，大队长白宪文，政治委员姜一，副政治委员任定一、陈山林，政治处主任侯占太。各区成立区干连，30——50人枪不等，并规定各区（镇）分委书记兼区干连政委，区长兼连长。

为了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县武装党支部由原来的5个发展到12个。

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新政策的实施，一个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扎扎实实搞建设，欢欣鼓舞迎解放的生动局面迅速形成。1949年10月1日，麻城县委、麻城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创建麻城解放区的两年时间里，中共麻城县委始终和全县人民一道，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发挥了砥柱中流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她将永垂青史！

麻城惨案的前前后后

白 开 基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大革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中共麻城特支部与国民党县党部建立了统一阵线，实现了国共合作。麻城农民运动由秘密转入公开，农民协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取代了反动的封建统治，成为农村政权的权力机关。麻城北乡乘马岗的不法土豪劣绅丁枕鱼、王子历被农民协会送县城关押，并请县署派军队协同农友通缉由丁枕鱼、王子历等人组成的反革命大同盟成员。这伙土豪劣绅闻讯后即逃至河南省的光山县，勾结流氓地痞，假借红枪会名义，实为聚集反革命力量，企图向我反扑。自一九二七年二月始，经常骚扰乘区党部、农协。县农协曾先后派人前往乘马地区查明此情，并请县署制止。不料县长符家桢与土豪劣绅早有勾结，一面暗地支持各地枪会，一面压制农协。至此，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农协的活动面临极大困难。

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开始，在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王子历的哥哥“王九聋子”、反动区长王既之的儿子王仲槐等反动头子的阴谋策划下，集结了红枪会众一万余人向乘马

区、顺河集区发起进攻。三月二日，他们占领了乘马岗一带。分驻于丁家垸、方家湾、马家寨、谢家湾一带，耀武扬威。从旧历四月三日起（公历四月底），将乘马岗、黄土岗、一五两区农协、一、九两区党部，以及所有乡农协，妇女团体机关抢劫一空，杀伤会员五十余人，捉去会员六十余人，横加迫害，砍断手足，勒索巨款，种种暴行，举不胜举。剪了发的妇女也都被捉去游街，不屈被杀者二十余人。

东部苏区的革命形势则更加艰难。当地劣绅杨太红、陶祖发等在李家畈、易家桥一带办所谓红学，强迫穷苦农民参加。对农协会会员、纠察队队员则是随意罚款或捕杀，付大定、胡在全、胡成强革命同志就被他们杀害了。未被杀的则重罚，每人六百六十串钱或罚苦役一年。有幸逃走了的同志则被红枪会悬赏缉拿，例如捉拿黄土岗农协负责人江道明悬赏一千元，胡志丹八百元。

在此期间，横行乘马地区的地主武装——红枪会匪徒，不断向麻城县城进行骚扰和进攻，妄图劫走在押的丁枕鱼和王子历。当时麻城县城只有郑其玉的部队担任守备，而郑部又是才成立不过四十多天的地主联保部，只六、七十人，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有鉴于此，我们的党组织、县农协就立即组织县城附近和乘马、顺河两区的农民、县自卫军、县警备队、工人、店员加强县城的守备，抗击来犯的敌人。但仍寡不敌众，形势十分严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发展革命活动，我党组织即派王树声同志到武汉请求援兵。

王树声同志到汉后，会见了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听了王树声同志汇报后，非常关心麻城的事态，遂亲自主持召开了省政府、省农协联系

会议。会议针对麻城红枪会匪武装叛乱的情况，决定由省、县两级人员组成“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前往麻城调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省政府代表刘保树、省党部代表丁涛安（后叛变革命）、省农协代表郭述申等人。他们会同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的武装学生二百名（湖北队和湖南队），驰援麻城，以平定红枪会匪的武装叛乱。

学生军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清晨出发，农讲所的负责人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亲自带领大家高呼：“为农民奋斗而牺牲！”这天刚下过小雨，长江江面风浪很大，学员们头戴灰色平顶帽，身穿灰色军装，胸前佩一枚白色的徽章，打着灰色绑腿，背着军毯和斗笠，肩扛七九步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高呼“不消灭麻城土豪劣绅誓死不回武汉”的响亮战斗口号，在汉阳门登程启航，高唱着《国际歌》，满怀着愤怒的心情，向麻城挺进。

当天学生军到达团风登岸，夜宿淋山河。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沿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学生军在到达李子河附近时，突然遭到敌人的阻击，学生军立即进行了反击，随着冲锋号响，一个个象小老虎一样，猛冲过去，一下子就把敌人冲垮了。因人地两生，不便追击，随即宿营于道观河。次日又继续前进。

“学生军快到麻城了”，消息传来，望眼欲穿的城内革命群众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奔走相告。但是，围城的枪匪则闻风丧胆，他们说：“神兵学生军来了”快跑！快跑！于是

仓惶向北撤退，逃回罗家河、方家湾、熊家冲等反动据点去了。

麻城解围后，省里发来指示，根据全国形势，县里可以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对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有权当地处决。于是麻城党组织和县农协会在学生军的援助下，在杨基塘召开群众大会，将作恶多端的李舜卿、丁枕鱼、王子历斩首示众。接着学生军和麻城刚刚成立的农民敢死队及县自卫队郑其玉部一起，于公历五月二十日清晨，向红枪会逃遁的乘马地区进军。当学生军尖兵班前进到王福店时，听到村里枪响，原来是从旁边插到村里的后续部队与丁岳平派去的侦探打起来了。红枪会匪看到大部队来了，拔腿就跑，钻到荆棘丛中逃回丁岳平的巢穴罗家河去了。

中午，学生军到达乘马岗，与红安调来的省警备一团一营队伍会合，乘马区农协负责同志召集数千名农民，手拿锄头、扁担、矛子、竹矛等武器，齐集乘马岗，以配合作战。会后，队伍兵分成两路，分别向方家湾和罗家河进攻。罗家河的枪匪头子丁岳平，正在杀猪宰羊办酒席，准备迎接从河南请来的红枪会“老师”。饭菜刚准备好，老师还没有来，突然听到派去王福店打探消息的周老三、李卫荣的报告说：“学生军打来了”，丁岳平本来正在做着请“老师”重振军威的美梦，听了这一报告，心里十分恐慌，为了给部下壮胆，却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要怕，你们在屋子里，把门闩起来，他就是来了十万我去挡。”说话间，只听得“平平”几声枪响，随之杀声震天。此时，丁岳平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带着一伙匪徒向北溜走，学生军追了一阵，救出被丁岳平抓去做人质的丁晓松后，也就没有再追击了。丁

岳平逃走後，农协派了凌柱中帶人把丁岳平家里的财物和猪肉、粉条等挑回乘马，并一把火烧了丁岳平的房子。学生军并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支援攻打方家湾的队伍去了。

方家湾三面环山，湾前有一口大水塘，塘外是一片低洼冲田，易守难攻。进入湾子只有两个口子，反动头子王既之勾结一百来枪匪在这里筑炮楼，装土炮，企图负隅顽抗。下午一时许，警备队与学生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方家湾，发动了进攻。但因院墙坚固，地形对我不利，加之县自卫队郑其玉阳奉阴违，按兵不动，学生军与警备队发起几次进攻都没有攻下。当攻打罗家河的一路得胜增援军过来后，立即召开“战地会议”，决定以步枪掩护，兼用火攻。一时，学生军与农民把着点燃的柴草向方家湾冲击。顿时，方家湾成了一片火海。到半夜时分，快烧到敌人最后躲藏的一间厅房时，枪匪再也抵挡不住了，便买通县自卫队长郑其玉（原民团头子，后叛变）让开一条小道，从屋后逃窜。学生军发觉后，立即追赶，直捣枪匪老巢。可是，在丁家岗附近的香炉山不幸中了红枪会匪的埋伏，伤亡十余人后，大部队只得暂时退回。在经过这次失利后，学生军吸取了经验教训，立即动员了上千名农民随军行动。当天就攻下了水家垵，然后在余家河住了一夜，第二天打到了熊家冲，活捉了枪匪头子“六魔王”（胡幼安），其余的枪匪望风而逃。

学生军在完成驰援任务后，在麻城县东的马道子上开了一个祝捷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上万人。有乘马岗的党员，有县城的工人，有六区、七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声势浩大，气氛热烈。会上有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王宏文、王树声以及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韦铁城、七区张祖达（后叛变）、

陶际川（后叛变）在会上讲了话，特别吸引人的是学生军负责人的讲话，他站在主席台上的一把椅子上讲：“土豪劣绅剥削我们，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他们连走路都要我们抬，你们说合理不合理”。群众回答：“不合理！”“我们要不要打倒他呀！”“要打倒他们！”最后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流氓地痞！”

学生军在县城休整两天中，还组成宣传队在城内和城外的农村进行革命宣传，给麻城人民革命斗争以深刻的影响。六月五日，学生军凯旋返汉！学生军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麻城人民胜利前进。

当代风流

少年许世友

许世友（1905—1985年）麻城市乘马岗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时期，由工农红军第四军班长升任至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9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少林奇缘

公元一九〇六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广泛地发展起来。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位于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的麻城县乘马岗区许家东边的国民党军队和部分无政府兵力经常与西边的农民游击队交战，官匪横行，人们缺衣少食。

许世友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兄妹七人，靠爷母种的几分田维持生活。在山峦叠嶂，林深草密的深山里，许世友兄弟每天砍柴、放牛、挖野菜……

许世友8岁时，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他正在挖野菜，忽然一只野兔从草丛中蹿出来。他一发现便飞快地去追。说时迟，那时快，一会儿他就越过山岗，跨过小河，而且很有心计地将兔子往下山追。由于兔子前肢短，后肢长，接连翻了几个筋头。兔子终于被捉住。就在这时，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和尚眼看此情此景，对许世友活捉野兔感到惊喜，便有意收他为徒。由于家境贫寒，他父母只得忍心让孩子去寻活路。于是，许世友便泣别家人，与少林结下了奇缘。原来，这老和尚便是嵩山少林寺的灵空大师。

许世友来到少林寺，只做了个寺中杂役。他每天干完扫地，做饭等活，便向师傅求教练功。吃苦耐劳，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有出息。

二、再出家门

在少林寺一练便是八载，许世友成了个虎背熊腰的精壮青年、武艺非凡的武林高手，刀枪剑戟，出神入化。这时，父亲离世的噩耗传到了许世友耳里，许世友便离别寺院，回到家中。

在那生不逢时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地主、资产阶级剥削的加剧，使家乡更是贫穷，官匪越是横行。许世友“怨天忧人”又能如何呢？

炎热的一天，太阳火辣辣的，许世友的小妹在河边放牛，这时河铺村的地主少爷韩瘪头正在河里洗澡，便以牛弄脏河水为借口，硬将牛扣留。许世友来领时，韩少爷无理地说：“只要你往牛胯下钻，你便牵牛”！许世友哪能受得这般侮辱，他气愤不已，于是猛地一掌。韩少爷退出老远，正撞在牛的后腿上。牛脚一抛，恰好打中瘪头的头，顿时血喷满地，不得动弹。

许世友想到无法向地主老爷交待，纵有千般武艺也难敌过黑暗势力，于是只得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没有月光，看不到星星，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许世友孤身只影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路。

（何海波供稿）

血沃商南肥劲草

——记红32师党代表徐其虚烈士

胡梅兰

88年腊月，我来商南斑竹园简家畈，站在太阳河边，放眼望去，麻栗枫树染红了山涯，枯干的蒿菜在寒风中摇曳，稀疏的竹林尚带几分绿意。呵，这就是徐其虚烈士牺牲的地方！我说不出心中的悲怆之感。几年来耳濡目染。徐其虚烈士的萍踪行迹。如飞絮般在眼前掠过……。

1929年8月17日，太阳河边，夕阳反照，残阳如血。茂密的竹林中几只受惊的斑鸠拍翅而飞。

一星期来，红32师东冲西突。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前堵后追。在挫折面前，他们才认识到被监押的党代表徐其虚的是正确的：

“红32师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不是商南地方党的武装，更不是某些人的个人工具！”

“鄂豫皖边界武装割据势在必行，只有建立鄂豫皖特别区，统一边界地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才能战胜强大的敌

人！”

“红32师只有迅速向东光山突围，向红31师靠拢，才能摆脱困境！”

是的，红32师正在整装待发，向东光山突围。

随红32师行动的商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害怕徐其虚向鄂东北特委告状对自己不利，错误地采取了非常手段。

不容分辩，一声枪响。我们党的优秀儿子，卓越的红军青年指挥员徐其虚倒在血泊之中。他的血流进商南大地，流进太阳河，流进淮河，谱写出一曲悲壮乐章。

湖北麻城，乘马岗，石槽冲。

两条蜿蜒起伏的小山坡盘旋而上，山上青松苍翠欲滴，宛如两条长卧着的巨龙，两山会合之处有一个清澈如镜的小塘，在太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宛如一颗剔透的明珠。人们称这儿的地形为“二龙戏珠”，石槽冲的左侧有一个圆溜溜的山包叫灯笼山。传说这“灯笼”就是照耀“二龙戏珠”的。

1906年（光绪丙午三十二年）5月22日，灯笼山下的陶垸破落地主徐立堃生了一个男丁，合家好不欢喜，取名其昌，字凤鸣，号南州，乳名载福，意望子成才，添福添寿。不意其昌两岁时，其父便与世长辞了。其母桂氏虽出身大家闺秀，尚有骨气。不乞求亲友资助，全靠自己一人耕作纺织。养育孩子。孤儿寡母。受尽人间凄凉，幼稚的其昌，十分体贴母亲的心思，6岁进私塾，学习刻苦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22年。徐其昌考进麻城县高等小学，改名其虚。在王幼安老师的教育引导下，徐其虚参加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

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革命理论的影响和熏陶，使他思想豁然开朗，大大激发了他要求变革社会现实的热情。

1924年冬，徐其虚考入武汉中学，革命的浪潮拍打着他的寻求进步的心灵。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他与麻城在汉的学生蔡济黄、刘文蔚、邓天文、桂步蟾、吴济民等人常在一起学习《响导》周刊、《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利用节假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农疾苦，徐其虚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党迅速发动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暑假期间，徐其虚与蔡济黄、刘文蔚、邓天文等又回到家乡，利用走亲串友方式，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徐其虚向乡亲们说：“我们总有一天要象切西瓜一样把地主豪绅的头剁掉！”这话传到国民党省参议员潘熙的耳朵里，他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乘着狗头大轿耀武扬威地来到石槽冲，俨然一个长者，张口训斥徐其虚。徐其虚等嗤之以鼻。最后一不做二不休，砸烂了他的狗头轿。潘熙狼狈地溜回去了。

1926年春。国民革命空前高涨，徐其虚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理想毅然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他随军转战宜昌、沙市等地。因作战勇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秋，他受党的派遣回到家乡从事农运工作。他与王树声、徐子清、廖荣坤等在王楼的奎屋的大门上张贴标语，写道：

“穷莫忧愁富莫夸，哪有常穷久富家；
土豪把我穷人压，不劳而获得荣华；
只要农民团结紧，千年铁树也开花。”

寒冬腊月，徐其虚穿一身土布衣裳，浑似一个朴实的农民，披霜戴雪，奔走于西张店、垸店一带几十里的山村之中。

1927年将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麻（城）地区的反动地主豪绅勾结光山红枪会上万人，向麻城乘马岗、顺河地区大举进攻，他们牵猪赶牛，践踏青苗，屠杀群众，包围县城，妄图毁捣县党部、县农协，救出被关押的大劣绅丁枕鱼、王子励等。董必武会同省府各方，成立“麻城惨案委员会”，派郭树勋等来麻城进行调查。毛泽东也派武昌农讲所学生军三百多人来麻城。在学生军捣毁会匪老巢方家垸、熊家冲时，徐其虚带领农民敢死队一路冲锋在前。5月底，惨案委员会、学生军全部凯旋回汉。徐其虚积极参与平息会匪叛乱的善后工作。6月24日，徐其虚出席了黄安、麻城、光山三县和平会议。

“七·一五”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古老的麻城城墙上张贴着通缉共产党要犯的告示，“徐其虚”三字赫然名列榜首。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把徐其虚又送到叶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徐其虚潜回麻城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9月下旬，湖北省委派李梯云到麻城邱家畈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徐其虚通过参加南昌起义，深感党掌握武装的重要，他和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廖荣坤、胡静山等一起在邱家畈、乘马岗、刘家山、伍家畈等地发动了“九月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杀劣绅。徐其虚一马当先，人称“徐共产”。10月，湖北省委鉴于黄麻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决定发动黄麻暴动。11月3日，徐其虚在七里坪文昌宫参加黄麻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回来后，他豪情满怀，热血沸腾，与吴光浩、刘文蔚、廖

荣坤等一起紧张地训练农民自卫军，打造大刀长矛，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11月13日夜，红旗遮天，刀矛掩月，徐其虚、吴光浩、刘文蔚、廖荣坤等人率领麻城农民自卫军和上万名群众参加了攻打黄安城的战斗。18日，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2月5日，敌12军教导师突袭黄安城，因众寡悬殊，起义队伍撤出黄安城，徐其虚参加了木城寨会议，随起义队伍（72人）转移到木兰山，开展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

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不久，编为四个小队，徐其虚、戴克敏带领一个小队，约20人。他们采取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游击战术，开展游击战争。3月，徐其虚、戴克敏率部先回黄麻老区，打死黄安县公安局长曹“屠夫”。4月7日，在紫云区，一举消灭上戴家“清乡团”。缴枪10余支，给黄麻老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接着，建立了紫云区第一个乡级政权，檀树乡农民委员会，恢复了乡党支部，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结合进行，群众高兴地唱道：

“党员游击转回还，

黄陂到黄安，

先打清乡团，

捉土豪，除劣绅，

一致要共产，

倘若谁反抗，

叫他狗命完。

民团把枪交，

士兵来哗变。

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这一仗，虽是局部反攻的一仗，但揭开了二次暴动的序幕，对于迎接第七军全部返回黄麻老区，乃至开辟柴山堡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6月2日，第七军和地方党的领导在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并以此作为开展边界武装斗争的依托。在柴山堡，徐其虚除了做好军事工作外，还组织战士到茶棚、路口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7月14日清晨，在柴山堡的新庙，发现敌十八军一个连向我驻地进发，我军把部队拉上山头，摆开阵势，准备战斗，敌军发现我军后不但不开枪，反而坐在路旁休息。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摇白毛巾向我军走来。当时，我军非常诧异，不知敌人是否是诈降，怎么办？这时，徐其虚挺身而出，果断地说：“让我去探听个虚实，要是诈降，只牺牲我一人，要是真投降，可带回一个连来！”说罢大步向山下走去。徐其虚这种英勇的行动，深得战士的佩服。通过接触，是敌军真哗变过来，带来73人，75支枪，有30多人自愿当上了红军。这使当时弱小的第七军队伍得到了扩充，装备得到了改善，对于开辟柴山堡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久，第七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31师，下辖四个大队，徐其虚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后为第二大队党代表。10月，鄂东特委改组，徐其虚当选为特委委员。

1928年冬，鄂东特委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山的办法，准备创建鄂豫皖边界武装割据区域。特委曾派徐其虚，徐子清到商南了解情况，商南斑竹园白果树坑是二徐的本族。他们以

串家门为掩护。了解到商南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负责人李梯云（原任罗田县委书记）、肖方（原任商罗麻特支书记）是麻东、罗北人。群众发动也有较好的基础。1929年8月13日，鄂东特委与豫南特委在柴山堡南竹园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决定：组织商南起义，正式派徐其虚、徐子清和另外五位同志到商南工作，将商南党组织暂时委托鄂东特委领导，并划商南、麻东、罗北为特别区，成立特别区委，徐其虚为委员，会后，徐其虚满怀信心到商南开展工作。

到商南后，徐其虚以织袜子为掩护，走乡串户，发动群众，他待人诚恳，态度谦和，助人为乐，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可亲可敬的织袜工人，为了组织起暴动的武装骨干，徐其虚在潘家垸组织起一个有18人参加的兄弟会，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讲述黄麻起义惩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大快人心事，教育他们树立起革命的必胜信心。

起义的准备工作，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预感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四处“清乡”，搜捕共产党人，妄图阻止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鉴于此。1929年5月2日，商罗麻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6日（立夏节）发动起义。

立夏节晚上，趁敌人过节喝酒之机，徐其虚带领汪永金、廖业琪等三四十个武装农民，赶到吴店竹叶庵柯绍恒民团驻地，趁黑夜摸掉敌人的岗哨，通过喊话加强政治攻势，敌人全部投降，缴枪50余支。当夜，徐其虚、郑延青又带领三十多个武装农民，翻越太平山，经柏树冲，直插白沙河福绿庵郑齐玉民团驻地。打入民团的党员冉绍红，见起义队伍

一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两箱煤油泼到房屋上，然后点着，霎时火光冲天，酒醉梦乡的民团光着身子逃跑，当场被打死4人，打伤数人，其余被俘，武器全部缴获，其他各路起义队伍，先后解除了丁家埠、南溪、斑竹园等地的反动民团的武装，起义成功了。5月9日，起义队伍汇集到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32师，徐其虚任党代表。10日，成立办事处，即临时革命政府，徐其虚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成立后，徐其虚在南溪、斑竹园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杀劣绅，粉碎地主武装，摧毁豪绅政权，成立农民协会。5月底，农协会会员发展到3000余名，赤卫队发展到四五百人，初步形成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革命根据地。

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使敌人惶恐不安。于是便进行疯狂的“清剿”，妄图把年幼的红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5月16日，敌商城县保安团和亲区团匪顾敬之等部联合进犯南溪。当夜，徐其虚、周维炯率部将敌击溃，毙伤敌30余人，俘敌10余人，缴枪20余支。商城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逃回县城后被撤职，气病死去，商城县长李鹤鸣也因“剿匪”不力，被上司革职。红军首战告捷，大大的鼓舞了广大军民斗争的勇气。20日，徐其虚、周维炯又指挥部队东进皖西，一举攻克皖西重镇金家寨。21日，克流玻瞳，打败了诸佛庵民团之后，又挥师南下罗田，连战皆捷。不幸的是，商南起义成功，使商南党和武装的部分领导人地方主义膨胀。7月18日，他们以“擅改商、罗、麻边界特区，为鄂豫皖边界特区的非法组织的罪名将商南起义总指挥徐子清（麻城人）处决。将红32师党代表徐其虚监押，等候中央处理。

8月17日部队在向东光山转移时，又将徐其虚杀害。

历史往往是在悲剧中前进的。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从此，鄂豫皖边界地区党和红军的领导终于得到了统一；边界地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血沃商南肥劲草。徐其虚短短的一生告诉我们，革命队伍中，农民阶级的某些封建落后意识曾使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因而他是中国革命崎岖发展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太阳河边返回。徐其虚高大的形象在我脑海中萦绕。他，没有遗产，没有子孙，没有坟莹，却给人民留下了永恒的怀念。

北伐将领王操如

丁兴耀 李海咏整理

王操如，字王林，亦字原松。（1878—1926）麻城市宋埠区杨畈冲村王家大坑人。保定军校毕业生。北伐战争爆发，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一军所属第一师少将参谋，始与贺龙结识。王刚勇多谋，身先士卒，与北洋军阀吴佩孚作战，屡战屡胜，深得贺龙赏识。1923年汀泗桥战斗，作战失利，几丧全军，王与贺双双奋力突围，脱险后，同回王家大坑稍事休息。贺龙仅留宿一夜，翌日便回川以招旧部。月余，贺至函王操如，接其归队就职。王与贺于北伐时期，共同求索救国真谛，倾向共产党的主张，与贺龙交谊甚笃。1925年，贺与王率部由四川至云南进湖南追讨军阀，多立战功。1926年8月27日，为配合汀泗桥战役，在湖南与贺祖耀军阀部队作战中，在桃园县热水坑遭国民党右翼分子暗算不幸牺牲，其时年仅四十八岁。操如牺牲后，贺龙大恸说：“失去操如，就是失去了我的左臂。”全军无不动容。为褒扬北伐英烈，军部特派仪仗队护柩归葬麻城杨畈冲，追加中将军衔，并设灵位于必亭杏花村《烈士祠》。与辛亥革命先驱屈子厚、周幹臣并列灵牌，供后人凭吊。灵

前，还有唐生智于各界人士赠献的挽联一百多幅，其中贺龙亲拟挽联云：

“不爱钱、不怕死，致其终志，
爱人民，爱共和，乃厥初衷。”

贺龙率部起义后，还念念不忘战友王操如，直到1949年大军横渡长江胜利前后，还将珍藏的画像列入革命烈士行列，于战前动员，战后追奠先烈作为楷模，教育将士。解放后还亲自过问其遗属生活，并珍赠操如遗像，以示永怀。

资料来源：《王氏家谱》《麻城县志》

李宗义、王延礼等口述。

人 物 春 秋

万古高风话毛玠

刘 宏

麻城城区东十里有一条小河自大别山深处潺潺流出，两岸青山，十里桃花，醉了多少文人逸士。缘溪行五里，在花桥之麓的古道旁有一高大的墓冢，墓前原立有毛玠神道碑，为梁大同九年彭城黄斌建立，现在的墓碑为麻城县博物馆一九八二年立。

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毛玠，并不陌生。在“赤壁大战”一节里，曹操中了周瑜反间错杀蔡瑁、张允后，在危急关头，任命毛玠为水军都督。由他统帅几十万水军与孙权、刘备展开了后来载入史册的大战。

据《三国志》载：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今封丘）人。年轻时当过县吏，清正廉明。后来打算到荆州避战乱，因闻刘表政令不明，转而往鲁阳投魏。在兖州，曹操任毛玠为治中从事。他向曹操进言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国主迁移，民不聊生，国家没有储备一年的粮食，百姓没有安固的心态。这样是难以持久下去的。现在袁绍、刘表虽士民众

多，疆域辽阔，但都没有远大的志向。如你精武强兵，修耕植，畜军资，以圣旨号召天下，那么，霸王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曹操欣然地采纳了毛玠的建议。命他为幕府功曹。后来，曹操又命毛玠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拔贡取士。所选拔之士皆才高清正。盛名而无德才者，终不能被录用。曹操感叹道：“我所用的这两人（毛、崔）使天下人自治，我还能干什么呢！”曹操平定柳城，特将所获器物中的素屏风、素冯几赐毛玠，并说：“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他虽居显赫的官位，却常布衣蔬食，扶穷济困，好善乐施，家里却没有过多的财物。后来，他又升迁为右军师。魏国初建时，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当时太子未定，而曹操很宠爱临菑侯曹芳，有立为太子的想法。毛玠密谏说：“远的不说，近的袁绍嫡庶不分，结果覆宗灭国。废立大事，不能不慎重呀！”曹操称赞毛玠说：“他就是古代的所说的国家的直谏官员，我的周昌呀！”建安二十三年魏武赐毛玠“万古高风”四字。据《麻城县志》载：四字传于毛玠子孙，至今犹存。后来，好友崔琰被人陷害，魏太祖赐死，毛玠为之不平。不久，有人对毛玠说：“我看见黥面造反的人，他的妻子判为官家奴婢。”毛玠气愤地说：“天之所以不下雨，大概是这个原因。”曹操得知，大怒，将他打入牢狱。当时，桓阶、和洽进言营救毛玠，才免黜。出狱后，他万念俱灰，携幼子南迁三百里，隐居麻城牛占鼻花桥深山之中，并终老于此。鲍太祖赐棺器钱帛，拜子机郎中。

费思量的是，一代名士为何远离魏都而南迁至此呢？究其因，大概有三：他的隐居地花桥位于大别山西麓，古代举水河水域宽且深，与今地貌不同，不便交通。古道自北而

南，顺山蜿蜒。而花桥正处开封到黄州的古道旁，此其一；花桥山高林茂，景色宜人，此其二；最值得琢磨的是，麻城当时虽属魏国辖地，但远离魏都和毛公故乡，西与蜀汉毗邻，南与孙吴相望，居于这样一个三角地带可能正好透露出毛公当时极度矛盾的内心世界。他长时间在魏为官，魏武曾信任他，重用他，高度赞扬他。后又恼怒他，轻易地抛弃他，竟至险些屈死牢狱。此间恩恩怨怨萦于脑，积于心，剪不断，理还乱。当时的毛公行至花桥的复杂心情不难想见，他后退一步仕途无望，前走一步又前味着背叛。古代文化道德观念和仕人的局限性，使他不能走出一个传统的观念圈子，将他定格在一个古代失意知识分子固有的点上——坚守名节，隐居山林。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毛公早已作古，衰草荒丘，墓塚黄昏，给访古寻幽者留下的是无尽凄凉，还是无限的慨叹？

风光旖旎留名士“绝假纯真”话秃翁

——李贽与麻城

范志斌

明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1527——1602），号卓吾，字宏甫，又号秃翁，别号温泉居士，福建泉州人。他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步入仕途，由县教谕递升至太守之职。在官场中生活体察了十四年，愈来愈不满封建思想对人们的严密禁锢，心灵逐渐觉醒，希图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专制下追求自由。于是，在1581年在任云南“姚安太守弃官后，依耿定向兄弟（湖北红安人）讲学至麻城，喜龙湖风景，止焉。”（《麻城县志·前编》），时年五十四岁。

龙湖，当地称为龙潭湖，位于麻城市阎家河镇东北，李贽的好友僧无念在湖边修建了一座芝佛书院，供他讲学。龙湖旁有“钓鱼台”，系鄂东历史名胜。此处两河夹流，有巨石突起于河中，常年清泉回绕，游鱼嬉戏。当地学人周柳塘建小楼于巨石上，名曰“寒碧楼”，闲暇时登楼垂钓河中，故名“钓鱼台”，海内名士朝夕过从，称盛一时。

龙湖西南侧有桃林河，古时两岸多桃花，连绵十余里，居民村巷，罗错其间，桃花盛开，红霞如锦，史称“桃林春色”，东北方有九龙山，山上有塔名“白子塔”，相传唐代

所建，塔高九丈九尺，顶端有柏树盘生于中，每于立秋日午时，塔四面无影，史称“柏子秋阴”。二处均系麻城“八景”之列。总面积3747平方公里的麻城市，境内有“三台”、“八景”，阎家河镇辖区内就有一台二景，李贽从云南一路游来，到此“止焉”，真可谓独具慧眼。

李贽讲学主张从“绝假纯真”的“童心”出发，深恶人间作假。他赞扬农民的质朴品德是“匹夫无假”，批判“理能生气”的唯心学说，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肯定宇宙万物由阴阳二气结合而成。高度评价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等揭竿而起的壮举，是“匹夫道偈”；对卓文君的改嫁，视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勇敢行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李贽“纯真”的品德，丰富的学识，求实的精神，至使“从之者几千、万人”（沈瓚《近事丛残》）。求学的有男有女，有当地的，亦有外省的。如山西的刘东星使其子刘相不远千里前来求学，河南的王本钧奔芝佛书院相从九年，梅克生（官至右都御史）送爱女到龙潭受业。

李贽在讲学期间，潜心著书立说，“其在龙湖所辑书，曰《初潭》、《史纲》、《藏书》、《焚书》、《因果录》等凡手录及所评点不下数百种”（《麻城县志·前编·耆旧·流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历史有时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周柳塘建“寒碧楼”闲暇垂钓本为自乐，而“寒碧楼”三字仅存于史料，“钓鱼台”则喧宾夺主而扬名于民间，后又因李贽在附近讲学而名传千古；李贽游学路经麻城因龙湖风景“止焉”，从事讲学和著书立说，为

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名胜名士，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然而，美丽的风景，并没有给李贽带来理想的境况。历史的可悲的一页，无情地记载着李贽的悲惨结局。由于李贽在讲学中“尤有怀而不吐”，同时男女学生兼授，大大地戳伤了统治阶级的痛处。于是，官吏以“异端之尤”为由，焚其室，拆其院，两次逐他出麻城。进而以“乱道”、“惑世”的罪名，捕之入狱。公元1602年被逼割喉而死，时年75岁。明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从李贽的遭遇即略见一斑。以致二十七年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明朝统治者“失道”的必然结果。

英王之妻与麻城

祝和忠

英王陈玉成（1837——1862）是太平天国后期著名的将领之一，广西藤县人，1862年因叛徒苗沛霖出卖诱捕，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而对其妻子及后代情况，史书记载甚少，所以鲜为人知。

英王之妻叫蒋桂良，湖北麻城人，生于1840年，卒于1920年。清咸丰2年（1852年），太平军由河南抵达麻城，十二三岁的蒋桂良与父兄一道参加太平军。她当时臂力过人，善使单刀，被编入姊妹营当女童子兵。1854年，太平军攻克武昌，当时18岁的陈玉成已升任太平军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司监军，率500名童子兵英勇作战，登城尽歼守敌，立下战功。在这次战斗中，蒋桂良亦表现突出，与陈玉成建立了友情。1857年，陈玉成升任前军主将，旋即娶蒋桂良为妻。1859年，陈玉成晋封英王，蒋桂良即封英王娘。

蒋桂良与陈玉成结婚后，一直随军战斗，后因怀孕，住安庆英王府（今犹存）内。1861年初生一子，取名天保。当年9月，安庆被清军攻陷。蒋桂良和幼英王天保乘乱渡江脱险，居天京（今南京）。1862年庐州失守，退往寿州（今安徽寿县），陈玉成在寿州被苗沛霖出卖牺牲，蒋桂良和陈天

保仍住天京。1864年，天京被清军攻破，蒋桂良改扮男装，携4岁幼子陈天保逃出城外，辗转流徙，后终回到自己故乡湖北麻城隐居，躬耕垅亩，抚孤教子。她身体健壮，六七十岁时尚从事田间劳作，手提两箩稻谷犹行走如常。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她还健在，活到80多岁才病逝于家。

英王之子陈天保，在麻城长大，亦读亦耕，兼作商贩，后取妻亦生一子，取名慎三。清光绪28年（1902年），42岁的陈天保不知何故跑到湖南益阳会龙山栖霞寺出家为僧，法号“遇缘”。至今该寺残存山门石条犹有他撰书“试看绮霞刚驻马，追怀余烈好登龙”一副石刻对联，该山山谷中犹有“遇缘和尚塔墓”，受到众人祭拜。

英王之孙陈慎三，在麻城已儿孙满堂，1975年，他曾多次率儿孙返回广西藤县原簿寻根祭祖。经政府批准，陈慎三与陈久年（英王四代孙）已迁回老家藤县定居。麻城只留下陈建国（英王五代孙）一女，在英王娘蒋桂良故里生活。

麻城县旧县志总纂余晋芳

王 曙 光

据史料记载：《麻城县志》先后编修过八次，其中，成书五次。距今最近一次，是民国廿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由当时麻城县长监修、余晋芳总纂的。

余晋芳（公元1861～1938年），字子青，晚号春晖老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四日生于麻城县南乡（今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区建国乡冯堂垸）。少时就傅外家，从舅氏吴芷生先生受业。光绪七年（1881年）补邑痒。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分广东司行走、兼贵州司帮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丁父忧回籍，主讲黄州河东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擢贵州司主稿、兼银库值班、则例馆协修、北档房帮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放云南清理财政监理官、兼云南造币厂总办、云南大清银行监督、云南矿务局会办。辛亥革命军起，被蔡松波都督聘为咨议。民国元年（1912年）春“入都清理大清积案”。返乡后侍养老母，并学医应诊“专攻歧黄术，以方药活人”。曾任麻城县中心小学校长、县劝业所所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受县长郑重礼延，总纂《麻城县志》。卒于民国二十七

年（1938年）五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八岁。

一

余晋芳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少时在舅家受业，于当地名士花鸟扇上题诗，诗末有：“莫向花间低处宿，上林还有最高枝”之句，人皆奇之，“许有翰苑之才”。成名后，所著《春晖堂文略》、《筱吟馆诗存》，以及编辑的《医学初阶》等书相继出版问世。余晋芳尤长志史，清季部中档案积二百年之久，令其编纂，余遵命编案，每月极多，“颇称精覆”，为部所嘉许。乡居时，又先后为王、郑、罗、邹四氏族谱写序，为重修精忠祠写碑记，为张晋侯写金刚经题词，乡人均颂其才。

二

余晋芳持身涉世，光明笃实。著有家训“五箴”教子孙“祛伪存诚，光明笃实”，要“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在做云南造币厂总办时，将历入主管官腰包之数千金“火耗平余”，分给在事员工，自己“一介不取”，人皆“钦其俭德”，“无不服其廉”。

三

余晋芳在古稀之年，亲修《麻城县志》，为后人做了一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好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余晋芳七十有三，却放弃在武昌“家人相聚，老怀甚

慰”的安逸生活，应邀回县修志。会同协纂毛声远、纂修袁用宾、分辑屈开坊、采访陶甄、经理郑康时等组成八十多人的修志班子。并基于“旧志传本甚少”的情况，商定以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为蓝本，前后分编。《麻城县志前编》断限于宣统三年，《麻城县志后编》起于武昌首义，讫于民国二十三年。前编“参以新近采访，重加整订，无者增之，繁者节之，复者去之，伪者正之”，续编“增党务、实业、自治、金石”，总设疆域、建置、食货、教育、武备、职官、党务、指举、自治、实业、耆旧、列女、艺文、金石、杂志等篇目。余晋芳不断亲自审核全部书稿，还担任例言、序言、疆域等篇章的撰写和全书的校对。常常是“深宵展卷叹眸豁，梅影横窗对一灯”地“综其事”。历时一冬一春，成书十六本，三十二卷。民国二十四年秋由汉口中亚印书馆承印出版。

资料来源：市志办

余佩澍事略

余佩鸣

三兄余佩澍，名三立，字仲万亦字洞万。湖北麻城市木樨河人。生于1902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十）。六、七岁时启蒙学习，族叔元照公授以新学教材。后就学从伯父莲舟公及任公倪斋先生。伯父重汉学，任公尊理学，从此读经学史。1919年；先父余祖言公回武汉，三兄佩澍即至武昌就读启黄中学，继入武汉中学。1926年秋毕业于武昌商科大学。读大学时，在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推动学生运动。是年春由同学余云（汉川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任汉口特别市统计局主任。1927年任陆军十三师师部政治部主任，（师长张木堦麻城人），因执行工作与军部政治部意不合（军长夏斗寅麻城人）而辞职，游燕赵齐鲁而归（时该军驻山东）。后任职西湖（湖北、湖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及湖北全省公路总局会计。

“九·一八”事变，奔走救亡运动。两次至北地及长江下游。在救亡运动奔走中，三兄佩澍，从弟佩笏都找到了组织上的同志，取得了党的联系。于是兄弟二人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于1932年春，在武昌组织联络站。为了工作方便，特在武昌胡林翼路（现改名民主路）武昌慈善会总会对门、武

昌青年会隔壁（青年会系外籍人经营的娱乐场所）租一座二楼西式房屋，开国粹馆，以经营书画古玩为掩护。因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驻武昌办事处及警备旅第二团团部均驻在武昌慈善会总会大厦内。从弟佩炯以店员身份担任通讯员工作（炯弟现在国营荆州农场工作，已退休）。兄弟三人不顾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底下，日以继夜为革命工作，进行极为顺利，国粹馆业务日益发展，驰名各地。

上级组织以此联络点工作的顺利和重要，遂于1935年夏派韩东山同志（解放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及武汉部队司令员）来馆协助工作并扩大计划。被警备二团营长夏祖培识破。因韩不知夏，而夏知韩的经历和身份。夏祖培系同乡与戚谊，为人忠厚，只囑当事人速离武汉，并亲自督促指定回麻城故乡，未究其事；亦未要求会韩。三兄佩澍回麻城县城，因无定居，籍以收购古玩书画，访邑中古迹及先哲故居遗作。从弟佩笏返里，途中留滞戚友家作小贸易。馆务由佩炯弟逐步缩小停止。佩澍于是年冬末回武昌继续刊印先父余祖言公所著《老子道德经通释》及《庄子内篇提要》。翌年（1936）任大公中学语文教师。佩笏弟亦于同时回武昌，1936年初春回家，结束了飘零生活。二人遂与组织再失联系。

“七·七”抗战起，陆军第十三师付师长夏厚存（时代理师长）以三兄佩澍曾在该师政治部工作，电请再任斯职。时兄肝疾上身，遂辞教务，带病前往浙江就任。因时与昔异，三兄遂得全力展开全师政治工作及士兵教育。见浙江农村，农民极为困苦，于是协助地方政府改进工作，推行减租减息运动，组织农民抗日，开展农民手工业。于是十三师所驻之

地，军民关系很好。

1938年春，肝疾比剧，不能继续工作遂回武昌，师部派人护送至九江。虽重病在身，犹以人民为念。临行哭别《呈夏付师长厚存兄并简赵处长君圃、钟营长楚南二兄》七绝二首：

(一)

钱塘潮涨三千丈，跋涉关山到浙西，
强努恰来严武壁，好看铁卷托群黎。

(二)

融融春日路迢迢，不作登楼慰寂寥。
端赖将军补天手，山河到处息鸱鸮。

是年秋，武汉撤退。翌年因便于就医，养病于龟峰山之龟头河。1941年冬，又就医于罗田县卫生院（我县卫生院未恢复）任罗田县会计。1942年春，肝疾加重不能进食返里，于四月二十四日（农历三月初十）逝世，时年四十。

三兄佩澍喜金石、书画、古玩，善雕刻和篆书，笔力俊秀，虽未留墨迹于人间，但从先父遗著（上述老庄通释、提要等）的扉页及条签均可看到。三兄文学颇见功底，三十年代曾参加省政府县长考试和省教育厅民众教育馆馆长考试，均被录取，但未就职。时人以余佩澍有狂态，三兄亦以狂者自居。余佩澍果真狂哉？！

三兄著作，多未留稿。据称，旅途劳困时始习绮语，稿多散失，现所存者系得于亲友，惜哉！

三兄无子，立长兄佩源次子品纪为嗣。品纪业医，在黄冈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四十余年，现已离休。

1993年春修改稿

余佩笏事略

余佩鸿

从弟余佩笏，字执圭，湖北麻城市木樨河人。生于1909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廿六）。其父逝世时，笏弟只三岁，母亲多病，精神衰弱，由叔余晋生公教养，公名淑宜，行九，人称九先生。教育子女慈严并重，言行并进。公之为人忠厚旷达，轻财重义，克己宽人，热心公益。吾邑二区（当时县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东称二区）凡公益之事，无不推晋生公经理，如区建学堂、修桥筑路乃至赈灾平糶等等，至于乡和族间公益事，大都由公经管。公生平全力于公益事务，无暇治理私产，以致产北日衰，晚年生产不能自足。幸由笏弟侍奉如亲。

佩笏弟虽生于小康之家，而无官家子弟娇生之态，且有叔父之风。1926年秋毕业于本邑高等小学校。回家后，即组织儿童团，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及妇女协会，工作积极，且善于宣传。被先兄余佩源在东河高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的有余淑忠、余佩颖（毛君）。时淑忠任农民协会干事、佩颖任儿童团团长。

翌年五月，驻宜昌陆军十三师乘武汉北伐之际，东下袭击武汉，被击败于纸坊。前线营长夏逢时率残部二百余人由

大冶渡江，经浠水、罗田袭击故乡农民协会（夏系邑东乡人），农民协会主席余佩源率农民自卫队仓皇应战，受伤退至龙潭冲，夏即西窜阎家河、县城抢劫。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佩笏弟即来武昌。秋入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是年春陈时由沪回武昌恢复该校），后入群化中学，1930年秋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九·一八”事变，组织学生联合会，参加救亡运动，曾三下南京请愿抗战。在南京湖北同乡会遇着原落梅河泗洲山支点同志（东二区党支部有六个支点：一、木樨河蚕头尖；二、二里河毕家榨；三、黄市龙潭冲；四、黄市马牙山；五、落梅河泗洲山；六、莫家园簸箕河），于是得到党的联系。

在党的指示下，笏弟与三兄佩澍于1932年春初组织联络站。特在胡林翼路（现改为民主路）武昌慈善会总会对面、武昌青年会隔壁（青年会系外籍人经营的娱乐场所），租西式二层楼房屋一栋，以经营书画、古玩为名，店名国粹馆。因武汉警备司令部驻武昌办事处及警备旅第二团团部均驻在慈善会总会大厦内，以便于工作。从弟佩炯以店员身份任通讯员。兄弟三人在军警林立、特务满布的白色恐怖之下，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工作，深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以佩笏、佩炯二弟作事细致机警，在三兄佩澍领导之下，工作极为顺利。国粹馆业务日益发展。

1932年，蒋介石以先解除对武汉的威胁，主力进攻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尤以湖北军事压力更大，武汉警卫更严，除驻军外，特设警备旅、特务机关林立。据蒋介石命令，“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漏掉一‘匪’”，鄂东的徐源泉侵入洪湖根据地即是如此，烧杀掠夺，鸡犬不留，把

掠夺的轮船，开私人航业，航线由汉口开其故乡黄冈（黄冈现分为新洲、黄冈二县）。吾邑二区“清乡团”团长郑琪玉（邑东义洲人）一次与河南商县县长顾敬之围攻县南乡游击队，该乡许竹园村吾族亲人三百五十余人，除四十余人参加游击队外，都被屠杀（吾族修族志调查数字），仅剩一名小孩名小毛，被该团大队长郑家学掳回本邑东义洲八字垸作胜利品。

余1941年春，至邑西北二区及黄安（红安）东区沿途所见残余骨塔，仅林店到西张店这条路上就有七座，平均不到一华里一座，其屠杀人民之多之惨可想而知了。

在这大屠杀人民之际，佩澍、佩笏兄弟在敌人眼皮底下以开国粹馆为掩护设立党的联络站，且进展顺利，可见其旷达沈勇，有毅力有信心及对党的忠诚。

1935年夏，上级组织以国粹馆（联络点）工作进行顺利和其重要，特派韩东山（解放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武汉部队副司令）来馆协助工作，扩大计划。适警备旅第二团营长夏祖培，略知韩的经历而韩不识夏。因此，国粹馆实质被其识破。夏祖培系同乡并戚谊，为人忠厚，密掩其事。嘱三兄佩澍、从弟佩笏速离武汉，并指定回麻城故里。在此情况下，二人仍无惊恐之色态度恬然。于是二人仍想继续，故以收购书画古物为名转移，佩澍走麻城县城，佩笏走浠水、罗田、黄冈，滞留于戚友处作小贸易，收购书画古物，于是年冬末回武昌；翌年春初归家，始结束飘零生活。佩澍兄亦于同时回武昌。二人遂与组织再失联系。

抗战起笏弟仍奔走各乡宣传抗日，自动减租。解放战争时，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是年奇冷，二兄余佩藩（时任

木樨河商会会长)，到武汉代购大量布匹、棉絮、冬衣、鞋袜等。时佩笏弟在武汉，见其货物之多、时间紧迫、时势艰危，毅然参与其事。在武汉“行营”正加紧对大别山的封锁，交通物资检查严密，兄弟二人不顾生命危险，亲自督促运输，冲过国民党驻军地区和检查机关，不到半月时间，货物齐全达到木樨河。解决了驻在罗田、麻城及界岭南北等地战士的冬寒。处长（部长）陈山林同志大为惊奇，认为如办理军需必是能手，遂请从军。后考虑到二人家有老小而罢。后大军转战中原，秘密留在我余家冲不能行动的伤病员，分住在岗背垅、砚佳边垅、杨家塘垅这些山凹中。二兄佩藩接济物资，佩笏弟奔走医药及其生活，使伤病员很快恢复健康归队。这些同志如健在者，定能回忆在麻城余家冲养病如在家中。

解放后，佩笏弟以开明人士与二兄佩藩经营合作社事业，并培训商业人员；合作化时带头参加高级社；并常以其特长（绘画、雕刻）为人民和社会服务，其精湛技艺，仍留在民间。1969年，肺劳病重，于12月29日（公历十一月廿一日）逝世，时年六十。长子品礼在解放战争时参军，现在武汉任区园林局长、书记，能继家风。

1993年春修改稿

夏斗寅传略

1885—1951

夏斗寅，字灵炳。陆军上将。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5月，在湖北沙市发动叛乱，进攻武汉，为叶挺率部击溃。后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一

1885年冬，夏斗寅出生于湖北麻城县木子店夏家垸，乳名金开。父亲系乡里农民，早年病故。母亲梅氏，望子成龙心切，教子甚严。她常对人说，我一定尽全力将金开培养成材，使其不负他先父的期望。梅氏日间拾松枝做灯火，夜间帮人织麻纺线，维持母子生活。夏斗寅曾在一朱姓先生门下发蒙读书，后因生活困窘，学费无着，被迫中途辍学。稍后，母亲梅氏又病死，夏只得靠祖父母抚养。

夏成人后，体格魁梧，孔武有力，喜活动，好交游，为人懒散，不事生产。

1900年，夏斗寅第一次离开家乡，浪游至武昌，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后到当时的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标当了一名司书。1906年，夏斗寅经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后任新军三十二标队官。武昌首义时，夏任第二大队副队长，曾率部参

与进攻督署。辛亥革命后，部队裁编，夏退出新军，曾一度在湖北黄冈县团风镇经营煤炭行，后又回麻城木子店开了一爿茶馆。因其懒散，又不善经营，不久，茶馆便亏本关门。

1912年，为摆脱困境，夏斗寅第二次离乡背井，远奔河北。在保定，夏斗寅遇见了麻城同乡张森，经张介绍，投奔山西大同，找到大同镇守使署所属营长张笃伦。张是湖北安陆县人，因系大同乡，让夏斗寅在自己手下当了一名排长。大同镇守使兼师长孔庾，也是湖北人，夏又因张笃伦结识了孔庾。孔见夏身材魁梧，精明干练，颇为赏识，不久便提升夏斗寅为卫队营机枪连连长。后孔在山西，为阎锡山所不容，遂同张笃伦一块离晋，夏也随之返回湖北。

回湖北后，夏斗寅又结识了蒋作宾、李书城等人。由蒋、李介绍，夏斗寅到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部任职。

1917年冬，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在沙市宣布独立，树起湖北靖国军的旗帜。湖北督军王占元令吴光新部进击石星川，两军激战于宜昌磨盘山。石部朱兆熊旅第二梯团长胡延佐、营长黄继超等人力战阵亡，石军全军溃败。夏斗寅在混乱中星夜向沙市逃奔，途中，见水田中有大皮箱一口，他与外甥江运启抬到田边一看，满箱尽是钞票，于是将其驮在马背上，徒步护行。此时，吴光新紧追不舍，石部溃兵纷纷自沙市渡江南逃。夏斗寅灵机一动，扛起团旗为先导，大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溃兵见团旗高举，以为部队长官仍在军中，便跟着团旗行进。走到公安县，夏斗寅索性将团旗插在要道口，声称他奉命收容部队，开箱拿出钞票，凡有枪者各发五元，无枪者发一元，溃兵见有钱可发，纷纷报名登册。这样，共集结了二千余人，其中不少人

系麻城籍，还有几个排长是夏斗寅本家。利用这种关系，夏斗寅便掌握了这支部队，并由此发迹。

其时，护国军湘西总司令兼督办李书城正在招兵买马，扩充队伍，遂将张笃伦率领南逃的残部收编为湘西护国军第一梯团，张任梯团长。夏斗寅闻讯，立即率领部队投奔李书城，被编为湘西护国军第二梯团长，以鄂籍客军名义，暂驻湘西。于是，夏斗寅与老上级张笃伦开始并驾齐驱了。

后来，湖北省籍保定军校出身的张森、万耀煌、余式穀等人，因受北洋军阀的排挤，苦于投靠无门，听说夏斗寅在湘鄂边界树立武装，便相继投奔而来。夏斗寅得到了他们的鼎力相助，军容颇有起色。当时，两湖形势变化无常，夏因有万耀煌等人的出谋献策，倒也应付自如。所以有人说他虽识字不多，但心胸宽大，善于驾驭良材，颇得人心。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夏斗寅乘湖南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之机，扩充队伍，自任鄂军司令，进驻长沙，对外称“鄂军军官团”。夏担任长沙城防司令。此时，湖南各军相互兼并，长沙几经易主，夏部因系客军，不倒向任何一方，只维持长沙治安，故能久留长沙，相安无事。

1921年，鄂人以北洋军阀王占元久踞鄂省，民不堪命，发动“驱王运动”，请湘军援助。湘军推赵恒惕为援鄂总司令，赵将夏斗寅部临时扩编为自治军混成旅，任夏为旅长兼驱王军别动队指挥官。夏部官兵，均系鄂人，久居湖南，思乡心切，此次有机会打回湖北，个个兴高采烈，士气甚旺。别动队先头部队一气打到距武昌三十里的纸坊，另一部已渡江进占沔阳新堤。吴佩孚见势不妙，掘开长江金口堤闸，引江水倒灌驱王军阵地，夏部全军溃退。

夏斗寅退回长沙后，赵恒惕见他出师不利，很不满意，就扣他的军饷，意欲兼并其部队。当时夏部只有三个营，每人每天仅发一个铜元作菜钱。后来连这点微薄的菜金也难以继了。夏斗寅愁肠百结，终日昏睡，一筹莫展。正在穷极无聊之时，有个轮船公司经理邀夏斗寅去玩牌，夏因囊空如洗，坚不应邀。但那位经理打保票说，决不难为夏司令，夏方敢前往。不料第一次麻雀战，夏竟赢了六千元。初战告捷，大喜过望，从此便带上小老婆每天在牌桌上鏖战。结果屡战屡胜，共赢得二万元大洋，用作军饷，终于度过了难关。

在牌桌上，夏斗寅结识了两位湖南的知名人士，他们在赵恒惕面前为夏说项，无非是说夏部是武昌首义遗留下来的部队，应当受到爱护，否则，就对不起蒋雨岩（作宾）、孔雯掀（孔庚），且与湖北人结仇，也不明智等语。于是，赵恒惕就划拨浏阳等三县防区给夏斗寅。当时防区驻军，在辖区内称王称霸，就地取饷。夏斗寅利用这个机会，收编浏阳东乡土匪，私购军火武器，大肆扩充实力。

湖北的“驱王运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督军毕竟换了肖旭南。肖是湖北人，这样，表面上满足了“鄂人治鄂”的要求。肖当了湖北督军后，夏斗寅请人在肖面前游说，被允编为湖北第二混成旅，每月协助饷银五万元，但以后不进鄂境为条件。江西督军方本仁，系湖北黄冈人，也想维持夏部实力，使其将来可为己用，也协济夏部军饷五万元。赵恒惕仍按月拨饷二万元。这样，夏斗寅每月可得十二万元饷银，维系三团人马之需，绰绰有余。此时夏真乃春风得意，乐不思蜀，姨太太就有三房之多，身体也越发发福起

来。“夏胖子”的绰号，即自此始。

二

1926年，大革命浪潮席卷南方，夏斗寅知机不可失，即偕万耀煌赴广东，接受蒋介石改编。蒋将该部编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委夏为师长。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战斗序列，受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节制。1926年7、8两月，北伐军出征湘、鄂，夏斗寅虽率部参加了攻略长沙、岳州、汀泗桥诸战役，但都是担任偏师，未建大功。8月下旬，夏斗寅师由武昌金口附近渡江，在袭取汉阳城的前进阵地新滩口时，表现了英勇果敢、冒险犯难的作战精神。9月初，进驻汉阳县侏儒山，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当地民众箪食壶浆，夹道欢迎。9月3日，夏斗寅抵达蔡甸镇，该镇市民万人空巷，鞭炮齐鸣，争相一睹革命军夏师长的威仪。5日，蔡甸镇举行数万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夏斗寅出席讲演，并慷慨激昂地带头高呼“拥护孙总理三民主义！”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口号。

9月6日，北伐军攻下汉阳城，7日攻克汉口。夏斗寅奉命集结部队于蔡甸上游三十里汉江北岸的新沟镇，星夜向孝感疾进，以占领花园车站为目标。夏斗寅用兵神速，出奇制胜，截断了吴佩孚残部北窜的退路。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各军纷纷扩充部队，唐生智的第八军扩充最多，所属第二、四两师，扩充为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原师长何健、刘兴分别升任军长。夏斗寅的鄂军第一师，则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仍任师长。夏

自觉功不在何、刘二人之下，而无擢升，甚感压抑，因而心怀不满，乃主动请求总政治部委派包惠僧为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包系共产党员，湖北黄冈人，夏企望能利用与包的大同乡关系以维护他部队的生存。

1929年10月，夏部进驻宜昌、巴东、秭归一带，在鄂西布防，以阻川军东下。

次年5月中旬，北伐军在中原战事吃紧，武汉政府统率的唐生智、张发奎、蔡延各军在河南与奉军主力张学良部激战于平汉线。武汉留守部队不多，后方空虚。此时，四川军阀杨森意欲乘隙进攻武汉。杨探知夏斗寅在鄂西一带兵力分散，疏于防范，宜昌仅驻有少数部队，于是以一师之众，分乘火轮数艘，秘密通过巴东、秭归，突袭宜昌。此时，夏斗寅正醉心于鸦片生意，不大过问军务，川军一至，即毫无抵抗，仓皇逃至沙市。当时，武汉政府畀夏以镇守宜昌重任，今竟不战而逃，夏亦深恐追究责任。而杨森部紧追不舍，情势危急，夏乃与老友蓝文蔚（沙市征收分局局长）商讨对策。蓝建议夏一面纠集部队死守沙市，一面急电武汉政府求援。

其时，宁汉政府意见分歧，蒋介石得知夏处境困难，密电夏一致反共。夏表示意愿按照蒋的意旨行事，立即制订反共计划，并电告杨森停止进攻，共同反共。同时，与蒋介石约定，以夏师占领武昌为信号，请何健、刘佐龙部在汉江沿岸和鄂东开始行动。

为避免引起唐生智的怀疑，夏再次向唐生智求援，希图唐抽调武汉驻军，以削弱其防御能力。夏斗寅计划将部队全部集中沙市后，连同眷属一起，速乘大小火轮、木船，趁长江涨水之势，偷越城陵矶（此时城陵矶有唐军吴尚师一部驻

守)，在金口登陆，急袭武昌。杨森表示同意立即停止对沙市的军事行动，并调部沿汉江进逼仙桃镇。

14日晚，夏部以团为单位，由沙市开拔。原定在金口登陆，一举占领武昌。但万耀煌力主谨慎从事，认为金口距武昌仅六十华里，如果贸然登陆，目标暴露，进退两难，稍一受挫，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而改在离武汉百余里的嘉鱼登陆，夏也认为在嘉鱼登陆，活动地区大，进攻不成，还可以向鄂东撤退，比金口登陆安全。于是决定部队在嘉鱼上岸。

武汉国民政府对夏斗寅的异动，已有所察觉，乃派与夏斗寅有旧交、曾与万耀煌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黄陂人任剑若星夜奔赴嘉鱼，劝说夏、万勿自绝于武汉政府，被夏、万枪杀于嘉鱼城。

夏斗寅的前卫部队刘绳武团，于16日进抵纸坊附近，夏斗寅认为攻占武昌，已是探囊取物，遂于当晚发出通电，声讨武汉国民政府，称“共产党盘踞要津，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云云。

为此，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警备区司令官叶挺，率部阻击夏军。这时，武汉防卫兵力单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只有一个营守卫汉口；第四军张发奎部在武昌虽有一个团，但都是新入伍的新兵，一面还在学习瞄准，一面即出发上前线；临时组编以武汉军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央独立师，也不过二三千人，且都未上过战场，训练素质差，战斗力很低。而夏军已逼近纸坊，威胁武昌。叶挺当机立断，抽调一个团，星夜奔赴纸坊，扼守该地。随即与邓演达、恽代英等策划平夏作战方案。叶挺分析：夏斗寅部有两旅四团，

第一旅长万耀煌，辖刘绳武、潘祖信两团，第二旅长张木楷，辖余式毅、刘道生两团。旅、团长均为保定出身，部队训练有素，但每团枪枝不到一千，仅配备一个机枪连，缺乏重武器；师部附有山炮一连，战斗力亦不强。经过研究判断，决定连夜组编坚强部队，占领纸坊至土地堂一线，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叛军。当时整个兵力的部署是：中央独立师以三个团组成，第一、二团系军校学生，第三团由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编成，合计人枪共五千余。一团由叶挺直接指挥，驰赴前线；二团由师长侯连潭统率协同叶挺的警备部队戍守武昌；第三团以一部赶奔金口，警戒侧翼，其余作预备队留控城区。部队出发前，在南湖飞机场举行誓师大会，出席大会讲话的有邓演达、恽代英、宋庆龄、陈独秀、毛泽东、吴玉章等人。

5月16日夜，叶挺率中央独立师第一团由武昌乘火车开赴纸坊。17日拂晓，夏军前卫刘绳武团附山炮二门进抵纸坊附近，发觉已有戒备，乃匆忙占领阵地，并先发制人，炮击守军。叶挺命部队从两翼展开，亲率预备队至中央督战，一面以猛烈炮火压制敌人，一面麾师步步跃进。激战两小时，终于占领了两侧高地，夏军正面开始动摇，叶挺乘势冲杀，一举从中央突破，摧毁了敌炮兵阵地，缴获山炮二门，俘敌一个排。刘绳武全团向土地堂方向溃退，叶军乘胜追击。

是日正午，万耀煌旅在土地堂占领阵地，企图阻止叶军，并以重机枪集中在铁道上猛烈扫射。叶军前进过猛，略有伤亡。叶挺当即命令向万耀煌部背后左右迂回，获得成功。左翼部队迫近敌机枪阵地，夺得重机枪两挺，右翼部队挺进至铁道线，万耀煌惊惶不支，率先逃跑，结果全线瓦

解，溃不成军。

夏斗寅获悉土地堂一战，万耀煌仅以身免，叶挺又率部紧追不舍，知道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遂命所属部队分路撤退。当退至湘鄂边境时，又为唐生智所部张国威师所阻，乃折返崇阳山区。又惧叶军追入山区，故连夜退至阳新、大冶，由黄石港偷渡长江，经浠水、英山，于6月初抵达安徽宿松、太湖一带。

夏斗寅虽未攻入武汉，但此次偷袭已沉重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引起了武汉政府内部矛盾的加剧。同时，也导致了许克祥等敢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所以，夏斗寅虽然打了败仗，蒋介石仍认为是有功之臣，特派朱怀冰（黄冈人）为宣慰特使，携带现金数十万和许多慰劳品至太湖劳军，并擢升夏为新编第十军军长，以朱怀冰为参谋长，指定安庆为其防地，此后夏斗寅就完全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了。

三

1928年底，新编第十军整编为陆军第十三师，夏斗寅任师长，奉蒋介石令移防至湖北。部队分布在大别山一带，担任反共任务。次年夏，蒋冯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命十三师就地“戴帽”，编为十三军，夏任军长。此时，唐生智与蒋有隙，通电反蒋，夏斗寅奉蒋之命，部署讨唐。而唐生智也拉夏共同反蒋，任命夏为“护党救国军讨蒋前敌总指挥”。夏即在信阳召集全军干部会议，当众宣布蒋、唐双方的任命，征询部属意见。会上无一人发言。夏乃表态说：“唐孟潇

（生智）反复无常，很不可靠。”部属于是一致主张拥蒋反唐。会后，夏命令工兵营将平汉路信阳北面一座大铁桥炸毁，部队进入战斗状态。蒋又急令其嫡系部队第三、六、八、九各师，兼程北上，归夏斗寅统一指挥。于是蒋、唐之战，在河南确山一线展开。时逢隆冬，漫天大雪，战斗极为艰苦。约半月，终将唐生智全部击溃，俘虏官兵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次战役，夏又为蒋立了一功。

1930年初，蒋介石因何成浚推荐，委派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是年夏，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命夏斗寅为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夏率部沿津浦路北上，在山东曲阜与阎锡山两个师、一个炮兵旅遭遇，被阎军包围，苦战月余，坚守至援军赶到，始一举击溃阎部。此次战役，动摇了阎锡山的整个津浦路线。夏斗寅又为蒋介石立了大功。

夏斗寅虽非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但因其效忠蒋介石，南北转战有功，故蒋介石视夏斗寅部为其基本武力之一。

夏自中原大战后，回任武汉警备总司令，持功而骄，觊觎湖北省主席位置。1931年夏，武汉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市区一片汪洋，死人无数。而当时湖北省省主席何成浚却熟视无睹，竟然游宴如故。夏斗寅乘机怂恿地方绅商，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何成浚“绥靖无方，防洪失职”。他还策动被何革职的省府职同刘维新等赴南京，印发传单，历数何“治鄂无术、祸鄂万端”的罪行。当时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与何素不相和，因而向蒋介石提议，应湖北人之请，撤何以夏代之。蒋听从了汪的意见，于是夏斗寅终于在1932年夏，登上了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宝座。

夏就任时，正值鄂东北、鄂西北各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茶，势成燎原，夏组织“湖北清乡会”，进行镇压。后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夏出力很多，颇为蒋赞赏。1933年，夏组织编纂《湖北文征》，常邀集一些文人学士饮酒赋诗，附庸风雅。

夏斗寅当上湖北省主席后，时刻担心何成浚报复。何此时任驻鄂绥靖主任。为了赶走何成浚，免除心头之患，在蒋一次留居武昌期间，夏不时晋见蒋介石，哭诉何成浚如何处处与他为难，妨碍施政云云。有一次竟跪在蒋介石面前，涕泣陈词。夏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就在夏斗寅下跪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他亲自主持，有总部、绥署、省府、省党部等要员全体参加的“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上大发雷霆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地干，反而相互攻讦，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真是难缠。’”

蒋介石的这一顿臭骂，使夏斗寅当场下不了台。蒋骂省主席、省党部委员无耻，人们只是作为笑柄，但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湖北人都认为蒋身为领袖，出言无状，啧有烦言。蒋亦自知，当时由于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有失官箴。乃派宋美龄出面，开了一个茶话会，招待省府、省党部及社会上层人士，说了一些讨好湖北人的话，于是一场“九头鸟”风波，才算平息。

“九头鸟”风波平息不久，蒋介石即以“剿匪”前线兵力不足，将夏斗寅之第十三军调离武汉，夏既为省主席，不能随军行动，可保荐该军师长继任军长职务。夏斗寅于是举

荐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升任第十三军军长。这是夏斗寅丢掉兵权之始。

兵权既失，省主席的宝座自然也岌岌可危。当初，夏就任省主席时，曾听从幕宾的建议，招贤纳士，广集宏猷，希图一新耳目，以稳住省主席宝座。因在编制之外，自行设置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将当时所谓社会贤达，都聘为定计委员，月支车马费颇丰。1933年2月的一天，“三省剿总”密书长杨永泰突然打电话问夏斗寅：“‘湖北省政设计委员会’是根据什么法令成立的，是否已报中央核准？”夏仓卒之间，不知所措，只得含糊其词地答道：“我查查，再告诉你。”杨在电话中厉声说：“这是委员长命令我问你的，请你注意！”说罢，便“啪”地一声，挂上电话。夏斗寅见势不妙，随即具文呈报蒋介石，对“省政设计委员会”的建立，有所申辩，并微露引咎辞职之意。几天后，南京行政院即批准夏斗寅辞职，代之以张群。至此，夏军政两权皆失。蒋为了安慰他，乃委以“剿总”上将衔总参议。当然，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职而已。

1934年，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斗寅取得了出席代表的资格。他希图当上中央委员，作为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可是选举结果，因“CC系”操纵，夏落选了。同时落选的还有刘湘、熊式辉等军政大员。蒋介石为了敷衍刘湘等人，将陈立夫骂了一顿，拉下了“CC系”几名，将刘等补进，而夏斗寅仍在中委圈外。夏极为沮丧，百般无奈，只得又央求何成浚为其说项。何碍于情面，在蒋、陈面前婉为疏通，夏斗寅才戴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桂冠。

四

夏斗寅有一妻二妾，二姨太太王锦兰，尤为夏所宠爱，夏的全部金银珠宝及外国银行存折，均交她贴身保管。后来，王锦兰在南京结识了朱家骅，经常与朱出入牌场、舞厅，厮混日久，两人勾搭成奸。王遂席卷巨款私奔，朱将其藏之于密室。一、二两年后，朱、王正式宣布结婚。夏斗寅愤恨至极，大动肝火，准备与朱一拚，但因系姨太太，这种婚姻关系，得不到法律保护。且朱家骅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浙江省主席等要职，来头颇大，夏亦奈何不得，最后终于自认晦气了事。

夏斗寅的巨额存款虽为王锦兰所卷走，但仍不失为湖北旧军人中数一数二的豪富。他在老家麻城，占有大量土地；在武昌东湖，营建“养云山庄”，圈地近千亩；在庐山，有避暑别墅；在汉口和武昌昙华林，还有两幢豪华的住宅。

抗战后期，夏斗寅长期蛰居成都，虽挂着成都行辕上将总参议的头衔，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抗战胜利后，成都行辕撤销，夏转为立法委员，由四川回到武汉。这时，他的旧属万耀煌已荣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但对他这位老上司，也并无什么尊崇的表示。以后，夏斗寅便闲居武汉，经营他的东湖农场。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夏在进步力量影响下，一度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救济委员会”筹建工作，并曾在布告上签名。同年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夏斗寅曾任武汉治安

委员会委员。但夏自度一生反共，心殊恐惧难安，乃于7月偕长孙夏汉生，搭乘英国兵舰经上海去香港，后在香港六国饭店以星相为业。

1951年，夏斗寅在香港病歿，时年六十七岁。

（高卫华）

顾敬之其人

胡梅兰 李敏

凡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商城生活过的人，没有不知道顾敬之的。顾敬之何许人也？顾敬之，名莹，原名忠肃，河南商城人氏，1888年出生在一个肉头地主家庭里，毕业于湖北政法学堂，自大革命失败后，拉起民团，经营亲区，与麻城东八区的郑齐玉民团沆瀣一气，顽固反共，构成一堵横插在鄂豫皖苏区红色根据地中心的黑色堡垒。顾敬之曾两任商城县长。四次充任“剿共”游击司令，倍受国民党政府的青睐。红军老战士们一提起他，无不切齿痛恨。

“反共能手” “顾狗子”

据叛徒张国焘（时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军委主席）《我的回忆》中说：“我一踏进亲区，便觉得这里的情况，与前次所经过的沙窝区迥然不同。沿途所见阡陌都是绿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还新种着参差不齐的小树，道路平坦，桥梁坚实，足见顾狗子对于农村建设十分注意，路旁农舍也相当完整，我所进入的民房，屋内布置也大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厨房炉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刚刚上山去了。我看顾狗子所统治区域的这些情况，觉得这个土皇帝在安定农村方面，比蒋介石还要高明些，如果蒋介石向他学习一些办法，

也许我们的困难更多了。”这足见顾敬之的良苦用心了。

顾敬之反共颇具特色。毕其生之精力，精心经营反共大本营亲区。其时，商城县制分城、康、和、乐、亲、安、平七区，亲区系商城南邑，鄂豫两省交界处，与和、乐二区毗邻。1929年5月，商南（和、乐二区）起义成功后，顾敬之视红军、苏区为“洪水”、“猛兽”，为防“赤匪”蔓延。顾敬之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颇受地主豪绅和不明真相的民众拥戴。顾趁机扩大民团，购买钢铁，制造枪炮，规定三户共买一枝枪，实行“全民皆兵”。民团高峰五千余人。顾采纳其族弟顾耀初（曾加入共产党，任国民党县党部农工部长，是广州农讲所六期学员），堂弟顾祥斋（武汉中学学生，曾经商城早期共产党员董汉儒介绍加入国民党）提出的一些社会改良政策，制订亲区人民公约，实行二三减租，抑制豪强。借贷利息不许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境骚扰。实行法西斯统治，私设公堂，严刑酷吏，区内人民如参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亲区人民迫于顾敬之的淫威，很少有人参加红军，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大片红色区域中的一个白色据点。

在军事上，顾敬之采取“游击战术”“以共制共”，红军大部队清剿时，他躲入深山老林，坚壁清野；小股部队过境时，他集中兵力，能吃掉的吃掉，不能吃掉的踩尾子，或乘夜偷袭；伤员、交通员进入亲区，便被所谓“全民皆兵”吃掉。民团士兵穿老百姓一样衣服，红军逼近时，分不出哪些是匪，哪些是民，有时他们躲在暗处放冷枪；有时你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他们利用地形熟悉与红军捉迷藏。红军将士恨透了顾敬之，只是无可奈何。1931年四、五月间张

国焘要从新集去金家寨，途中非经亲区不可，派战斗力最强的红十师三十团护送。其时，团长王树声、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他们来到亲区，在一山岗茶店休息，王新亭对店主说：

“快去报告你家顾大老爷，说我们是有名的三十团，有钢枪八百多根，重机枪四挺，路过此地，不会损害你们一草一木，请不要留难。否则，当心我们报复！”那老店主飞快报告顾敬之，顾敬之果然未轻举妄动，待三十团走后，民团才朝天放几枪了事。

顾敬之仰承其主子鼻息，甘当其“哈巴狗”，“马前卒”。1929年6月，国民党商城县长李鹤鸣带县大队“清剿”商南时，反被红三十二师所困。顾敬之闻讯，亲率民团解李之围，得到李的赏识。1929年12月25日，红三十二师一举攻克商城，翌年春顾敬之联络地主豪绅610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声称豫南、皖北赤党林立，声势浩大，一日千里，若长此悠忽，大河南北，将无干遗”，恳请蒋介石“立震天威，火速调队痛剿，以遏乱萌，以解倒悬，不胜急切待命之至”。同年底，顾被委任为豫南特区第五游击司令。1931年6月，张国焘命令徐向前率红四军两万余人去亲区解决顾敬之民团。顾敬之采取游击战术，红四方面军清剿两月余，未能将其铲除，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因之封顾敬之的亲区为“全省模范区”。1932年1月19日至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商潢战役，蒋嫡系第二师师长汤恩伯，十二师师长曾万钟，二十路总指挥张钫被围困在商潢公路上动弹不得，驻守商城的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也因出城求援被隔在潢川无法归队。在这危境中，2月10日，五十八师参谋长孙毅新率残部突围到亲区，由顾敬之民团为之开道，突围到湖北麻城境内，三天

后，张钫就任命顾敬之为商城县长。1932年冬，蒋介石任命老牌军阀刘镇华为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刘镇华又看中了顾敬之这条哈巴狗。10日，刘镇华又委任顾敬之为鄂豫皖三省边区剿赤第一路游击司令。1934年顾敬之的第一路游击师发展到四个团，约四千人。1936年3月，国民党军队整编，顾任河南省保安第五团团团长，驻扎潢川。1938年7月，顾又任第五战区第十一游击司令。顾拥兵自重，东北军张学良部及驻在开封国民党军刘峙曾想剪除顾敬之，顾敬之则采取行贿，慰问驻军等手段得以过关。1943年10月，信阳师范商城分校闹学潮，顾敬之枪杀无辜，八十四军军部把顾敬之请来，在打牌中谈及此事，顾央求部下输得越多越好，一次暗送光洋二万余元，八十四军对此事也就不予深究。

杀人魔王“顾屠夫”

顾敬之杀人嗜性。商城民众云：“不怕顾敬之骂，就怕顾敬之笑。”顾敬之杀人时常发出狰狞的笑声。进入亲区达权店，爬上一个土岗，中间凹两面高，名曰“鬼门关”，过关不远，坡南有很大一块石板，名曰“落魄石”。这便是顾敬之屠杀人民的刑场。

1929年7月，顾敬之随国民党夏斗寅十三师及安徽省防旅“清剿”南溪，一次杀害共产党员，红军家属一百余人，残酷折磨商南早期共产党员，临时革命政府副主席占谷堂，致死于狱中。

1932年10月，顾敬之随国民党军七十五师进“剿”商南根据地，以“清乡”为名，几天内抓捕苏区群众三百余人，

顾将其中一百余名“党婆”拍卖，分配给下属团丁做老婆，又将其其中96人押到长竹园五里山西洼口挖下2丈宽，3丈深的大坑，中间用树搭一“奈何桥”。顾敬之手持名册，恶狠狠地说：“今天叫你们认得我顾敬之？”顾点一个革命群众，刽子手手起刀下人头落地，身体掉入“万人坑”中，其状惨不忍睹。刽子手杀一个，顾奖光洋一元，两个刽子手累得大汗淋漓。

1933年，顾敬之率民团并胁迫亲区群众倾巢而出，随国民党军七十五师进剿商南苏区，在西河桥，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把西河桥地区老幼青壮年全部杀光，把青年妇女押回亲区拍卖，把耕牛、猪羊赶回亲区，农具、用具能搬走的搬走，不能搬走的石槽石磨推入河塘之中，最后一把火烧掉房屋，山林。整个西河桥方圆十几里成了一片焦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顾敬之杀人手段极其残忍，除斧剁刀砍、枪杀、活埋外，还集古今酷刑大成，请君入瓮（把人放到大铁钟内，外面用火烧），剥皮抽筋、分尸（把人手脚分绑在两棵树上，手一松，人撕成两半），令人发指。顾之卫士班长武恩瑶，偷放了两个苏维埃干部，顾欲加害于他。武连夜携枪逃，被顾手枪班捉住。顾审问武恩瑶：“你说出共产党的组织，我免你一死。”武说：“我不怕死！”顾敬之一声冷笑，抓过一把斧子，剁掉武的五个脚趾。顾问：“痛吗？”武答：“老子死都不怕，还怕痛吗！”顾又剁掉武的全部手指和另一脚趾，又命人用大铁钉把武钉在大松树上，武直到钉死仍骂不绝口。黄泥塆的吕大个，苏维埃时期曾任土地委员，主力红军转移后，掩护过游击队员，顾发觉后，将其逮捕拷问，要

他说出游击队活动的情况，吕大个守口如瓶，一言不发。顾将其吊在树上，用开水从他头上往下淋，烫出一身水泡，然后用扫帚把水泡扫破，用白麻匹粘在吕的身上，待水干后，抓住麻匹头，一拉一路皮，一扯一道肉，顾名之曰“剥皮抽筋”。一次，顾敬之从大木厂捉来一位农民邓延中，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邓不承认。顾见他的名字有一个“钟”字，便搬来一口大铁钟，把邓扣在里面，四周架起干柴，燃起熊熊大火，把邓活活烘死。火熄烟灭之后，发现大钟被邓顶动三尺多远。

顾敬之不仅猖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还乱杀无辜，对其不顺，无事生非，动辄杀人，商城民众称顾敬之为“杀人魔王”、“顾屠夫”。

专横跋扈的“土皇帝”

顾敬之1932年9月曾任商城县长，翌年2月辞职，1938年中日战争事起，顾敬之虽反共，但民族气节尚存，赞同团结抗日，曾邀请“抗演二队”和“商城学生战时服务团到亲区宣传演出。9月，日军陷商城，顾率民团不时袭击日军，使其不敢轻易出城骚扰。10月，顾曾宣布：“凡是种我的田地的农民一律免租”。11月，日军退出县城，县城遂告收复。顾为首的地方豪绅，联名上告商城县长杨必声（系中共党员）搞“赤化”活动，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遂将杨必声调任英山县长。12月，提任顾为商城县长，自斯时起，至1946年5月被收监为止，统治商城达八年之久。

顾敬之上台后，即召开全县士绅大会，推行其治政方案。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县党部，顾建立了一支一千多人的行动队，专门侦探共产党情况；在县政府建立了特务队，设特务秘书，防共小组，专办共产党案件，还设有便衣队，在城乡四处活动，刺探共党消息。顾要各区乡按月填报“匪共动态报告表”，凡有共党嫌疑，顾得知即捕。非杀即罚。在社会治安上顾敬之对匪盗、吸烟、赌博、娼妓亦予禁止。发现匪盗亦派员捕杀之；发现吸烟、赌博、为娼亦派员捕捉，重者杀头，轻者罚款，没收田产充公或毒打。一次，顾敬之舅舅在其家吸烟，顾回躲避不及，将烟头藏在衣袖里，把衣服烧着不敢出声。顾禁烟、禁赌、禁娼是禁民不禁官。顾本人则不烟不赌。一时间商城盗匪、赌博敛迹，烟馆、妓院关门。

顾在任职期间，网罗私人势力，其堂弟顾祥斋，亲信张耀东为左右臂，掌握武装，各科要员均系顾的党羽，并抬举族弟顾耀初为省参议员，省党部督导员。顾身边有卫队60余人枪，并直接控制县便衣队，谁要说顾的坏话，即有杀身之祸。顾每次外出，随带护兵十余人，坐轿或步行，头戴博士帽，身着长袍，满脸横肉，威风凛凛。顾审理案件，刚愎自用，全凭个人好恶，予夺生杀大权。顾敬之一手拿钱对上，一手拿枪对下。残暴骄横，乱杀无辜，贪赃枉法，籍端勒征，俨然一个土皇帝。1946年商城旅汴同乡会代表44人，商城民众代表6人，商城临时参议正副议长2人，商城旅皖代表2人，被害家属45人等共99人联名上诉河南省政府监察院，控告顾敬之的罪行，经河南省监察院调查核实，顾敬之浮报县政府建筑费3300余万元，侵吞赈石捐麦稻8270余石，

侵吞滞纳罚款稻谷1390余石，侵吞1943年度核减田赋3000石，侵吞田赋斗余1470余石，扣发军粮280余万元，侵吞枪价720余万元，勒征财物建筑明达中学房屋800余间，勒征稞石捐30余万石（老斗），勒征民夫不给工资建筑私宅200余间，勒索民产210余石，强募民田220余石，并于1947年4月7日判处顾敬之8个死刑，4个无期徒刑。

顾敬之自命不凡，蟒蛇精再世，以愚弄民众，其实是顾之一丑闻。顾的小老婆程氏与护兵刘天忠私通。一天夜里，刘去找顾的小老婆，恰逢顾敬之在床上睡觉。刘天忠急忙退出，慌乱之中，撞打茶杯。顾闻声醒来，问什么事，程氏为掩盖自己的丑行，捏造说：“刚才卫兵给你送茶，一揭帐子，看见里面盘卧着一条金鳞大蟒吓不过，打了茶杯”，

“老爷是神龙下凡，将来定有大福大贵！”。顾信以为真，并广为传说顾敬之到处寻找风水宝地，建造“宫殿”，准备当“土皇帝”。找到四方洼，这儿原住着一家姓熊的农户，一家96口，四世同堂，人丁兴旺。顾敬之赶走熊家，在这深山野冲中建造行宫。从1937年破土动工，至1944年完工，历时8年，占地3220平方米，房屋88间，正宅一进三重，正殿高十余丈，正宅两侧是厢房，与三重正殿走马转楼结为一体，用石柱石墩，青砖垒成，墙厚三尺，内有暗室，藏枪枝弹药，四角有炮楼。顾敬之曾夸口就是飞机扔重型炸弹也炸不毁他的地下室碉楼。顾敬之之妻早逝，后娶三妾，住在一起，嫌不方便，顾将他们分居三处住宅。商城民众称顾敬之

“三宫已就，六院未成”。长子顾幼之另居，在五层碉楼上设铜钟一座，以指挥方圆几里的庄农上下工，这在四十年代的大别山区蔚为奇观。

热心教育的“顾老板”

顾敬之少时，家中虽有田产，但无权势，常受穷汉“欺侮”，其祖父顾大发誓要儿孙读书做官，盼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遂把顾敬之送到湖北政法学堂深造未缘机会，顾只在其叔父顾春如办的局子里当一名小庶务。顾之入仕，全凭枪杆子反共起家，但深感文化水平不高，常以“老粗”自憾。时值日军占领武汉，商城属国民党桂系军队之防地，时局较为安定，士绅、民众要求办教育较为强烈。顾敬之顺应潮流大力推行国民教育。顾敬之办教育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1940年，顾将县立初中迁到新建坳，建校舍580余间，顾兼任校长。同年，顾又于新建坳创办私立明达初中。1941年，顾实行新县制，全县分1镇9乡151保，要求各乡办中心学校，各保办国民学校，并创办私立云姿高中，顾兼任校长。1942年7月，顾又请求报告，创办信阳师范商城分校。至1945年底，全县有中心学校24所，179个班，学生4810人，保国民学校166所，349个班，学生12526人，全县小学在校学生达17336人，顾还办有黑河女子学校，是为旧时商城县教育鼎盛时期。

顾敬之办学不惜重金延聘教师，时在外地教书的武朗山，刘经阁等。因外地沦陷返商，顾送银元礼品，高新聘请到新建坳任教，并乐于为他们效劳。庞大的教育机构，需要巨额经费。顾在乡保设“教育款产保管委员会”。加征裸石捐作为教育经费，同时将处置为匪、为赌、为烟、为娼之罚款作为教育经费。没收之田产、裸石捐充为学田。（学田达

3500石稞）并派亲信顾之妹夫，县教育科长李静庵，女婿、庶务余海霞、堂弟县立中学训育主任顾祥斋掌管，因而教育经费充足，对学习优异家庭又有困难的学生，顾办了“助学贷款”。

顾敬之筹措教具、图书不择手段。抗战初期，开封中学曾一度迁到商城，日军逼近商城时，开中又仓促迁往豫西，把全部图书留在商城。1943年春，开中派人取书，顾敬之昧书不给，说是日军将图书烧毁。开中告到省教育厅，顾敬之派人在大圆木板上写“图书馆”三个大字，钉在云娄高中女生宿舍楼走道大木桥栏杆上，然后叫人背几捆柴草放火一烧，桥身烧了几个大窟窿，桥栏杆烧得歪三扭四，残缺不全，“图书馆”三字也被烧得模糊不清。不久，河南省教育厅派督学吴尚智到新建坊视察，顾领吴尚智到被烧“图书馆”观看，诓骗吴尚智，并赠送二十响德国造手枪闭住吴的嘴巴。抗战时，开封师范流亡商城时，顾敬之将其一架大钢琴，一架大风琴劫下，留作私立云娄高中用，顾敬之还托人买回理化实验室设备。顾敬之私立云娄高中设有图书馆、音乐厅、实验室，这在封闭的大别山区，颇开生面。

顾敬之还演出了一场考场传题的丑戏。其时，国民党政策是，县只设初中，不设高中，云娄（商城古地名）高中乃顾之私生子，需经省教育厅进行严格考试才能获准办学。省教育厅派员监考，只允许顾一人入场协助监考。当时，有一道数学题，学生们一筹莫展，顾通过考场护兵将题传出，解答出来后，又带进考场。顾假装吆喝“不准抄袭！”暗将答案交给考生。结果这次云娄高中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获准办学。鄂豫皖三省边区数县学生慕名而来就读，云娄高中教职

员工家属达300余人，学生达800余人，名扬三省。

顾敬之常到各学校视察、训话，进行反共宣传，鼓吹“男女有别”。在云娄高中组织司令部学生，进行特务、军事训练，借以监督广大师生。不准男女学生交谈，即使是亲兄妹在一个学校读书也不准来往谈话，有事写条子交班级老师转交，违者关禁闭，重者开除学籍。1943年，信师商城分校校长赵延年与训育主任张栋臣相勾结，贪污学校公款，克扣学生助学金，诬陷正直教师，引起学生公愤，爆发了驱赶校长，痛打训育主任的学潮。赵张告顾，讲“学校有异党”，学生造反。顾得知，派军警包围学校，登台训斥学生说：“你们现在身上长有毒瘤，需要割去，得用‘刮骨疗毒’的办法，我今天就是给你们割毒瘤的”。当场将学生鲍其福枪杀，反推说是卫队误伤。

顾敬之办教育，妄图培植私人势力，网罗人材，但事与愿违，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社会所利用，现在商城五十多岁以上的骨干教师及党、政务工作者，几乎都是顾敬之办教育时的学生。

顾敬之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产生的怪胎，他既是一个“反共能手”，蒋政权的忠实走狗，又是一个尚有民族气节的炎黄子孙；既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顾屠夫”，专横跋扈的“土皇帝”，又是一个热心教育的封建愚昧的卫道士；既是蒋政权的“座上宾”，又是其“阶下囚”。1948年7月，开封解放，顾敬之乘机逃出监狱，1950年逃往香港，后去台湾，一心想乞怜主子宽恕，蒋介石却将他一脚踢出门外，顾敬之只得漂流香港、台湾街头，卖茶水，卖烧饼，苛延残喘，在香港与顾姓老姑同居，又为同乡所唾弃。1972年暴尸

香港街头，还是同乡会的几个人，凑一些钱将其埋掉，这就是顾敬之与国人为敌作恶多端的下场。

本文参考资料：

1. 商城县志办《顾敬之》；
2. 商城县档案馆《顾敬之的罪恶》；
3. 《商城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4. 商城县志办抄录的档案资料及调访资料。

名人轶事

梅之焕趣闻二则

王焕东

自恃才华 科场放任

明朝末期，我市先贡梅国祯曾在朝中荣膺兵部尚书之职。梅之焕是他的侄儿，正当少壮读书时期。一次，朝中派一学谕到湖北省学院掌教，学谕名杜子陵。临赴任前夕，晋谒梅国祯，询问尚书大人令郎名字，这是杜学谕对国祯大人子弟之关怀。国祯尚书答曰，家中有一侄子名之焕，天资尚可，但不专心读书，习气喜欢打流。杜学谕赴任后，招考全省优贡生，留心梅之焕名字，见报考册上确有其名，而科场中却无梅之焕赴考。杜学谕亲自监考，第一天未见梅之焕，第二天仍未见，第三天下午才见一书生赴考。杜学谕问，汝是何人？答曰生员梅之焕。杜学谕怒曰，汝在考场时如斯放任，到何处打流去了！责令其跪下。跪约时许，杜学谕叫起就席作文。梅之焕见时间紧迫，自恃才华，不起草稿，将诗文在试卷上一挥而成。先进场三天应试之生员均未交卷。之

焕将文卷面呈杜学谕，学谕阅后大惊，拍案叫绝：真才子也。遂录取全省第一名。第二年梅之焕赴京殿试考中翰林，梅大人遂寄一首七言绝句给杜学谕以雪其下跪之耻：

去年今日跪龙门，今年今日入词林。

文章自古无凭据，寄与江南杜子陵。

假扮游学 祝寿惊宾

梅之焕大人荣膺七省巡抚时，一次丁忧回家理丧事，路过豫省途中某县听群众言，某月某日要给某人祝寿，梅大人听后置若罔闻；途经某县又听群众如前言，仍不当回事；后经某县，群众又如前言，梅大人始大惊云：此人为何这大声名，三县人均言给他祝寿！询及群众，究是何人？群众答曰：我县某大人年高百二十八岁，是世胄官家门第，每年寿日，数县县令、知州大人及所有科第学士、缙绅先生，均赴他家向老人祝寿，庆贺之日异常热闹。梅大人听后记在心中，回家理毕丧事，仍返赴河南，假扮游学书生，寻到该寿老家中，该家果是世胄门第，屋宇高敞，花园亭榭，极为幽雅。该家延有一西席，是举人出身，教育该家子弟及邻村儿女。梅大人谒见教书先生，在初与叙谈中，教书先生即对梅大人甚为钦佩，以礼相待。一日先生命一题给学生做，梅大人给学生改正，教书先生阅后大惊，暗想该生不可能作出如此好文，因询学生，生曰湖北游学先生改正。因此，教书先生益为尊重梅大人，并请代教小学生，不须到处游学糊口。大人允诺，共同相聚教学。一日东家请老师吃酒，也请一下梅大人。二人赴宴时，东家请举人先生坐首席，举人先生请

梅大人坐，梅大人不推辞坐上首席，举人先生心里并不介意，可是东家大为不满，认为我是请教书先生并非请湖北人，湖北先生不讲礼。过数日，另一学生请教书先生，未请梅大人，梅对小学生说，你们为何不请湖北先生，学生答曰，我父亲本想请湖北先生，因湖北先生不讲礼，所以不请。梅大人才知是前次坐了首席之故。一日时届东家寿诞，宾客满堂，县令、知州、科举学士、缙绅先生相继登堂送礼祝寿，教书先生同样在坐，笙歌鼓乐欢庆异常。寿星高坐堂中，知州、县令依次入座，并未请梅大人，且将梅大人坐首席不讲礼事传遍宾客，人人皆知。梅大人此时既无礼物可送，又无美服可穿，是个游学书生身份，毅然闯入客厅。一进门就听有人言“这即是湖北不讲礼之游学者，大家不要睬他”，东家也不请他坐，也不献茶。梅大人在此遭藐视之际，灵机一动，自己酌杯茶走到堂中，向上走了三步行朝王之礼，知州大人一见，惊起请梅大人上坐，并将自己坐椅相让。梅大人遂入坐与知州畅谈，在相谈叙中，知州谦虚钦敬。寿星及满堂宾客见此情景大惊，众人心想，知州为何也来尊重这湖北不讲礼之人，他有何长可取。未几宴席摆齐，众宾客推知州坐首席，知州请梅大人坐首席，梅大人不辞就坐。东家及宾客认为河南首席被湖北不讲礼之人坐了，均为愤愤不平，因知州在坐，未敢发怒。各学士密议，要考考梅大人，提议行酒令，临到谁人，就为谁说，要以“贡文”、“四书”上文章为说辞，因此大家先一一说毕，临到梅大人说了，众学士云，如说不出就罚酒三杯。梅大人冷静言道，诸位精采的均说了，我就以手上这个疮来说，辞曰：“生的是血，熟的是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欺我

者欺天乎。”众宾客听毕大骇，均面赤默默不敢多言。梅大人仍与知州畅谈，不睬他们。酒筵散后，有人提议请知州给寿老提匾，知州仍请梅大人提匾，梅大人慨然命笔，书“年眼一文”四个大字，仍入坐饮茶，与知州谈笑风生，旁若无人。满座学士见“年眼一文”四个散字均不理解，未知出于何经何史，连知州也不探其奥，一霎时满堂气氛沉默。还是知州比较高明，请湖北先生在匾上题名。梅大人提笔书下“七省巡抚梅之焕”。知州及满堂宾客寿星大惊，均跪地请罪。知州向梅大人请教云，这“年眼一文”四字作何理解。梅大人云，你们不懂，我讲给你们听：“年周二甲半，眼观五代孙，一声波浪起，文星祝寿星。”边说边将其余的字补写上。言毕，满堂宾客及寿星大喜，遂重整筵席，欢宴梅之焕大人。

这是我童年时先祖润之大人讲给我听的一段趣事。

（作者简介：王焕东，麻城人，名老中医，1996年去世。生前曾任麻城市政协委员。古体诗、文俱佳，尤其是书法作品古朴豪放，章法严谨，收放有度，张弛得体，在本地独树一帜，日常求联者时有之。编者）

懲寇篇

智溺日寇

罗文祥(68岁) 罗学奎(79岁)口述

黄昌益记录

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盘踞在宋埠镇的侵华日寇出动到白果来打掳，沿途老百姓闻讯均已逃避。一个掉队的日军士兵，在大路上东张西望缓步东行，将上白羊冈（现在的变电站）被白术寨看垸的农民罗启福、罗先义发觉。这个日军头戴钢帽，身挂榴弹，肩荷步枪。罗启福担心地对先义说：怎么还有一个广西佬（国民党军队）没有跑，他还不知道白果到了日军，赶快叫他到我垸去躲避。启福迅步近前一看：

“呀！还是个那。”（指日军）即附耳对先义说，想办法叫他去见阎王。启福把手一扬，日军信步拢来了，向他们打手势，意指大部队向那里去了，大部队明明东去了，他们反指向西去了。遂带路将这一日军，引至白术寨，诱到茯苓冈庙里（白术寨垸的香火庙），这家伙一到庙里看筲箕里有冷饭，打手势要鸡蛋炒饭充饥。启福轻声对先义说，时候到

了，他们乘吃饭之机，将这饿狼似的鬼子用双手一把紧紧地箍起来了，旁边的罗先义和另一个叫罗文右的两大力士，一刹间摘下鬼子的枪架弹药用绳子捆了起来，剥去外衣，脱下皮靴牵到庙后马家里，看管了一夜。第二天又玩猴似的转到南竹垵监守了两天。他们打算押送到龟头河伪县政府去报功领赏，可是这三天里日寇调动大队人马在白果附近一带鸣枪吹号，四出寻找。罗启福警恐日寇发觉，第三天夜里遂将这个日兵用绳子系着一块青砖，沉到五世祖大塘里了。到半夜时庚，罗启福同罗先义到塘边去探望，恐露出尸首，不料这家伙滚了一身泥，从塘里趴起来了。他们吃惊地说：你还不想见到中国的阎王老爷！于是再加上两块青砖，二次溺入塘中，才算一命呜呼！第四天日寇全部撤离白果，当日下伪县自卫大队、区自卫队争拥着前来白术寨，要枪、要弹、要实物，并由罗启福、罗先义、罗学安、罗文海四个农民连日星夜将日兵尸体抬送到龟头河伪县政府，领取赏银80元。

杏 林 枝 叶

从《衡庐医话》中看胡 衡甫先生的文学修养

胡 金 勇

胡衡甫先生的代表作《衡庐医话》早已脍炙人口，全书形式为文言、白话融为一体，医文并茂，雅俗共赏。内容提纲挈领，汇通各家，取其精华。上至医论群典，旁及医林诸家，下逮俚医散记，涉及临床各科。每一段落，犹如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可见先生有较高学术造诣和文学修养。诚可与《冷庐医话》相媲美。故秦伯未有言：“我公学识渊博，极为钦佩！”余无言有“搜罗灵素长沙秘，写入青囊寿世篇”。及“婆心济世”，“一字一珠”等赞词。张梦依也曾提出整理意见。胡老堪称一代良师，近年新修市志，作为名老中医之一，写入史册。毋庸置疑，先生在麻城中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余虽未曾“立雪程门”，但幼时耳濡目染，影响所及，记忆犹新，成为我从医的动力。在肃然起敬之余，觉得很有必要写点体会。有鉴于此，兹撮其书中之文学性，约有下列数端。

一、重训诂，通经史

国学大师黄侃说训诂学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当代训诂学专家陆宗达指出，“‘小学’的应用性很强，不能用之于医药古籍，岂不是缩小了它的活动领域？”近贤任应秋教授认为必须有医古文基础，才能成为高明的中医医师。胡老幼习儒业，打下了坚实的古汉语基础。训诂学多尊崇章太炎、陆渊雷等名家、从医话中可看出他的文学修养、涉及训诂、音韵、修辞、经史、逻辑、诗词、书法、考据、校勘等方面的知识。

胡老认为学医必须重视文法，尤注重训诂之学。对教学、侧重于对古文的字、词、语法等加以解释和辨析。在古典医经中，通假字和古今字很多。若不能识破通假、古今而求其本字，则易望文生训，扞格难通。如《医话》中云：“《难经》‘手三阳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者，名厥头痛’。厥字为语助词，非谓厥阴头痛也。谓痛不一定在一经也。又真头痛，手足青至节，古人清青通用，谓手足清令至节，非谓手足变青也，所以业医者、须兼通训诂之学。”我的理解，“厥”字当“其”字讲，为语气副词，表示测度语气。在古文中，音同或音近的字往往互相假借，或者通用。以上胡老解释“清青通用”，为通假字，甚为准确。又，“五积之名”，见于《难经》，言五积之证甚详。而不言聚者，因聚无常处，无名状可定也。因积病为脏病难治，

聚为腑病治之较易。古人立言尚简，多有互文以见义者，非脱漏也。考《难经》第五十六难，论五脏积病，谓肝之积名曰肥气；心之积名曰伏梁；脾之积名曰痞气；肺之积名曰息贲；肾之积名曰贲豚，本难在前难辨别积病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五脏积病的名称，发生部位、形态、续发病证，以及病因病理等。胡老指出古人立言尚简，古文和医经中多见之，亦谓之“省文”，就是为了使句子简洁精炼，行文方便，而省略某些结构成分，虽曰省文，但其所省者，仍可依据上下文而求得。如《伤寒论》“举一反三”、“举宾略主”等省文法可以见矣。胡老谓“互文以见义者”。也就是互辞或互言，即在古文中，为了词藻华丽，语义含蓄，把本来可以用一句话表达的意思，分成两句话说，使上下文参互见义的一种修辞手法，此《内经》比比皆是也。又、《医话》中云：《一史记》谓扁鹊过邯郸为带下医，说者谓妇女病以月经为主要、带下乃指裙带以下之病，非仅指赤白带下也，是为专门研究妇科之蒿矢。又六朝人称“痢疾”为“滞下”，此又一义，盖滞字后人加水旁而成滞。又“痰饮”古作“淡饮”，见王羲之十七帖，所以读古典医经，“须兼通训诂之学。”扁鹊为上古名医，他随俗为变，精通内、儿、妇五官各科。带下医，即妇科医生之古称。此胡老解释，甚为恰当。唐、孙思邈《千金要方》称痢疾为之“滞下”宋元时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首先指出“痢疾”之名，谓“今之所谓痢疾者，即“古所谓滞下也。”可见胡老对古文颇为熟悉。

从上观之，胡老通晓训诂之学，谆谆告诫“医者须兼通训诂之学，”诚哉是言！可见训诂学至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古为今用，各个学科都存在着借鉴古代文化遗产问

题，文、史、法学等社会科学自不待言，就是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如中医更要研究训诂学，把古书的字、词、句、章，古人的思想搞清楚，得益可谓良多，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先生博览群书，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四史诸子是有涉猎的，故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医史也颇为熟悉，并有一定的版本、考据学知识。常与秦伯未先生涉及经史，诗词。初步统计，《医话》中引用各种历史人物有70多家，引用名著100余种。如《医话》中云：“《神农本草经》乃搜集汉代以前名医所用之药物，梁之陶宏景以为基础而编纂之。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遍，”乃属寓言之类，故后世以神农为药物之始祖，其说殊不足信。且其书中，某药久服，可以轻身延年，多杂道家方士之言。其时秦皇汉武，妄求仙药，以获长生不死，作者投其所好，故《神农本草经》，大半是汉人手笔，较为可信。《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一种本草专著，经现代有关专家考证，是经过战国秦汉时人增益而成，可能定稿于东汉时期，其托名“神农”所撰，则是因为古代早已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了药物的传说，并与《淮南子、修务训》所说时人著书立说“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的风气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神仙方术家们服食修养等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本经》，上、中品药物也收入了不少不能服用或不能多服的剧毒药物、如水银、雄黄等，并冠以“久服神仙不死”等说明，对后世烧炼、服石等泛滥成灾，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胡老联系历史，一针见血的指出：斯时帝王将相，为求长生不死，妄求仙药，作者投其所好，

史书中可见，为信而有征矣。

胡老生前所藏医书，均浓圈密点，对其讹误、漏脱、倒置、衍文等均有批注。对书中所涉及的经史均有眉批。又如《医话》中云：“《左传》载有春秋时，国人逐瘕狗，其重要性固不亚于逐疫……。”春秋时老百姓驱疯狗，即今日之狂犬病，由疯狗咬伤得之。又如在论消渴病时云：“肾消多由沉溺色欲而来，古人谓司马相如病渴，是惑于卓文君之故，可以知其故矣。”联系历史，说明司马相如患消渴病，病因为沉溺色欲，而病位在肾，即属下消。胡老既溯经史，又谙医理，可谓名医立论，自是不凡。

二，善修辞，常用典

修辞的表达问题，总是跟词汇、语法、文字问题纠葛在一起的，《医话》中修辞表达手法也是较好的，特别是比喻、设问、对偶、排比、用典、互文、顶真、辞气（文言虚词的运用）等手法，到处可见，尤以用典见长，使之把话说得准确、鲜明、生动。

例如用典：“……愤事则引古书以寒责，怨前人欺我，乃赵括之流耳，呜呼！读书未通，岂书之咎哉？”此段意思是，贻误了病情，事情败坏了，则仅据书上的理论来搪塞，埋怨前贤的理论欺骗人，此犹如赵括纸上谈兵，书未读通，不善于联系实际，怎么能怪书呢？胡老用此比喻，可谓一针见血。即今日之临床此类事不是绝无，思之赫然！又，“人不卒读《伤寒论》，而以家传秘本，自诩其长，率意处方，

或依方论证，是犹“闭门造车，求其出而合辙，难已！”此用“闭门造车”之典故，针对时弊，讽刺了庸医脱离实际，只凭主观办事。胡老治病强调理、法、方药，尤重视辨证论治，灵活变通，反对死搬硬套。

《医话》中辞气也贴切，文言虚词，如“之、乎、也、者、以、焉、哉”用得恰到好处，使之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医话虽为散文，但“韵律”亦强，如“……其实伤寒与热病之分，在寒重与热重之间耳，寒重热轻者，谓之伤寒，寒轻热重者（用了顶真句），皆可谓温病。……由此可知，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温病治疗，亦可通于伤寒，无余蕴矣。”散文而夹有整齐、押韵的句式，读起来，节奏感强，悦耳、朗朗上口。胡老的医话，颇有文味，令人百读不厌。难识胡老，识精学饱，大匠运斤，举重若轻。胡老善用文法，余心折之。

三， 遵辑逻， 会推理

胡老善于思维，有丰富的逻辑知识，善用归纳法，演绎法，使之医话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

如《医话》中云：“仲景之法，举脉可以知证，即药可以知病，知病可以处方。”此层层推理，说明仲景学说，法度森严，提示人应抓纲带目，以证类方，以方求证，以证选药，以药测证，注重理、法、方、药、脉、因症、治。

胡老用归纳推理法，如论文《祖国医学对急性黄疸型肝炎的辨证论治》中旁征博引历代文献对黄疸的论述，推理黄

疸肝炎不离乎“湿”、“血”、“肝”三者，引用《金医要略》所说的“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是不离乎湿的证明；其次“淤热以行”的淤字是热入血份的证明；《内经》的“目黄溺黄赤”，是病在肝的有力证据，巢源的“肋下满痛”，更明显的证明病在肝脏无疑，从而得出中西病名虽殊，而理论原无二致的结论。此从特殊到一般，即从特殊事物中推出一般原理的过程。

又如用演绎法：如《论柴胡之功用及市医畏用柴胡之错误》中，论述了历代先哲对“柴胡”的认识，此为第一个判断，由它提出一般规律，为大前提；又阐明了温病学家吴鞠通、叶天士对柴胡的不同认识，如“疟忌柴胡”之说，逐令市医以耳作目，畏之如虎，致当用不敢用，贻误病情。此为第二判断，为小前提；由它指出个别现象，胡老为柴胡呼冤，并以临床最有趣之验案以证之，并云三十年来未尝用柴胡而僨事者，从而得出柴胡不可畏的结论。此为第三个推出的结论。从上得知，由一般到特殊，就是根据一般的原则，推出特殊事物的结论。

“看似寻常最崎岖，成为容易实艰辛”，《衡庐医话》可谓胡老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结晶，书中还体现了胡老书法、诗词、音韵、校勘、考据、哲学等方面的知识，限于篇幅，不一列举。先生工吟咏，精书法，书法取径汉隶片纸只字，人争宝之。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麻视察，与胡老即席和诗，名噪一时。联想到先生藏书，并涉及古玩字画，金石印章，惜“十年浩劫”，毁于一旦，良可叹也！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感，……逻辑、

修辞之学使人善辨，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下工，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虽服膺胡老学说，醉心于《衡庐医话》十余年，而殊少心得，谨以几点体会敬献医林，恐贻笑大方，敬请长者，同道教正，最后以四字句（打油气味）作为本文的结尾，以为纪念，请与同道共勉之！

含今茹古，铸外融中，医文并茂，学者推宗。

岐轩不作，去实骛虚，银翘豆卷，名家自居。

秉钧大师，信道不渝，《衡庐医话》，阐发无余，

晚遇“动乱”，义愤捐躯，手泽犹存，展此遗书。

家父程鹏远先生的一生

程 敬 顺

【编者按】

70年前在白色恐怖的社会一位普通的医药工作者出于义愤，怀着济世救人的朴素感情，毅然地救出我地下工作者，並收葬被反动派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这件事虽因年代久了可能被人遗忘，但其正义之心却是永存的。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程鹏远先生。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平凡人，但平凡人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作出不平凡的益事善事却不在少数。我们就生活在平凡人之中，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就是这个道理。

在编者从事文史工作多年的实践中，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探寻信息，有时专程是为抢救某件将被烟没的资料，並常常被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情节所感动。特别是平凡人所作出的不平凡的益举善事，往往更能受别人的尊敬和怀念，有道是“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斯言是也。

有感于宋埠地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病友及其亲属们对程鹏远老医师的医德、医术的赞誉，尤其是当前强调各行各业的爱岗敬业精神和强化公仆意识，人们更是怀念这位老人，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麻城文史》写一写他。然而这位先生虽然毕生行医济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治病救人无数，

但其著述多被毁坏，编者苦思：奈何？！欣苦访得老人后裔，年已56岁的市教委干部程敬顺同志，程乐意撰文《家父程鹏远的一生》，助编者及怀念程老的人们了此心愿。该文文笔朴实，平凡中包涵着老人一生的敬业精神和济世医德。学史写史的目的是“以史鉴今”。现利于后，以期对我辈平凡之人有所启迪。

我的父亲是一位毕生从事医药工作济世救人的平凡的老人。他留给我们兄弟最宝贵的财富是：高尚的医德医风。平生最大的义举是：1922年，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胆识，毅然到旧政府的大牢里保释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冒着坐牢的危险收葬被反动派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家父的一生，是在平淡中度过与发展，在平凡中谋生与奉献。在晚辈的心目中，他老人家虽不是名人却胜似名人；求医者甚多，慕其名者更众；存留墨迹不多，但临床经验丰富。为永久怀念，为启迪后人，借《麻城文史》一角，传家父经历德行。

(一)

家父程本印，字庆华，号鹏远，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一年）9月5日生，于1978年4月25日（农历3月19日）病逝，享年84岁。原籍红安县永河镇付桥下榜湾。

来到人世，出身贫苦，家无立锥之地。童少时期，开始立志为人，随家搬迁数地。八岁开始识字，跟我祖父程立瀛（1865——1916年）苦读私塾八年。十六岁起从祖学医点痘，租种文鉴祖上和洪分祖上的稞田，历时九年。1919年，

我的祖母沈凤枝（1864——1919年）去逝，家父只得自立。自己行医并同亲兄本瑞字庆荣（1892——1982年）一起种人家的稞田两年。

1920年8月，年轻的家父（26岁）到宋埠镇下正街开小药店，招牌“益龄”，一直是自己行医卖中药，逢春点种牛痘。因资本小，经验少，加上别人排挤，生意险些倒闭，由于经常下乡出诊，才得全力挽回、在宋埠镇站住脚。1922年在“穷人帮穷人”的朴素思想感情驱使下，用城镇合作联保的手段，千方百计盖上“铺保”印章，到歧亭保释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彩富和宏安（公开身份是理发师）。拼着受“罚”，冒险收葬了被保安队杀害的红军战士牛伢和焱祥二人的尸体，解放后才得到人民政府发给的三十元照顾金。1938年日寇侵华，军用飞机轰炸宋埠，我家房屋、家俱、货物全毁，家父只得逃至砚池畈的大圣山脚下的大程家湾，仍行医卖药。1939年家产又被土匪抢窃一空。人生挫折并没有使他失志，他傲然屹立，慎寻生路。

1940年6月1日，四十六岁的家父，在我二伯的协助下，回到宋埠，在北门外从新当地基做房屋，行医卖药，重振家园。1945年日寇投降。1946年宋埠镇商会成立，我父被药业同人推举为其监委会的常务委员，1948年他自行告退，其后至汉口行医数月。

1949年8月11日宋埠镇获得解放，从此，家父未离开宋埠一步。业精中医彻夜不眠，救治民众彻底完全。1954年获中南大区卫生部颁发《中医师证书》。1956年元月5日筹建宋埠镇联合诊所，因是私方人员故委任为副所长。1958年合入宋埠卫生院（即现在的麻城市第二人民医院），任院务委

员。1960年被“湖北省中医学院”聘为中医函授辅导老师。1962年8月——1969年原诊所单独核算，出任所长。1969年4月——1972年3月被“下放”回家三年。1972年4月复职。1975年退休，但事业并未终止。

(二)

家父一生劳碌奔波，历尽苍桑；与人为善，老少不欺，奋斗不息，自立于世。年轻时多遭磨练，解放前受苦受难，解放后“天命”得志，晚年“宝刀不老”。

家父一生白手起家，凭脑凭手；白天劳力，夜晚劳心。从打饼做面，磨豆住店，勤耕苦读，医技深湛，到立足宋埠，医药济民，四传“益龄”齐颂鹏远。1920——1955年（26——61岁），三十五年间，家道逐兴。解放前，因怕后人再过苦日子，自身既做生意更需度日，家父创家立业。争得：街房一栋200平米，农舍上正下厅一栋300平米，老家明五暗六一栋百余平方米；流动资金年均2000元，药材折款近万元；田地两处共两、三石（注：一石约十二亩），山林面积数亩；金银手饰若干。历时久远，时过境迁，养人送礼，被搜遭抢，钱财散尽，房田毁完。所以，解放时，只有家人六口，街房一栋120平米，56年带着不足3000元的钱药加入联合诊所，以后，全靠党和政府、全凭月薪数十元养家过活。

家父一生慈爱后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我大哥敬恩，从小患癫痫病，直到二十岁去世，父亲为他求医觅

药，花费金钱无数。我和敬久弟幼时（我四岁多弟八个月）生母病逝，由我父亲叫屎把尿，他既工作又管家，既是父亲又当妈；上学后仍是父亲精心督教；我们大学毕业后都在外地工作，父亲还是操心并指教如何处世为人。我们的子女出世后，年迈的老父还帮着招扶烤尿布，并且终日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到我们的工作和家事顺心，老父才算彻底地放下心来。他老人家常有感融地对我说：“我一生是热汤沸水烫怕了的，你比我强多了。好！好！为愿！为愿！”

家父一生行医济世，解决百例疑难病症，被救之人不可胜数。家父自坐堂门诊行医卖药算起，从医五十七年（1920——1977年）。坚守本职，忠心耿耿，为保护人民健康而勤奋工作，他一生的宗旨是“一切为了病人”。特别是解放后，他带头贯彻执行“实行人道主义，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这一卫生战线的方针。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虽在“十年浩劫”中倍受打击，仍不忘其事业，为建设宋埠卫生院做出了贡献。

他忘我工作，处处为病人及其家属着想。下乡出诊，经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夏日门诊，坚守岗位，常常忙得汗流夹背，甚至打精赤膊给病人诊疗；下班回家，还要接待远地求医的病员，为他们安排吃住，家中既是病房，又象旅社，时常为病家代付药费；平时，街坊邻居随叫随到，主动关心帮助别人解决了很多应急问题；晚年，自身患肺心病和髌骨骨折等重病，不顾自己的病痛，躺在床上为人诊病，使病家感激不已。家父所作所为，迎得了家乡人民的敬重和爱戴，他病逝时，自觉参加追悼会的人站满了街道两旁，群众异口同声地称颂他老人家是位世间少有的德高望重

的名医，他离开人间近二十年的今天，人们仍很怀念他。

五十多年中，他热情待人，细心诊断，合理用药，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从未出过一起差错和事故，人民反映良好；他不论官民、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治病救人，因而朋多友广。因此，外省外地来求医者甚众，在新、红、麻一带颇负盛誉，尤其在宋埠地区有口皆碑，达到被人崇拜的地步。家父对中医妇科、儿科富有临床经验，尤以内科见长。留有医案数箱，因保管不善，更因被人搜抄毁坏，甚是可惜，也让老人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家父带学徒十余人，这些人已成中医界的骨干，多人成为中医师，还有的担任了院长、所长等职务。在被“湖北省中医学院”聘为函授辅导教师以后，他更是精心培养中医后代，抽空备课到深夜，按计划讲课有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抢时间把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来，对宋埠地区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1949年解放到1975年退休（55——81岁）的二十六年间，人民政府给予良机，家父如鱼得水，才华得以施展；党和人民给予殊荣和厚爱，家父老耄身健，历操中医职业。成效更为显著。历任所长、院务委员和院卫生协会副主席、麻城县“卫协”副主任委员。被选为县第二、三、五届中医代表和县第四、五届人大代表。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多次被评为医院、镇、县级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三）

家父业医一生，中医知识广博，临床经验丰富，其中医

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注重实践。家父常说：“中医浩海，重在实践，熟读王权和，更要临症多。”不主张读死书，注重把中医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

2、注重心理。家父治病，很注重当时环境和病人心态，严格遵循“内经”教导，尽量创造条件让病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故疗效显著，受人欢迎。

3、注重辨证。主张“有是病用是药”，遵古而不拘泥，仿新而不盲从，遣方慎重而有规矩，用药灵活而不孟浪，于后辈教诲很深。

4、注重“胃气”。家父在治病中极其重视“胃气”，他说，先天条件是固定的，重在后天的调理补充，尤其是在人有疾病的时候，更要注意调理胃气以增强祛邪能力。

※ ※ ※

家父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自强的一生！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财物，但是，他的“通情达理，深明大义，潇洒撇脱，心胸广阔；医高德厚，治病救人；和邻睦里，孝上慈下；……”，堪称后人的楷模！他的丰富经验和阅历是一部极为宝贵的为人处世的教科书！堂正为人，父之铭言；忠厚耿直，父之遗产；廉洁奉公，父之表现；为民献身，父之良愿！愿程门后辈发扬光大，做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金针所至 十可九痊

——记麻城著名针灸中医师王仲芳

王 曙 光

王仲芳（1890～1943）号宗烈，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城朱衣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幼上私塾、天资聪慧、喜书法、善篆刻。

1909年春，他就师于麻城著名中医唐弼臣，与胡衡甫、邹祥华等同窗，颇得唐真传，善中医内科、外科、儿科、妇科、推拿。从1914年起单独行医。

1935年已跻身于麻城八大名医之列的王仲芳，深为“汤药性缓”不能“抢救危疾”而苦恼。他经过多方奔走，毅然参加“东方针灸学社”学习针灸疗法。学社于同年（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给第2283号学员证书，准予学习。他收到证书和学习资料后，欢喜若狂，“拼命的吮取”，先后精读了《温灸学讲义》、《实用针灸学》《中国针灸治疗学》《温灸学讲义补编》《新著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人体写真十四经经穴图谱》《人体经穴图》、《铜人腧穴像》《运针不痛心法》等书和运针制灸方法。同时，还钻研了《解剖生理学》《诊察学大意》《病理学大意》以及孔穴学等，既丰富了原有的中医基础知识，又找到了“针灸治病，

效逾汤药”，“金针所至，十可九全”的“急救危症之良术”。他每天“寅时起床，端坐入定”按照《运针不痛心法》的规定“运气于指，心注于针”地练习指法，每晚，对照《人体经穴图》在自己身上或家人身上标点，或试针试灸，以求认准穴位，体验针感。他在应用针灸疗法的实践中，每有所得，及时批注，例如在《实用针灸学》“小儿”篇的眉批上写道：“急惊取穴少商、人中、大椎、昆仑、曲池、中腕六穴可好”；在“胀满水肿”篇的眉批上写道“面目四肢俱肿，腹胀脐突、先灸两天框穴后、一二日续灸水分、气海四穴，肿胀全消”；在“失血”篇的眉批上还写道：“鼻血灸委中穴奇效”。他对书本知识并不生搬硬套，《温灸学讲义》规定的温灸方法是“将其艾炷放置穴上以火燃之”并认为灸后“不溃脓则病不痊”，他不以为然，而从“灸之目的在使内部得温煦，神经缓和、血液畅行”出发，大胆进行改革，将中药生姜切成薄片置于针后穴上，艾炷在姜片上点燃，使药力透过姜片入穴。这样，既达到了温灸的目的，又使病人免受灸溃之苦。受术者交口称赞。

1940年夏，他逃避日本人回县城后，将朱衣巷又称猪屎巷改名为医师巷。在门前直书“针灸中医师王仲芳寓”九个大字，正式以针灸中医的身份济世，对门诊病人，他一律以礼相待，亲自安坐敬烟茶或由家人代敬。除急诊外，他都要等待病人“气顺则脉真”之时，再从容号脉。号脉之时，他目不旁视，神情专注，意念集中于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细心体验病人两手的“尺、关、寸”各部位的脉象，以求通过“切脉”来为“望、闻、问”综合判断提供准确的施治依据。并将自己的诊断和用针用药意见以及应注意事项等

详细耐心地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以取得他们的配合，直到病人全部理解，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后才“对症下药”。对急诊病人，他在综合诊断的基础上，先施以针灸，以减轻其痛苦，再处以汤药，以断其病根。不少被抬来的病人，自己临走时说：王先生看病，有打针吃药，病就诊好了一半，一打金针，病就全诊好了。对要求出诊的人，他不摆架子，不分昼夜、随叫随到。出诊时，肩背一个小布袋，手拿一把油纸雨伞，晚上提着一个纱灯笼，小布袋内装有一个圆形铜质小墨盒，一支锯掉半节笔杆的小楷毛笔，一叠针灸中医师王仲芳处方笺，一盒金针，一包艾炷，一块生姜，一卷用来点燃艾炷的“霉纸”。这个被称为“救命袋”的小布袋，挂在案头的左上角墙壁上，不出诊不用。并在挂袋处亲笔写颜体小草五言诗一首，诗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方艺术深”。这位不断告戒自己要将“曲径通幽”的“禅方艺术”象“初日照高林”那样，把温暖无保留地献给病人的著名针灸中医师，不幸于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病逝，时年五十三岁。

资料来源：私人藏书

鄂东史话

楚吴柏举之战

史智鹏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二虎相斗，终有一伤”。春秋时期，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几乎同时崛起，双方在相互扩张、发展过程中，相遇于鄂皖赣交界的吴头楚尾之地，因利益冲突，两国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与较量。

公元前515年，雄才大略的吴国阖闾继位后，招纳贤臣良将，著名军事家伍子胥、孙武等人皆被重用，他们帮助吴国训练军队，使吴军战斗力大增。与此同时，楚平王昏庸无道，楚国内文恬武嬉，军备不振，一幅江河日下的衰落境况。

公元前512年，阖闾、伍子胥、孙武等认为消灭楚国的时机成熟，率领精兵强将大规模出征伐楚。一路过关斩将，迅速打到小别山（今河南光山县南）与大别山（今英山县北）一带，深入楚境。楚国军队在统帅囊瓦的率领下仓促抵抗，囊瓦懦弱无能，竟准备临阵逃跑，经大夫史皇痛斥，方才硬着头皮，率领楚军主力十万布阵于柏举。同时，阖闾、

伍子胥、孙武等也率吴军主力约六万人，乘胜进至柏举，准备与楚军决战。

柏举战场在今麻城市九龙山（原名柏子山）与龟头山之间，龟头河畔，这里背倚险峰叠起的龟山，面对一望无涯的举东平原，是十分理想的战场。

楚军主力列阵柏举时，其大将遽射率领的援军也到达柏举，但他与囊瓦之间矛盾很深，竟不听统一指挥，擅自安营扎寨，使楚军兵力分散，互不协调，犯兵家大忌。11月19日，吴楚两军决战开始，吴军先锋将领夫概窥探出楚军内部不和的情况，当即向吴王建议“先伐之，其卒心奔，而后大师续之必克。”吴王不敢冒险，夫概回营后，对所属将士说：“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战）死，楚（郢）可入也”，便指挥五千先锋队，直捣囊瓦的楚军大营，楚军本来就军心涣散，遭此突然一击，阵脚大乱，阖闾、伍子胥、孙武等见楚军主力已乱，便趁势指挥吴军主力全力冲杀。柏举战场上天昏地暗，喊声震天，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最后，十万楚军溃败，主力尽被歼灭，囊瓦狼狈逃脱，史皇力战身亡。遽射见楚军主力已败，竟不许援军参战，而自行撤退。

柏举之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大战役。此役以后，楚军精锐尽丧，吴师入郢，旷日持久的吴楚争衡局面结束，吴国臻入强盛，楚国却失去了霸主地位，从此改变了春秋战国时的战略格局。

题龟峰山 在麻城县

(唐太宗)李世民

乾坤造化有神功。
马迹印开苍石上。
山高每有神仙过。
试剑石边风拂拂。
龙吟南岭崎山雨。
舍利塔中遗释子。
天开云现琉璃碧。
场畔芊芊罗汉草。
望龟亭内迎仙客。
万里黎民皆润泽。
游山宰相书名字。
任是丹青描不就。

胜地安然气象雄。
龟头横插白云中。
寺号能仁天子封。
虎跑泉内水溶溶。
虎啸东林什子风。
观音崖上礼慈容。
日落霞明玛瑙红。
岭头郁郁大夫松。
喷雪崖前活水通。
一堂贤圣总虚空。
采药仙人留迹踪。
恍疑身世九霄宫。

弘治黄州府志七艺文

(转载《全唐诗外编》)

跨 上 火 箭 篇

郭沫若

1958年9月

“政治挂帅党领导，
自力更生学苏联。
地大物博人口多，
超美超英有何难。
不见早稻三万六，
又传中稻四万三。
繁昌不愧叫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不闻钢铁千万二，
再过几年一万万？
牛郎织女无颜色，
盘古女娲骇破胆。”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几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留连？
到处都是新李杜，
到处都有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
莎士比亚几万干。”

张献忠在麻城东山再起

刘 宏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张献忠，在兵败将散的艰难情况下，意外地在湖北麻城得兵数万，使他东山再起，重展雄风。

崇祯十五年（1626）八月，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明朝将领左良玉大败于信阳，损兵数万，仅剩下几十名骑兵。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投奔闯王李自成。但终与之不合，不久，他又带领闯王给的五百骑兵，去扩展自己的势力。虽然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张献忠率起义军艰苦奋战，队伍有所壮大，但很多将领率兵又投奔了李自成。当起义军行进到湖北麻城时，兵不过七千，处境十分艰难。

麻城地处大别山区。明朝末年，这里还沿袭着残酷的奴隶制度。据徐鼐《小腆纪年》卷二记载：“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而麻城尤甲于全楚。梅刘田李诸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张里闾间。”广大奴隶在统治者的政治和军力控制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崇祯十六年（1627）四月，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逼近麻城的时候，城中大姓家奴汤志和思齐以民为蔽，听其统率同党，歃牲为盟，为“里仁会”。奴隶们的斗争矛头直指世

族、士绅。斩杀暴戾的奴隶主。汤志怒不可遏，竟一连杀了六十多人。一时城中大乱。汤志推举自己的好朋友周文江为首领。为了求得外援，一天夜里，汤志用绳子将周文江从城上吊下去，向张献忠报告说，汤志已在城中率奴造反，愿作起义军攻城的内应。张献忠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立即命令进兵城下。在汤志、思齐与周文江领导的“里仁会”的紧密配合下，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了麻城。起义军开仓赈民，惩办豪绅，古城内外一片欢腾，赢得解放的奴隶踊跃参加起义军，其人数达五万七千余人。于是，张献忠另外建立一军，定名为“新营”，改麻城为州，任命周文江知州事。

麻城奴隶大起义，给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兵员、物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声威大振。从这以后，张献忠率领起义军乘胜出击，席卷鄂、湘、川、赣，给明朝的腐朽统治以毁灭性打击，写下了历史的光辉一页。

注：本文历史事实均出自徐鼎的《小腆纪年》卷二、《明史卷三百九流贼》、《麻城县志》。

太平军鄂东活动考述

刘 球 记

摘 要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军先后克服600多座城市，足迹遍及18个省区。由于鄂东处于战略要地，无论是定都天京前夕，还是第一次、第二次西征途中，抑或是后期捻军时期，太平军多次出入于鄂东大地。在鄂东人民的支援下，赢得了老鼠峡下巢湖大捷、田家镇大捷、堵城大捷、小池口大捷、双城驿大捷、黄州大捷，用鲜血和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谱写了一曲反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悲壮之歌。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英雄们，“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先后克服600多个城市，足迹遍及18个省区，几乎席卷了全中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反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悲壮之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成为后来民主革命发展和胜利的奠基石。

广西永安突围是太平军由防御战变为运动战，由被动防守变为主动进击的转折点。太平军提出了挥师北上，争夺中原，或占据江南，建万年永固之基的战略意图。道州决策则

进一步确定“专意金陵（今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贼情汇纂》卷十一《老贼》）的战略进攻方针。回顾太平天国运动史，不难发现，它不失为太平天国军事活动总的战略思想。

鄂东，恰好为这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鄂东，向北入河南，可问鼎中原；南临大江，过天堑便是江南大地；东可顺江而下至南京；溯江而上西抵武汉三镇，直入四川，据为根本。三面依山，一面临水，陆则依山为固，水则择江面要害处（如田家镇等）而守之，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太平天国领导者很重视这块土地，在此设黄州郡，下辖黄冈、蕲水、罗田、蕲州、广济、黄梅、麻城七县（黄安为势力范围）。

自1853年1月初入鄂东至1867年3月溪潭坳大捷，太平军转战鄂东历时14年之久。无论是定都天京前夕，还是第一次、第二次西征途中，抑或是后期捻军时期，太平军的足迹遍及鄂东大地。鄂东人民素有反抗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传统，纷纷参加或支援太平军。

本文拟从四个阶段，对太平军在鄂东的革命运动作一番考述。

一、顺江东下取南京阶段

1852年6月太平军占领道州后，东王杨秀清针对一年来流动作战的经验教训和不少士兵思乡情形，决然提出：“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

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贼情汇纂》卷十一《老贼》）的战略进攻计划。杨秀清的主张得到天王洪秀全的支持，并付诸实施。1853年1月12日，循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武汉，下一个目标便是鄂东，给鄂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这次鄂东行中，太平军“专意金陵”准备充分，故其行动历时短而又十分顺利。

2月9日，50万太平军东下南京。翼王石达开统领先锋水陆师，撤出武昌城东下。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率领先锋陆师，分两岸夹江而行，天官正丞相秦日纲、指挥罗大纲、赖汉英、唐正才等率领先锋水师顺江而下。鄂东人民看到“天军知心是穷人，天军全为穷乡亲”，“闻风响应，未来则敛贤馈贼（太平军——笔者）”。（《湖北通志》卷71）

2月11日，太平军进驻黄州。13日，胡以晃督陆师攻占蕲水。15日夜，水军抵达广济县（今武穴市）及老鼠峡江面。这一带外江内湖，形势险要，有鄂东咽喉之称，是清军江防要镇。老鼠峡及下巢湖大捷，清军3000余驻兵，被太平军掩杀。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沉江而死。驻守龙坪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陆建瀛，听到恩长军覆没的消息后，见势难敌，连忙折回九江，仓惶逃回南京。九江清军2000多人亦逃之夭夭。17日，胡以晃等率先锋陆师占蕲州，20日自蕲州东进与水师会合。

太平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继续东下，连克黄梅、九江、池州、铜陵、芜湖，3月20日占领南京。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性的大进军。

二、第一次西征阶段

1853年3月，太平军奠都天京（今南京）后，为了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以夺取最后胜利，在派兵北伐的同时，即作出以争夺武汉为中心的西征决策。其目的是痹敌劳敌，分散清兵力“不得专攻金陵”，夺取长江流域各省，以保障首都的安全。西征第一攻取目标，就是安庆、南昌（包括江西北大门、沿江重镇九江）、武昌三大重要军事城市，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第二攻取目标，就是从湖北进入湖南，然后传檄而定两广，以至整个南中国。为的牵制北方清军大举南下，控制从镇江到江西、湖北、湖南的长江水面，且以为粮饷大供给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鄂东成为整个西征战场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基地。事实上，单凭双方投入的兵力、将帅、就足以说明鄂东鏖战程度之激烈，意义之重大。

1853年6月，春官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指挥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荣、殿右十二指挥白晖怀等率领1000余艘战船，溯江西上，在攻克安庆、九江之后，太平军迅速进入鄂东地域。10月1日，太平军占领武穴。湖广总督张亮基闻太平军入鄂，当即命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率领炮船队，奔赴田家镇布防。

田家镇位于长江北岸。南岸多山，数半壁山最大。半壁山孤峰昂举，悬崖如削，突兀江心，屹如关隘，与田家镇互为犄角。该处流急地险，是入汉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

劳光泰在田家镇使用载炮巨筏拦江布防，以阻止太平军水师西进；湖北按察史唐树义率领2000余兵勇，驻防蕪州。

黄州一带，准备从陆路阻击太平军。10月2日，太平西征军指挥石祥祜、韦俊率太平军抵达田家镇。见清军已拦江布防，便暂停前进。5日，石、韦分遣数百艘兵船，从南岸富池口渡江至兴国州。8日，占南岸半壁山。居高临下，控制了江面及北岸田家镇，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14日，清军将领江忠源率领楚勇及音德布的滇军来到田家镇。其实不过数百人而已。

15日，以曾天养为总指挥，太平军水陆大举进攻，大破田家镇清军江忠源及湖北江防军，击毙湖北粮道徐丰玉，汉黄道张汝霖等多人，唐树义、劳光泰侥幸逃生，江忠源逃奔广济县城。田家镇大捷，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石、韦率军长驱直入，乘胜进至蕲州、漕河。

17日，二克黄州，杀知府金云门。同日占武昌（含鄂州市鄂城区）。20日，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武昌指日可下。时扬州太平军事吃紧，韦俊奉命率军回援扬州。11月6日，石祥祜虑及兵力不足，退出汉口、汉阳，屯驻黄州。

11月1日，太平军在英山乐利（落令）河打败知县祝昌奎的团练，直趋太湖。

12月31日，太平军在瓦盖墙再次大败地方团练，击毙团练首领蒋樾，知县祝昌奎。清县吏何开贵留守县城。

1854年1月，曾天养、韦俊分别率军驰援湖北，在黄州与石祥祜部会合，共约四万人。当时，湖广总督吴文镕驻兵距黄州府城北25里的堵城。清军到处虏掠，民房尽毁。时天寒雨雪，民众怨恨，纷纷助太平军围攻。2月12日元宵节深夜，太平军在石祥祜、曾天养、黄再兴等指挥下，自黄州绕道至堵城清军大营后，纵火猛攻，附近乡民纷起夹击。堵城

大捷，清军死伤无数，烧毁11座军营，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副将德亮被击毙，吴文镛跳水自杀。当地民众纷纷参军。

16日，太平军乘胜西进，第三次攻克汉口、汉阳。2月下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向四川、湖南推进，连败清军。

1854年10月14日，清军向太平军疯狂反扑，太平军受挫，武昌失守。

10月23日，国宗石凤祥、地官副丞相黄再兴退守下游田家镇，招集散兵，准备再图进取。东王杨秀清得知武昌失守消息后，连颁两道诰谕，责令英王陈玉成会同前来支援的曾凤传驻守蕪州；燕王秦日纲率主力营造、涂镇兴解送木排水城一座，又令西征军指挥韦俊、石镇仑、韦以德等协助秦日纲镇守田家镇。湘军头子曾国藩则筹定三路下犯之策，以九江为第一目标。规取九江，必先取田家镇。曾国藩预测“计日内必须大战数次。”10月28日，清将杨载福、彭玉麟率水师（东路）起碇东下，停泊在蕪州上游蒜花濞、道士袱、沛源口一带。11月3日，南路湘军进犯大治、兴国、半壁山、富池口。同日，湘军头子曾国藩、李孟群起碇东下。11月7日，清北路军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从汉阳拔营东犯蕪州，清将桂明自杨店犯蕪州。9日，杨载福、彭玉麟率湘军水师猛扑对岸蕪州。太平军指挥、英王陈玉成派军抵御，太平军接战不利，退至骨牌矶（距田家镇15里处），先后损失百余号战船。

10日，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积极布置防御工事。建立大营二里长土城。在蕪州至田家镇40余里的沿岸增筑营垒，安设炮台；“在江面横铁索链六条，竹缆七条，其铁链节节用小船承之。杂以大林蘆三座，以铁钩钩于船簾之上……铁

链之西排列战船约三四十号，其东则泊普通船只约五千余号，长达十里。”秦日纲还派重兵驻守南岸半壁山。

11日，曾国藩、李孟群到达黄州。12日，魁玉出兵蕲水，在漕河驻扎。18日，道员罗泽南率一支南路湘军进犯半壁山，提督塔齐布率另一支拔营东犯富池口。

19日，双方水师大战蕲州江面。清湘军将领白人虎率船10余只下犯蕲州，太平军指挥陈玉成率军击退敌军，并乘胜追击，后遭湘军包抄，便弃船登陆。太平军上岸后，用招枪击毙白人虎。20日，罗泽南率兵2600人抵达离半壁山二三里处的马岭坳，与太平军血战三时之久。太平军先胜后败，损兵2000余人。同日，陈玉成夜袭湘军水师，仅烧船一只。23日，秦日纲调兵两万至半壁山，与罗泽南展开了殊死战。罗泽南见众寡悬殊，便令湘军坚持不发，待机突起攻击。太平军先胜后败，退回田家镇。四十七指挥黄凤歧、北殿承宣吉志无及将军陈文金、陆练福英勇战死。半壁山失守。当晚，韦俊、石镇仑、韦以德率援军到达田家镇。24日，太平军韦俊、石镇仑、韦以德等自天京来此，与秦日纲统军两路再次进攻半壁山。因首尾受敌，伤亡极重，石镇仑、韦以德战死，只得退回田家镇。

28日，湘军水师进扎蕲州之下，12月1日进驻见峰嘴（距田家镇9里处）。至此，南路湘军已占半壁山至富池口，中路湘军进至见峰嘴，北路湘军则扼守太平军北退之路。驻守田家镇至蕲州一带的太平军陷入三面包抄之中。

12月2日晨，四队湘军水师由南岸急桨而下。太平军“自牛肝肌炮台以下直至英王庙尽锐抗拒，千炮环轰，子弹如雨。”双方在田家镇战斗激烈。湘军水师哨官刘国斌、万

瑞书率第一队斫断横江铁链，太平军炮船开近救护，又遭湘军第二队牵制。时铁链已断，敌三板飞桨直驶武穴，复纵火而上，恰逢东南风大作。陆师头子塔齐布、罗泽南等复在南岸助攻，太平军难以东退。杨载福率军一路追烧至龙坪，太平军4500余艘船只被焚烧。同日，太平军指挥陈玉成、曾凤传率数千将士包抄栅栏山，大败杨名声、唐训方部湘军。

3日，秦日纲、韦俊见田家镇已不可守，遂自焚营垒，退至黄梅。田家镇虽然失守，但给湘军以极其沉重杀伤。湘军头目朱洪章哀叹不已：“曾军伤亡亦不少，水师尤多。国藩谓行军以来……丧师亦无如此之惨者，言毕放声大哭。”

（《从戎纪略》）。同日，陈玉成率3000余人从牛马坳搭浮桥击杨昌泗、魁玉，杨、魁被击毙于漕河。陈玉成连夺大胜，终因田家镇失守，于当夜三更弃城东退广济。此后，秦日纲等率军致力于九江防御。

12月10日，罗大纲率军进驻小池口，后改守梅家洲。

1855年2月2日，翼王石达开再次西征。罗大纲率军再战小池口，对湘军侧后造成威胁，曾国藩派副将周凤山进攻小池口，被太平军击溃。

2月11日深夜，罗大纲率兵1000余人西进至龙坪、武穴，林启荣派遣1000余人渡江至小池、孔垅。起义纷起配合，插入敌师营中发起突然袭击，焚毁清军战船100多艘。九江、小池口大捷。

太平军乘胜西进。16日，秦日纲自宿松、黄梅一带大举反攻，在广济双城驿大败湖广总督杨霨。17日，秦日纲、罗大纲在蕪州会师。21日，太平军四克黄州，击毙知府翁汝羸。

2月23日，太平军四克汉阳。4月3日，太平军三克武昌。

巡抚汤恩培战死。

1856年初，陈玉成率领太平军、河南捻军和皖北饥民，自安徽舒城、六安进攻黄梅、广济、罗田等地。7月25日，陈玉成成为上进武汉下解九江之围，在广济童司牌建造浮桥。浮桥东通太白湖，西连武穴，“营垒绵亘，望若长虹。”后遭都兴阿令孔广顺、李续宾、杨载福等联军夹击，损失惨重。9月，蕲州、英山两县农民再举义旗，曾两度占领英山县城。12月底，陈玉成率军退出蕲、广，清将杨载福由黄州进逼蕲州。1857年1月，太平军进行反攻，在漕河与清军激战，失利。5月，太平军由英山抵蕲州张家塆，歼灭清军400余人，接着太平军万余人由芭茅街进攻父子岭、青石岭清军，清军败退蕲州镇。

6月，湖北巡抚胡林翼调兴国、九江、黄州等地清军来蕲，由分路街、寒婆石、圆襟冲向北进犯。太平军退至望天畈、青石岭一带，并一度在青石岭重创清军，后因众寡悬殊而迅速撤退。

7月，太平军重夺青石岭，进占刘公河。8月，太平军击毙敌总兵王国才于黄梅。清军节节败退。3个月的时间，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数十次，打死打伤清军数千人。

9月28日，曾国藩到黄州会见胡林翼，共商进攻安徽事宜。10月22日，湘军水师到达巴河，登岸驻扎。11月17日，清将曾国藩领吉字营到达巴河，曾贞干领所募湘勇至黄州。

1858年1月8日，陈玉成所率太平军围困小池驿鲍超部清军，日夜环攻。后在唐训方、多隆多、蒋学凝等清湘军救助下，鲍超之围始解。陈玉成率军退走。4月，太平军占领麻城。

三、第二次西征阶段

1860年5月，太平天国趁二破江南大营之势，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今后进取之策。会上干王洪仁玕折合众人所议，提出“取百万买火轮20个，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南进江西，发后一支北进蕲黄，合取湖北”（《洪仁玕自述》

《太平天国资料》第2册第852页），占据长江两岸以巩固金陵的策略，并得到通过。尽管该策略有不现实的地方，但夹江西“合取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策略是相当高明的。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清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不堪，咸丰帝频频下诏。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奉诏率兵北上勤王，湖北境内一片空虚。太平军为粉碎清军的逼攻，解除九江之围，试图重新西征，进军湖北，占领武汉，迫使曾、胡处于北上不得、西援不成的境地。这一点，曾国藩、胡林翼不得不承认。遗憾的是，陈玉成、李秀成在西征过程中，互不合作，各自为是，导致“合取湖北”计划未能如愿。

9月30日，陈玉成集中数万太平军开始西征。在“重安庆而轻湖北”的思想指导下，太平军节节失利。在血的教训面前，陈玉成不得不考虑湖北问题。

1861年3月10日，在西征军指挥龚得树等的配合下，陈玉成继续西进。龚得树率军进攻浠水、罗田、英山，牵制清军。

14日，龚得树等行抵罗田松子关。在与清军成大吉部激战中，龚不幸中炮牺牲。陈玉成等击败余际昌所部清军，并

迅速退出东儿岭，挺进鄂东。一路上，太平军乔装清军，风驰雨骤，昼夜兼行。17日太平军过蕲水，18日进占黄州，可谓兵贵神速。

当时清军主力在桐城、太湖一带。黄州以上防备空虚，武昌城内忙乱不堪，以至远在太湖的胡林翼惊呼不已，急得咯血。

22日，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商业利益，英国参赞巴夏礼赴黄州会见陈玉成，以进兵“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为词，极力阻止陈上进武汉。此外，还提供假情报如“九江方面尚未所见忠王和其它诸进兵的消息”，陈玉成心动。

4月，陈玉成曾派兵数路攻占麻城、黄安、孝感、云梦、六安等地，构成对武汉的威胁，吸引清军主力西上，以解安庆之围。但由于曾国藩“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遑得失”，故上述行动意义不大。

4月下旬，因忠王李秀成南部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日益吃紧，陈玉成率主力回援安庆，遵王赖文光留守黄州。在安庆保卫战开始后，广济何致祥、蕲州孙兴荣等人领得李秀成颁发的文书和书信，“回籍招兵办粮，以为夹攻之计”（《胡文忠公遗集》卷42）。

6、7月间，官文调派成大吉等率领十八营清兵，渡江北上鄂东。

7月18日，清总兵李续焘等率军进扎回龙山，攻打戚家岭。赖文光见双方兵力悬殊，便固守黄州城，清军环攻不下。不料，驻守蕲州的太平军兵使刘维楨通敌叛变。刘假说增援，率军至三台河对岸，并伪造英王陈玉成文令投入城

中。太平军信以为真，遂突围入城，结果遭官文伏兵合击，伤亡惨重。余下太平军奔往三台河，却又遭刘维楨等的迎面阻击，“歼溺殆尽，水为不流”，

9月28日，清军进占黄州。

北伐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终于1855年5月全军覆没。西征军开始节节胜利，后由于分兵把守，兵力单薄，1854年5月1日湘潭战失利，继而武昌失陷。西征军同样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鄂东地区太平军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868年。

四、后期捻军阶段

1864年初，天京形势危急，辅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率西北太平军兼程回救，一路上会合了张宗禹、陈大喜等部捻军，声势浩大。由于不断遭到僧格林沁的重兵阻截，太平军被迫转战鄂皖间。天京陷落后，东捻军在“由鄂入川”过程中，遭清军淮军“围剿”，再度辗转鄂东。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镇压下，东捻军悲壮地失败了。

3月，张宗禹率军到达麻城，成军门、杨朝林率清军尾随而至，分途“进剿”。太平军驻扎在闵集、白果一带。

5月2日，陈得才、赖文光率太平军来黄冈境内，自道观河、马鞍山、淋山河、回龙山、孙家嘴纵横200里，营垒行馆，密如比栉。赖文光居黄州府。5月上旬，一部太平军行止黄安七里坪一带，驻扎月余。

6月，太平军由黄州、麻城、蕲水三路挺进罗田，旨在扫除罗田民团。太平军一举击败民团，击毙千总吴必昌。知

县王臣弼仓惶逃遁。

7月，太平军入英山，蒋学凝率八营清兵尾随而至，双方战事不断。不久，僧格林沁率大军南下，合围西北太平军。

8月，黄州、麻城两路太平军攻占藤家堡、松子关。9月，太平军突围北上，进入安徽。

11月5日，安徽霍山黑石渡之战中，西北太平军主力被僧格林沁部清军扑灭，仅赖文光一支队伍尚较完整。

12月，赖文光、王化邦、张宗禹所率三支队伍会合，“誓同生死，万死不辞”，流编为后期捻军。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支。赖文光、王化邦率领东捻军决定由鄂入川，即以大军挺进四川，留一部屯驻湖北作声援；另一部攻豫陕边界的紫荆关，会西捻军；后以四川为中心，以陕、鄂、滇、贵为外围，重建天国政权。

同月，赖文光等自河南进入麻城、黄安、黄陂、孝感、黄州，在黄州击毙清河北提督梁洪胜，震动武汉。李鸿章不得不调淮军堵截。清将官文奉令驻守武昌，兵部太侍郎彭玉麟等率水师守卫黄州、蕲州一带，企图将东捻军扼杀在湖北境内。

12月，东捻军再次攻克麻城。

1867年2月下旬，尹隆河失利后，东捻军冲出重围，北往河南。3月上旬，东捻军又入湖北，转战黄安、黄陂、麻城、蕲水、广济、黄梅、安徽宿松。因遭淮军阻击，退回鄂东。

22日，东捻军由蕲水兰溪、董家河一带沿浠水北上途中，清记名布政使彭毓橘率军从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这天，

恰逢大雾弥漫。彭毓橘见东捻军接战不久便后退，以为捻军战败，便督队追赶，突然间为东捻军马队包围，遭到猛烈进攻。彭毓橘陷入泥淖中，与提督罗朝云等将官时丧命，其军3000人被全歼。曾国藩的新湘军破产了。

4月，东捻军过黄州、黄陂、孝感、云梦、应城，至汉水东岸，因遭刘铭传所部清军追击，无法进入四川。下旬，东捻军复出鄂入豫，被迫放弃由鄂入川计划。

次年一月，东捻军被淮军剿杀，仅一二百人突围，赖文光被俘，10日就义于扬州城外老虎山。东捻军浴血奋战一年余，最后悲壮地失败了。

（转载《黄冈师专学报》）

资 料 考 辨

初 访 筷 子 巷

丁国安

（按：麻城人民的祖祖辈辈传流下来：我们的祖先是
从江西筷子巷迁移来的。所以我们走路时有时将两支手反握
在背后——这是当时我们的祖先是被强迫捆绑来的所留下来
的习惯动作。此话是耶非耶，迄无从考证。然而寻根问祖之
心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使然：本文作者就是怀着这种心
情，有了该次举动，写下了这篇短文。这类内容的文章是本
刊创办以来的首发，亦是编者迄今仅见，供有兴趣于此的人
士参考，企望收“抛砖引玉”之效。编者。）

麻邑人传：居民由江西筷子巷迁来。后又见志书（麻城
镇志·征求意见稿）载此事，就存造访一念。辛未（91年）
夏，出差江西南昌，业务之暇，闲翻地图，不见有筷子巷，
连“筷子乡”或“筷子港”等近似音可能讹传的地名也找不
到。偶尔与南昌友人谈及此事，友人大悦说：“市区有个筷
子巷！”我本困盹闷坐，一听就来了神，立即邀友人乘车往

视：巷道宽不盈丈，深不过千尺，门牌不足百家，瘦长直如筷子，北依孺子路，东接象山南路，西通石头街，座落于南昌市西湖区中心地段。因历代战火，古建筑荡然无存；连年改建，新楼房接踵林立。既无市井之繁华，也无幽巷之寂静，纯是庶民聚居，行人往还的过道而已。

友人世居南昌，传闻以前该巷多有庙祠府第，如数家珍却不见实物，亦不胜感慨。我附会其语，言必是当年的移民机构在此吧。即是存在又如何，世事沧桑，百家迁徙，市镇里万户流转交替与僻壤中一姓一族驻地繁衍不可同语。思麻邑建城东晋末，千余年时光，容下了多少过客，人流交会，种族亲同，社会发展之必然。只是偶然寻得彼巷，独留此芳名，竟让人发怀古之幽思！

1991.8.24记于南昌垵里

“麻乡约”的由来与兴衰

(四川)郑蕴侠、钟冲、蒋荣蓉

解放前，西南规模最大的民间运输行业是“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简称“麻乡约。”“麻乡约”的主要业务是客运、货运、送信三种。经营客运的招牌叫“麻乡约轿行”，经营货运的招牌叫“麻乡约货运行”，经营送信的招牌叫“麻乡约民信局”合称“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它大约创立于清代咸丰中叶（1855年左右），延续到一九四九年行务结束为止，约有一百年的历史，被老人们称为“管得宽，管得长”。所谓管得宽，指他无所不运，无所不揽；所谓管得长，指他远达京、津、沪、汉、滇缅、滇越，近至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壤都可运到。现将有关“麻乡约”的趣事及经营情况漫话如下。

一、传奇性的创业者

相传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湖北省麻城县有大批农民被迫迁至四川。由于远离故土，思乡心切，每年推选负重望的人回故乡探望，往返带送土特产和信件。担负这种重托的人必须办事公正，讲守信义，人们称之为“麻乡约”。麻，

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负调解责任的一种领导人员。

“麻乡约”本义如此，怎么又会跟信轿行挂上了钩呢？其中原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

“麻乡约”的创业者陈洪义，又名陈鸿仁，外号陈跑通，四川綦江县号坊乡陈家坝人。他十一二岁为人牧牛割草，穷得没裤子穿。十六七岁在煤窖捡炭花卖，二十岁左右先在綦江、重庆抬过街轿子，后在川黔道上当伕子，干活舍得卖力，常为伕头义务挑东西，得到伕头们的信任，当上了小伕头。他作小伕头时，常为同业人员排难解纷，疏财仗义，断事公道，受到人们爱戴。同业感其热心群众利益，公正无私，犹如昔时的“麻乡约”，加之他面部又长有麻子，就干脆以“麻乡约”呼之。陈洪义亦喜此名，也以“麻乡约”之名自称。

咸丰中叶，新升任云南矿务大臣的官僚唐鄂生由贵州赴昆明上任，路过綦江，雇上了陈洪义等为充伕役。由于陈是小伕头，被分拨抬唐老太太所乘的轿子。陈洪义见唐随从甚盛，排场甚大，知是高级官员，对老太太便加意殷勤侍候，不但随时招呼同伴放稳脚步注意老太太的舒适；轿子一落，还忙着买水果或端茶送水。唐老太太非常满意，吩咐唐鄂生到昆明后好好赏赐这个轿夫。行至贵州郎岱县，适逢唐的生日，唐为了纪念并自贺升官，大醉大饱之余，以少许酒肉赏赐脚夫。陈等猜拳欢饮，从日落闹到夜深。唐以酒肉不多，而陈等竟吃了许久，心中感到奇怪。亲至陈等饮酒处规看，则见杯盘狼藉，饮者多醉，而所剩的酒肉尚倍多于自己所赏赐者。唐惊问陈为何买这多酒肉，陈眼含珠泪，哽哽咽咽答道：“今日也是自己母难之期，想到孝道未尽，没有出息，

所以备不象样的祭品聊表对亡母的思念。祭罢以款待伙伴，让大家欢喜欢喜，更好服侍老太太和老爷。”唐听后心中至喜，认为陈孝顺忠厚，又与自己生期相同，真是升官途中逢“吉兆”。唐老太太听后，更对陈一个脚夫能不忘孝道倍加赞赏，嘱其子好好看顾提携。到昆明后，唐要陈在其手下做官协办矿务。陈大出意外，仓惶答道：“小人没有读过书，实在做不来官。”唐大笑，问：“你做不来官，打算做什么？我尽量帮助你。”陈答：“本人抬轿多时，只想开一个信轿行。”再问他用什么名作招牌，陈答：“人家叫我‘麻乡约’，我就想用‘麻乡约’作为招牌。”就这样，陈洪义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在昆明正式设立。唐鄂生除将自己衙门的公文函件交其递送外，并函川、滇、黔和有关衙署，给“麻乡约”以支持与保护。

二、在奋斗中发展

陈洪义为什么要开信轿行包揽送信和抬轿客运的业务呢？当时交通不发达，不但没有邮局和火车、汽车，连人力的黄包车也还没有。人们带信总是出高资托人私送，出门上路则只有骑马坐轿，陈洪义抬过街轿子、作小伕头的时候，就时常为商号捎带信件。他深知经营这种业务，除了能得到信资外，还可以取得不少的“赏银”作为外快。同时，官商上路多不愿雇马帮马匹，不愿受跋涉颠簸之苦；官道大路沿线城镇，虽设有不少轿行，但规模较小，并且不愿远行。当时上远道的官商，多自备轿子，轿行只消准备轿竿和脚伕。抬到目的地后，官商们多嫌轿旧了，要换新的，常常是半送

半卖，以极低廉的价格盘给轿行。陈洪义瞅准了这是一桩赚大钱的生意，因此，他就把这也包揽上了。

陈洪义的信轿行虽有唐鄂生的支持，招了伙头、伙子，在昆明挂出“麻乡约”的招牌，但是，到底是刚刚开业，信用未孚，生意并不兴旺。再加上重庆人陈松柏于道光三年（1823）创办的“松柏长民信局”，在云南、重庆乃至川陕交界的广元等地早就设立了分支机构，包揽了大批的轿运和信件投递业务，陈洪义要想为“麻乡约”打开局面，势必跟“松柏长”展开激烈的竞争。

陈洪义出自底层，抬惯了轿子滑竿，练就一双铁脚板和一副铁臂膀，吃得苦，耐得劳，不怕风吹日晒。现在虽然当了老板，但仍然是扎起衣服，挽起袖子，经常亲自抬轿送信。当时昆明的一位丁姓大员，欲觅一人从昆明送信物至成都。陈得悉后，央人介绍承担。为了取得丁的支持，陈亲自上丁府谒见，表示决定不负重托，由本人亲自将信送往成都。谒见后，陈立即收拾起程，稳妥而快速地将信物送到，并带回覆信呈丁。丁不胜欢喜，在官场中大为“麻乡约”吹嘘，替陈洪义做广告。

一八六〇年，“麻乡约信轿行”又在昆明挂出扩大业务承担货运的招牌，深遭当地马帮的忌恨，认为陈要夺他们的饭碗。招牌挂出不久，“麻乡约货运行”的营业处即被马帮和其它货运行派人捣毁。据说，陈洪义为了扎下根基，一次亲自参加为一位姓王的藩台挑运行李。那位王大人最爱书画，途中遇雨，缺乏雨具，陈脱下自己的衣服遮盖箱子，书画一点没有打湿。王深为赞赏，认为“麻乡约”负责认真，爱护客货。陈乘机向王游说，请求王的庇护。王欣然应允，

并叫陈将“麻乡约货运行”开在他衙门对面，高挂招旗，由他派兵保护。陈又多了一座靠山，提高了“麻乡约”的信誉，顺利地开展了业务。

陈洪义自幼在外奔波，老于江湖世故。他深知，光有官府的支持，不跟地头蛇拿好言语，业务仍难开展。伙头们每次领押客货上道，他总要谆谆叮咛，要伙头们“每到一地，先拜土地”，向当地的头面人物请安送礼。据说，他雇的师爷还替他专门立了一个大本，登载川、滇、黔官道附近各场镇的白道、黑道“十八路诸侯”，每当逢年过节和这些人家的红白喜事、生期忌日，他都派人备“菲仪”致意。因此，“麻乡约”又得到了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保护，只要亮出招子（旗号），一路清静，不但不遭匪抢，还能得到各地的协助护运。一次，“麻乡约”与“松柏长”同时经一条路线运货入川，“松柏长”的货全遭洗劫，“麻乡约”却丝毫无损。

为了打开局面，陈洪义还想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妙法。他很懂生意经，善于盘算，深知以薄利猎取多利之理。他的轿行对伙役的盘剥较其他轿行为低，轿伙无论出门多久，路程多远，都只给轿行缴纳底金纹银一两，其余哪怕四十、五十，全归轿夫所得。他的这一做法，买得了伙役和伙头的欢喜，纷纷抛弃别的同业奔赴他的麾下效劳。他还规定，伙头、伙役如有意外死伤，家庭困难，由轿行给以一定补助，照顾妻女，使他的手下人死心塌地为他办事。他的轿子也与其他轿行的轿子格外不同，保持清洁干净。轿内备有布条或鸡毛做成的掸子，随时清除灰尘；轿中用竹或藤做成软椅，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椅前置活动横板，使乘客俯

仰自如；轿子两侧的窗户还装上玻璃，内悬红色或绿色布帘；轿杆系挑选结实、轻韧并富有弹性的材料制成，轿伕抬起行走便利，乘客感觉平稳舒适。他还要求轿伕一路勤喊号子，勤给雇客报路。雇客们坐上“麻乡约”的轿子，既有轿伕殷勤伺候，端茶送水，代买东西，又可撩开窗帘俯仰山水，或者躺在轿内颤悠悠、软绵绵，领略轿伕们满含诗意的一问一答的号子，什么“大路一根线”，“跑得马，射得箭”；“天上一朵云”，“地下有个人”；“点子花”，“不踩它”；“右边有朵花”，“就是娃他妈”。行客们上道谁不求舒适安全？“麻乡约”在这一点上远胜它的同行，因此，不消几年，就蜚声四起，压倒“松柏长”并取而代之了。

在递送信件上，陈洪义也有一套。当时“松柏长”和“三厢子”等民信局，寄往各地信件的时间每月订为三次到六次，而“麻乡约”则订为九次。每遇商业旺盛季节，“麻乡约民信局”的营业时间延至半夜。他还在晚上待商号、票号、盐号结账后，派人登门收揽信件、汇款。寄件多的可以每季总付邮资，包干投递。对商号、票号、盐号职工所寄邮件、包裹，一律免费优待。紧急信件，他派人专递快传，比一般邮件可以提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到达。“麻乡约民信局”中最出色的是“火烧信”和“么帮信”。“火烧信”是烧去信封的一角，引起跑信伕头特别注意，火速快递。一次云南天顺祥寄“火烧信”到重庆，除付例资外，另外加付赏银纹银二两。据后来发现的“麻乡约”打的收条，赏银竟有多到百两的。“么帮信”是外用数层油纸密封，避免雨水浸湿，其上并缚一小木片，万一不慎落入水中，也不致沉没。由于

陈洪义采取这些措施，不久便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同行。同治五年（1866），陈洪义将“麻乡约”各总局移至重庆，在成都、嘉定、泸州、昆明、贵阳、广元、康定等处设立分行，大揽汇兑业务，并实行了责任赔偿制。“麻乡约民信局”的责任赔偿制规定：除人力不可挽回的火烧、水淹、伙头被杀等外，一律实行赔偿。盗匪抢劫，赔偿一半；其它损失，全部赔偿。光绪初年，陈洪义承运了一笔由四川兑往云南的协饷，行至老鸦滩，渡河遇风，船破，饷银落入水中，虽经打捞，仍损失一部分。事后，陈承担了全部赔偿。“麻乡约”逗硬赔钱，名声迅速传遍了川、滇、黔数省，找上门来请其运货、汇兑者数字大增，“麻乡约”各处分支机构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光绪末，清政府在四川设立邮政局，曾抄录了“麻乡约民信局”的分局地址和路线，作为开辟邮路、设立分支机构的依据。“麻乡约”的许多有经验的信伙，也被清政府招为邮政局的“邮差”。他们头上仍然包着“麻乡约”的青丝帕，身穿清政府发的绿色背心，背心上的黄圈里套着黄色的“邮差”二字，下著绿布裤，青裹腿，出现在官道旁的山村水驿之间（当时偏僻及交通不便处是不送的），这就是中国邮递员的原始形象了。

为了经营好“麻乡约信轿行”，陈洪义还创造了一整套严格的工作制度。“麻乡约货运局”规定：所运货物按物品不同结构包装，不使过大过小，以便保管运行；用作包装的封皮，除油纸、草纸、篾席、麻袋外，视气候与物品质量，或上下加用斗笠，以防水湿，或外加白布，保持物品的平匀光泽；对于易碎物品，加垫糠屑、稻草；无论大小物件，必紧扎牢捆，加盖骑缝，以免散失脱落；特殊货件，加盖脚印

或插上记号，途中加意爱护保管。一次，“麻算约”所承运的纸，行至松坎，涉水时因挑夫跌倒，一挑沉没水中，捞起打开查看，内部丝毫未湿。一九三〇年左右，重庆运输行店争运书籍纸张至成都，“麻乡约”曾与某同业比赛，各将已包好的货物由对方任抽一件，到重庆白象街下边的江沿上，同时抛入长江，待漂流数里后捞起开包查看，“麻乡约”包装的书籍毫无水迹。此事，一直在民间运输行业中传为美谈。

由于陈洪义的奋斗，“麻村约”信誉卓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京、津、沪、广、滇、越道上客货运输和信汇业务，几乎由他囊括包揽。民国二十年（1931），各地大多设了邮局，“麻乡约”也早已不办信汇，但仍有不少商号、票号甘愿拿出高价硬要“麻乡约”为其投寄信汇。“麻乡约”却之不恭，只好收将下来，转手代投入邮局，再向雇主言明。

古人说：“民无信不立。”不但治国必须示民以信，干任何事业也离不开“信”字。“麻乡约”根据陈洪义所立规矩，讲究信用，是它能够蓬勃发展、压倒同行的根本原因。

三、有魄力的守业者——麻老太婆

陈洪义大约死于光绪末年，企业为其继室麻老太婆（李姓，或称四老太婆）所主持。“麻乡约”之所以能够继续兴旺，全仗这位具有魄力的老太婆善于守成。

据说，陈洪义临死时，一再叮嘱其妻恪遵他为“麻乡约”所订各项制度办事，特别强调不能失信。麻老太婆始终

本亡夫的遗训办事。为了笼络手下人员，她进一步施展了小恩小惠手段。平时发给伙子一些药品、简单的劳保工具（垫肩、扁担、抬绳等）和少许现金；购买土地，作为伙、伙子死后的葬地。一九二九年，两个伙头运货至桐梓被土匪杀死，她除了给以抚恤，事后还抚养两姓家属长达十年。一九二八年，由重庆运杂货到贵阳，在桐梓炒米铺丢失两担；一九二九年，在重庆承运二十支船的钢制品沿长江上行，因牵绳断，船倒转栽沉，麻老太婆均一口应承了赔偿，前者赔银元四百余元，后者赔银元六千余元，还花了二千多银元的打捞费。

一九〇八年冬，长江枯水季节，“麻乡约”的一支运货船沿长江上驶，行至青滩附近，与下驶的英国兵舰“柯克号”相遇，兵舰横冲直撞，将木船浪沉。常期守候在滩上的红船，全部出江打捞，由于包装严实牢靠（木箱内货物用黄蜡纸封了三层，木箱缝口处用牛血调石灰涂刷，外又糊有涂有柿油的牛皮纸），捞起的三分之二货物完好无损。其余三分之一的损失，麻老太婆一面具文禀报重庆知府照会英国领事，一面立即赔偿结账，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赞扬。英商在重庆开办的“天一保险公司”，见“麻乡约”如此大的胃口，十分眼红，派买办傅骥伯引诱“麻乡约”向“天一公司”投保，声称只要愿意合作，这次损失由“天一”负担。麻老太婆一口拒绝说：“我‘麻乡约’经营多年，吞得下去，吐得出来，作生意难免有吃有赔，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依靠洋人，洋人休想占我家的便宜！”麻老太婆既维护了企业的独立，也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一九一六年，讨袁战争在云南兴起，蔡锷率滇、黔军转

战入川，阵亡了许多将佐兵士。滇黔军首领提出，请“麻乡约”代运阵亡者的灵柩返里。麻老太婆一口承揽，不但代运，还替阵亡者请僧道诵经念佛，伴送游街，取得了护国军将领的好感，既使“麻乡约”获取了厚利，又得到了反袁有功的赞誉。

一九三七年，四川省政府公路局委托“麻乡约”从重庆以木船代运轮渡汽划至广元、石桥等地验收。轮渡划子大而重，人力不能抬上木船。试用起重机，亦因起重能量小，吊不起来。求计于某工程师，也想不出办法。麻老太婆召集手下管事、伙头反复计议，终于想出了妙法，他们先将受载木船凿一小孔，使其盛水下沉，同时于其两侧各置一船，系以牵缆，不让沉落到底，然后将轮渡划子推到受载船上去，再将所凿水孔填塞，拉起牵绳，舀干积水，使木船浮起行进。

创业者披荆斩棘奠定根基，还得守成者善于经营不堕其业。麻老太婆可谓善于守成的了。

四、“麻乡约”见闻实录

本文作者之一的郑蕴侠，生于重庆，少年时在成都就学，既曾入“麻乡约信轿总行”参观过，且曾随“麻乡约”客货运输队多次上路，许多见闻至今记忆犹新。

清末民初，“麻乡约总行”设在重庆西二街口子上，外面高悬招旗，三开间的大门面，两边各为黑漆红面柜台。左边是账房和客运接洽处，右边是货运接洽处，中间是客堂。隔扇后面是饭厅，厅后是大天井，天井内开两口水井，还摆列许多花台鱼缸。天井地面铺着水磨青砖嵌的各种图案，十

分雅致美观。两边是两排整齐的各长十间的库房。上厅是执事人住房，后进小院是伙头和学徒水杂住房。最后一排是厨房、厢所和两个大太平水池，库房外面一排木架，插了三十九杆大小秤，其中最大的秤能称两千斤。二十个库房各有正、副司库一人，帮办二人，打包匠十人。各种货物按库归宗。规模真是不小。在对待货物的安全保管方面，当时虽无救火车、灭火机等，但置有广东造的铜质水枪三十支，还有钩、叉、锤、锯、长梯子等简单消防工具。库内人员也进行简单的防火训练，并有几名更夫专司夜间巡逻。总行内还特聘有内、外科医生和兽医，为人畜治伤治病。当时四川名拳师余发斋、余鼎山父子，就先后充任过总行的骨科医生。余氏父子二人当时名扬武林，曾在重庆珊瑚坝和成都青羊宫摆过擂台，夺得金章和宝星。

“麻乡约”运送客货。每次上路驮马上百，轿子和乘马也至少五、六十，是个浩浩荡荡的运输队。人货众多，但组织严密，每二十匹马有一个马哥头，专司负责指挥小股。整个帮有总、副伙头各一人，负责总的指挥，行止由其决定。每二十匹马中有带头的头马，头马头戴红缨，鞍上插一面三角白牙边红旗，上绣“麻乡约”三个黑字，下面按天地玄黄另有字号。头马比其他马吃得好，驮得轻，行群马前。头马停群马止，不敢稍有超越，如超越岔道，就要遭头马咬踢。一路上哪站休息，哪站上料，头马都自动停止。“麻乡约”对手下人员训练有素，推而广之，连马也训练得使用自如了！

行进中马帮在前，乘马客轿居中，各种挑子走在最后。总头做开路先锋，副头作殿后司令。每到场镇或码头，总头

就按江湖礼节递交“麻乡约”的大红片子，亲自上当地头面人物处“拜龙门”。如果半途遇上拖棚子下龙背（下山抢劫）的黑道人物的总头就打隐语，拿上复，奉送烟钱酒钱，以求彼此不伤和气，留下回见面交情。由于“麻乡约”每逢年节或红白喜事对各码头礼节周到，路过时也执礼甚恭，因而马帮不论住宿何处，到了晚间起更时分，当地各公口的执事和大小老么，都要打上滚子灯笼对总头进行“回拜”。回拜时总头高唱回敬：“行客拜坐客，江湖好礼节。我兄弟不周不到，有失规矩，走了水，漏了糖，还望各台拜兄亮个膀子，一丈二的八尺——两丈（仰仗），给兄弟打个好字旗！”拜见已毕，地头蛇们便敬邀正、副总头赏光早已备好的酒宴。

“麻乡约”的那些总头、副头、伙头、马哥头们的打扮，颇似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人物。他们著一色青布小袖紧身，下穿兜裆叉裤，打蓝白相间的绑腿，头缠青丝帕号头，脚蹬多耳麻鞋，鞋尖上一朵大红绒花，背插单刀或背背鞭剑，左右两腿各插一柄匕首。夏天时，他们不包号头，带顶草帽，上系红色丝带，颌下打一个大蝴蝶结。冬天披一件黑色的一口钟（大氅），看起来相当威武。他们都会拳脚，精通暗器，并常说：“没有几刷子，休想闯江湖，休想在血里抓饭、刀上拿钱！”颇似北五省的镖局，总头是大镖师，副头是二镖师，其余为伙计。

他们颇迷信。临行前，正副总头总要到寺庙菩萨前上香磕头，恭敬默祷。由总头亲自裁牲杀鸡，将鸡血洒上纸钱在神前焚化。当晚投宿时，鸡肉由伙头以上共享，而鸡头则归总头，以取吉利。由于迷信浓厚，忌讳亦多，犯了讳的必须

打酒割肉请众伙以示“受罚”。跟他们同行，如果不懂江湖隐语，只有当哑巴不开腔。如“碗”与“款起”的“款”借音，不能说“碗”而必称“莲花”；喝茶的“茶”与“杀”借音，不许说喝茶要说“茗黄汤子”；吃饭要说“造粉子”；喝酒要叫“茗纠头子”；纸捻要说“喜条子”；猪肉要叫“江片子”；脸叫“莲花”，长得漂亮称“莲花白春”，脸色红润称“莲花白烘笼子”等。如行水路，上船后东西和人均不能随便移动，更不能说“沉”字，姓陈的均呼“老烟”。开船前总头亦宰牲祭江，鸡血滴上船头，才鸣锣开船，如遇险滩旋浪，桡工头目带头喊完号子，余人合哼“哎哟”。

郑蕴侠曾乘“麻乡约”船隻从乐山到宜宾，经过叉鱼石，当地有五里路长的软皮浪，水势凶险。他在日记中记道：“过完五里长浪，惊魂未定，又进入更险之道士观。观雄踞北岸石岩，岩下接河处有巨大溶洞，径约十丈。江水澎湃，激浪汹涌其中，震响如雷，如千军万马厮杀。本船过时，使人魄散魂飞，如陷绝境。船中桡工齐呼‘抵起，抵起’，船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向溶洞飞驰而进。溶洞张开血盆，似欲将木船吞噬。舵长临危不惊，一舵向右撇去，已入血盆的木船，飞速顺水经转向江中。久悬之心，方始定矣！”由此，可见“麻乡约”所雇用舵长、船工熟悉水性、地势，并具有较高的操作技巧和协作精神。在由重庆至宜昌的长江航线上，“麻乡约”也长年雇有深稔水性的驾长导航。

郑蕴侠所见“麻乡约”的一些实情，今天看来有些未免荒唐可笑，但却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社会风貌和当时交通运输业的落后情况。

五、“麻乡约”的衰亡

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旧的落后事物，总要被新的先进事物所替代。“麻乡约”虽然历史悠久，又有一套独特的管理经营办法，但它到底是依靠反动官府和地方恶势力而起家的封建把头式的企业，它不可能实施改革采用先进技术，以适应社会不断进步的需要。肉肩膀不如蒸汽机，肉脚板跑不赢胶皮骨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各地相继兴修公路，长江航道上有了较先进的民生公司等航运企业，政府办的邮局遍及各县，“麻乡约”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它的许多有经验舵工驾长，转入民生公司，成了轮船上的骨干技术力量。它的信汇业务，亦因公办的邮政局兴起，只好宣告结业。客运业务也逐渐停止，只依靠少量货运，以支撑残余局面。

“麻乡约”不能顺应客观形势，已经岌岌其危，加之以内部腐烂，内外夹攻，其溃必速。一九三八年麻老太去世，其子孙无所忌憚地争相偷盗家财和活动资金，据说五十两一锭的纹银二百多锭，计一万余两，被浪荡子弟一夜盗尽。其后，各房又互争家产，大动干戈，官司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管理企业的人又不善经营，或狂嫖滥赌，或大抽鸦片，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将“麻乡约”的招牌顶与别人。接管“麻乡约”的旧军人左君实，又不务正业，大搞走私，偷运鸦片，几次被国民党政府查获，大肆勒索敲诈。不久，被迫停业，宣告“麻乡约”结束。

（丁国安提供）

争鸣园地

道士塔

余秋雨

【编者按】

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曾有轰动世界的三大发现：甲骨文、流沙坠简和敦煌文书。其中的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道士却是麻城人。历史上对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后的一些举动褒贬不一。王道士功耶过耶？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然而，今人对历史人事或事件的评说，不应脱离那个时期的历史环境，评说者尽可见仁见智。本刊第四辑发表了江益林同志撰写的《敦煌文书与王道士》。现转载余秋雨教授的《道士塔》以飨读者。

编者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塌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

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箴！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

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钦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

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喏，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份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

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

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

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

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文艺天地

花挑简介

黄家寿

花挑自古流行于麻城县北山福田河、双庙关、两路口一带，它是湖北省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

据双庙关民间艺人刘世斌、王正元口述，花挑历史悠久，传说自唐代兴建双庙观庙宇以后，每年正月十五和五月十八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庙会。当时参加庙会的人甚多，非常热闹，有的求神拜佛，有的做小生意，有的则表演各种民间艺术，双庙观的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在赶庙会时便创造了花挑歌舞。开始只是挑着采茶籽用的竹篮，插上各种野花边走边唱，唱的内容都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后来随着年复一年的赶会，花挑经过不断的整理，逐步形成表达劳动人民的一种完整的表演艺术。

花挑的表演形式：原来是由旦、丑、女丑三人集体表

演。旦挑着一担花挑在中间、丑和女丑于两旁，同时随着打击乐表演舞蹈，边舞边变换位置，直到三人排列成三角形时，乐停起唱，边唱边舞。其舞蹈动作分三个方面，一是基本步伐，旦走跼步，丑走交错步，女丑走秧歌步。二是根据演唱内容灵活表演动作。三是运用导具的特征进行艺术表演。

花挑的服装导具：旦身穿花衣和绿裤，腰系红飘带，肩挑一担美丽的花挑；丑身穿花衣褂和大脚裤，手拿一付竹板；女丑身穿大连襟衣服，耳坠红萝卜，手捏破葡萄扇。

花挑的艺术特点：

1、形式灵活，导具简便而美观。

花挑表演人数不多，不论是稻场、山坡、街头、巷尾、广场、舞台都能表演。表演时，由一个姑娘挑着花挑，迈着轻快的步伐，使扁担闪闪送送，花儿随风摇动，好似仙女步花丛，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2、内容健康，富有故事性。

演唱的内容主要是以反映农村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主的爱情故事，启发人们向封建包办婚姻作斗争。

3、句式别拘一格

花挑唱词，每句七字，每段五句，但在演唱时，由于曲词情绪的发展，第一句反复一遍，其中。加上一问一答两句，共为八句，艺人称之为“抢八句”。

4、曲风激情婉转，欢快动听。

全曲分为八个乐句，两个乐段，风格统一，具有浓厚的大别山民间风味。

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

引下，麻城花挑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一九五五年麻城举行了全县民间艺术会演，福田河区文艺代表团首次来县表演了花挑，深受群众欢迎和赞扬。继而县文化馆对花挑进行了整理，改掉了不健康的词句，改变了丑角的人物形象，美化了导具，即将男丑女丑改成男女青年，将破蒲扇改成绸扇并增加方巾，既保持了原花挑的基本形式和风格，又体现了时代精神和人物风貌。一九五七年花挑光荣地出席了湖北省和中央民间艺术会演，荣获优秀歌舞奖。现在，逢年过节，麻城人民表演花挑已成了传统习惯。

总之，麻城花挑这朵经过历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园丁用智慧和心血培育和灌溉而盛开的艺术之花，在社会主义的明媚春光里永不凋谢。

（麻城市文化馆）

大别山区一奇葩

——麻城东路花鼓戏

宁永新

巍巍大别山，雄踞鄂东，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这里物产丰富，人才毕出。历史上不但孕育出了“黄麻起义”的英雄儿女，还培植出了“东路花鼓戏”这朵艺术奇葩，使其成为祖国文艺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玫瑰。

东路花鼓戏早期名曰“迓戏”，俗称“哦呵腔”，后称“东腔”也称“东路子花鼓戏”（今湖北楚戏为“西路子花鼓戏”），1956年定名为“东路子花鼓戏”，1974年更名为“东路花鼓戏”。

东路花鼓戏在历史上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据有关资料记载，剧种形成于嘉庆末年，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该剧种其所以能长盛不衰，流传甚广，主要是她源于民间，为群众喜闻乐见，且雅俗共赏。早在道光二年（1822年），迓戏的传唱已极为普遍，史料描述曰：“迓戏演于昼，观之易迷，听之易晓，价廉费省、使于集事，故一村乍

停，一村复起，男女辐辏，乐此不疲……。”从麻城、红安、罗田、蕲春、鄂城等县县志记载及艺人分布情况来看，东路花鼓戏曾是流行于鄂、豫、皖三省十余县的一个较有影响的地方戏曲剧种。

东路花鼓戏起源于鄂东，形成于鄂东的麻城、罗田、红安、浠水、黄冈一带，位于大别山南麓。这里山峦叠障，河川壮丽、东北与河南、安徽交界，西南与湖北的孝感、咸宁地区接壤，三省毗邻，大道互通，是山区人民经营土产山货的重要集散地带。这里盛产谷粮棉花，土产山货品种繁多，至九十年代，分别有“板栗之乡”、“花生之乡”、“茶叶之乡”之称，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感情丰富多彩，气质刚柔相济，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就在这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环境中劳动、生活，奋斗不息，由于人们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的古典生活方式，从而萌发消除疲劳、愉悦身心，表达情感的心态要求，于是在采茶伐木、翻地锄禾、劳余夜息之际，便见景编词，即兴演唱，自娱自乐，如《唱个山歌我回去》（麻城民歌）就这样唱道：“太阳落土日落西，唱过山歌我回去，清凉水里洗个手，不知明天在那里。”又如《叫我唱歌就唱歌》（红安民歌）唱道：“叫我唱歌就唱歌，不奈仁兄意思何，粉壁墙上写大字，黑的少来白的多，唱的不好莫笑我。”这些民歌大都是一唱一和，其曲调高亢委婉，唱词通俗易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苏东坡的《笔记志林》就把当时鄂东民歌传唱的情况作了余下记述：“吾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居讴歌，其词故不可解，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婉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可见远在宋代鄂

东的民歌就非常丰富，是农人自娱自乐唯一的最普遍的形式。以后又出现了除民歌以外的多种民间表演艺术，如渔鼓、采莲船、推王灯、采高跷、皮影戏、被褶戏（布袋木偶）等，上述民间表演艺术，大都由一人领唱，众人帮和，锣鼓伴奏，于是就编织故事，唱起小调，演唱于村头巷尾，每逢喜庆佳节，迎神赛会，上述活动便成为民众不可缺少的自娱自乐活动。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左右，上述民间表演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是搭起草台，购置水粉，借用乡间新妇衣物，粉饰不同人物角色，进行演唱，这就逐渐哺育出了一个能够演唱故事情节的地方剧种——东路花鼓戏。

东路花鼓戏以其唱腔高亢委婉、表演形象逼真、伴奏别具一格，构成她独有的艺术特色。

东路花鼓戏的唱腔分为正腔、小调和其他腔三类。正腔有〔东腔〕、〔对腔〕、〔二行〕、〔火攻〕、〔叹腔〕、〔四平〕、〔二高腔〕等，属板式变化体音乐。小调有〔麻城调〕、〔扫台调〕、〔闹五更〕等数十余支，属单曲联缀体音乐。其他腔有〔腊花腔〕、〔净行调〕、〔七字腔〕等。〔东腔〕是东路花鼓戏的当家腔，男女分腔，源于鄂东民歌中的“嘏腔”和“薅草歌”。〔东腔〕高亢委婉，音域宽、起伏大，演唱时有特定的锣鼓伴奏（称“十三锣”）和程式严格的人声帮腔，其语音韵味具有鄂东“哦呵”的典型特色，所以群众又称东路花鼓戏为“哦呵腔”。

东路花鼓的行当早期只有小生、小旦、小丑，俗称“三小”；其上演剧目多以反映民间生活小景或爱情纠葛的小戏为主。后来，又出现了生角、正旦、净角等行当，上演剧目也随之扩大。

东路花鼓的伴奏建国前只有武场（打乐），而无文场（管弦乐），其伴奏锣鼓别有一番韵味，听起来使人感觉音乐明快流畅，情感贴切动人。

三四十年代，随着东路花鼓班社日益增多，演出市场不断扩大，群众的热爱日益加深，不仅推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一批著名民间艺人，如戴桂亭（绰号戴矮子，红安县人），邹鑫、刘玉清（麻城县人）、潘凤仙（罗田县人）、蔡喜儿（黄冈县人）等，他们在群众中有较深的影响，深受群众爱戴，因而在群众中流传有“吃鸡要吃鸡膀子，看戏要看戴矮子”，“管他割谷不割谷，要看邹鑫哭”，看了蔡喜儿，回家摸不着椅儿”之说。

建国初的1950年9月，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麻城县成立了旧剧改革组，由18名老艺人为基本队伍，继而成立了东路花鼓戏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使东路花鼓这株历经风雨的小花进入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在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同时在省地文艺专家，如魏开泰、沈建军、欧阳谦叔和方光诚等音乐工作者的指导下，给东路花鼓全面配乐伴奏，使东路花鼓更加完美。在创作上先后创作了《神兵天降》、《田秀秀》等大型现代题材剧目20余部，移植演出《江姐》、《山乡风云》等大型现代和历史题材剧目百余部，同时锻炼和培养了宋元珍、陶德凯、宋涛、张汉青、曾美玲等一批艺术新秀。1974年该团以整齐的阵容，较好的艺术将移植的东路花鼓戏《杜鹃山》在湖北电视台通过电视转播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演出，得到肯定。移植的传统剧目——《御河桥》被拍成电视剧在省台多次播放，深受群众欢迎。

随着京九铁路的修建及全线贯通，历史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伟大的祖国百业兴旺，一片繁荣，而东路花鼓戏这支由大别山人亲手培育的鲜花将会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编 读 往 来

【编者按】

文史资料工作是1959年周恩来总理倡导开展的。是各级政协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征集出版的原则是坚持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是与中共党史和地方志互为补充的综合反映本地文化历史面貌的刊物，深受各界人士支持和欢迎。

本市政协自开展文史工作以来即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爱护。仅编者从事这项工作六年中，就收到读者、作者及有关单位的书信数十封。其中有询问、索书的，有赐教、正谬的，有谈读后感的……这些无一不是对本刊的爱护和对编者的鞭策及鼓励，对以上信函，编者均已一一致谢和作答，在此再次致谢！

由于篇幅所限，本辑仅选三封信函刊载，其中二封的内容是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与第四辑的纠误有关的。从而既还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性又供已有第四辑的朋友参阅。

南 京 大 学 函

麻城市政协文史办
负责同志：

作为我馆重点藏书之一的文史资料，蒙各地文史办支持，使我们这方面的馆藏忝居大学图书馆前列。然而由于我们工作尚欠周到，联系渠道不畅，乃致贵地文史资料未能收藏齐全，诚为憾事。

现列所缺期数，不知可否为我馆每辑各配4—5册，倘获慨允，不胜感谢！书款我们马上就可以汇上。

下列有☆号者均祈代为补缺，除注明册数者，均请补4—5册，烦费心。

若早期出版者已售缺，能否借出该期挂号寄给我们，我们复印后即挂号寄回，决不会损坏，请放心。

贵单位编好其他史料，请赐一目录，俾我们选购。

我馆联系人：许进同志。

通讯地址：南京汉口路22号，邮政编码：210093。

请给予支持，谢谢！

祝

秋安

南京大学图书馆 采访部
(主任)陈远焕 敬上

94年10月

武汉余品礼先生来信（二封）

志斌主编：

您好！李继尧同志带来的《麻城文史》第四辑收到，已转余佩鸿先生、品安先生等有关人阅。谢谢。

《麻城文史》办得好，很多好文章，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有可读性。

佩鸿先生知道不少家乡的、家族的先辈们的革命活动，除《武昌文史》、省政协文史资料和贵刊连续两期登载的几篇外，还有几篇正在写，因健康欠佳，尚未脱稿。他说争取月内可望再送一或两篇去。

第四辑的几篇材料，有几处错字，有的作了勘误，但仍有遗漏。一般的错字，一看便知，问题还不太大；而余万卿的那一篇，则好几处都很关键，如：

P81第六行“值”应为“假”（此字就很重要，不是正值日知会组织同盟会，而是余诚从日本回国后假日知会之名来发展、组织同盟会的会员和机构）。又如：

P81第三自然段从倒数第一、二行两处“简斋”起，到P82、P83全部“简斋”十余处，均系“万卿”之误。可能是文稿上二人同时出现和称呼上同称“公”“叔”等，审稿时容易混淆。

实际上他们是两个人，是族间兄弟的关系：——

余简斋（1884—1910）一般称余诚，名淑璜，字仲勉。留学日本时入同盟会，被孙中山派为湖北分会会长。回国后假日知会，组织机构，发展会员，发动起义。公开身份则是武昌翻译学校校长、文华大学教授。因积劳成疾，于辛亥的前一年逝世，时年26岁。

余万卿（1886—1930）字淑文，又名蔓菁，则是军人出身，共进会成员，受余简斋、余祖言等影响，参加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共进会的活动和首义后左军的一系列活动，失败后组织过“鄂东护法军”任总司令，北伐时任过老河口市公安局长和湖北省盐税局长等职。

把二人混淆，别的报刊也发生过，我曾在“余诚轶事”一文附中说“江汉早报”1985.10.10“有一篇《余简斋遁迹龙潭寺》的短文，就是把余万卿伯祖的事和诚公（简斋）混为一谈了，借此予以澄清”（见本辑 P90 诚公材料，万卿本人材料第二自然段也提到此事）。

因为是张冠李戴，应予更正才好，且错处较多，发勘恐费笔墨还不易引起注意，达不到目的。建议下一辑专门作个说明或者来函照登，以免在历史资料上和社会流传上把二人搞混了。可否请酌。顺问，

道熙编委近好，第四辑范公两篇文章，事联身世，文关事业，感人至深，佩鸿先生说，范赓尧先生曾授业于余祖言公，令尊为养蜂跑遍大半个中国时，在五、六十年代和过去他在麻城任督学时，都曾有过交往，至为在念，特嘱意向范公致虞。谨此敬祝

编辑诸公都好！

余品礼敬上，1993.6.23

志斌主编：

您好！我的那封读者来信，承蒙赐复，并作了安排，至为高兴！

因为等佩鸿先生的文稿，拖了几个星期，迟复为歉。

佩鸿先生（我叫六伯）知道些家乡的（如屈子厚、蔡济璜）家族的（如辛亥革命的余诚、祖言、万卿）及大革命和抗日时兄弟们参加党的地下活动的情况。他想在晚年，整理成文，留给后人。已作了些工作；还想继续作一点。因健康欠佳、效率很慢。此稿就拖了很长时间。他已85岁，前患癌症，自己不知道（耳聋，得以能有效地瞒住他而精神未垮之故也）因此，用脑不能太久，手也颤。故此稿须重抄。遵嘱作了点必要的调整 and 精减。

此二稿主要内容是二人在大革命和抗日的活动，有影响的是开国粹馆设联络站一段，原想写一篇，因这前后活动不一样，有的涉及家乡当时的革命形势背景（如夏逢时袭击东乡的农民协会、抢劫县城和阎家河；郑琪玉在4·12后屠杀人民）作为背景资料反映进去，故以两篇为好，对资料保存有用。本来想把地下活动写具体点和写一点情报到豫鄂皖后的作用，专叫余佩炯从沙洋来，然他不是党员只晓得开秘密会而不知内情，道听途说也说不准确。当事人已经作古，韩东山也于前几年去世（我曾在湖北军区司令部任过参谋，如韩还在，文章内容就具体些了）。佩鸿先生也不是党内人员，能写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把这段历史的某些背景留个资料而已矣。

范公如来省，请来寒舍一叙（继尧兄也说下半年可能来汉），我已未上班，正在办离休，一般不去办公室，故勿先

找公园，请径来：汉口武汉剧院村10号7楼2号，最好先打个电话，道熙兄如来，亦如是，请代问他好。专此敬颂

文祺

余品礼敬上，93.7.31

武穴张文振先生来信

麻城文史编辑同志：

你们好！

我是麻城蔡店河乡人，在武穴工作，已离体。在武穴政协偶然看到麻城于92年编写的文史资料第四辑。家乡文史，读起来倍感亲切；尤其吴伯厚先生遗稿，《六十年来麻城教育史简略纪要》有的是耳闻目睹，有的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如47年学潮、学校生活等）。吴伯厚先生又是我的老师，所以读起来更觉亲切了，但其中也有少数地方不够准确，特提出来以供参考校正。

一、一九四七年春，县中学生与国民党转业军官打架时的县长不是“占建峰”（154页二行1—3字）而是郭维，监利人，以国民党师长而当县长，就因为学潮而调走的。接他的是一位姓宴的。47年秋刘邓大军南下后，罗文郎当过一段县长，罗在宋埠被俘，才是占剑峰当县长（是剑而不是建），占当县长是1948年的事不是1947年。本来国民党谁当县长都是反动的，好像在文字上无关紧要，但这是历史，还是以正确为好。

二、150页第六行六字、七行18字、10行17字的“痢疾”似乎是“疟疾”之误，哪有治疗痢疾用奎宁丸的呢？只有疟疾用奎宁丸治疗。同时，抗战时期，山区的疟疾也特多，请

查正。

三、另外注释（一）中，翰林、报贡两条也不够准确。

①“翰林第一名为状元”，不对。不是翰林的第一名为状元，而是进士第一名为状元。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统称进士，故进士的第一名为状元。误认为“翰林第一名为状元”者，是不是对会试、殿试的内涵未弄清，所谓会试就是礼部试，录取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随即全部贡士参加殿试，录取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因为会试的贡士往往全部录取进士，所以人们只知道进士，往往不知道有贡士，而且误认为会试录取进士了，甚至把殿试当成考翰林。其实，殿试的进士与会试的贡士、乡试（省试或称院试）的举人、报贡都是科举功名，用现在的话说是学位（或称学衔）的名称。（如同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而翰林，其全称应是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官署，庶吉士是官名，所谓指庶吉士是也，与学衔并不是一回事。但翰林与进士有密切关系，状元照例入翰林院为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进士名次高的为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点翰林）。由于翰林庶吉士是天子“备顾问、作智囊”的近臣（即秘书班子），又是天子从进士的高名次中钦点，外放官职得缺有优先权，所以“清贵”倒是事实。其实前面的“翰林”条与后的“庶吉士”条应合并写才是，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教习三年后，有散馆考试再分三等，一等授编修拟议（留翰林院），二等发各部为主事，三等为知县。

本文史四辑“翰林余晋芳”篇（49页）中有句“钦点翰

林……官可大哩，户部主事”（51页10—11行），其实是庶吉士散馆的二等授职“主事”是六品官员，户部主事相当现在财政部的一个处长，官并不大。（那时要五品以上官员才能参加早朝，主事还没有早朝资格呢！）

②报贡不尽与优贡同，更不是“没有定期……在有特大喜庆时，特开的一科”，根本不同于恩贡。明清禀生入得（即进学为秀才）发迹的途径有二，其一为乡试中式（中举），其一为出贡。所谓贡，即贡入京师国子监，犹今之中学升入大学也，贡有五类，副贡、岁贡、恩贡、优贡、拔贡是也。

副贡：乡试不得正榜而得其副，如今之录取备取生。

岁贡：每岁府学贡二名，县学贡一名。开始是选学行兼优者贡之，其后，但取禀生年资最深者。故禀生最多12年必出贡。

恩贡：国家有庆典，如皇帝登极、幼帝亲政、开恩科，以其年应贡的贡生为恩贡。

优贡：大致如169页的注释所注，但又不尽是。学政三年任满，将生员中有学有为之士，考选送部酌量擢用。其额大省六名，中省四名，小省二名。但清同治前只得入国子监，同治后方许照拔贡之例，一体朝考，取者，以知县、学官录用，不取者谓之回头贡，无所用之。

拔贡：明代称选贡，清代定制，每12年考选拔贡一次，每县限一人，考试年定为酉年，由学使考取之，故拔贡与是年中式的举人亦称同年。得拔贡者，次年入京，由礼部奏请廷试，取入一、二等者，保和殿复试，再取一、二等者以七品小京官或知县、教职分别任用。取得小京官者，不可考军

机京章（小军机）；如词翰出众，得军机大臣赏识，则腾达极易。所以一般贫寒之士，往往以争取考拔贡为入仕途捷径。

我族间，曾出过一家伯、侄、侄孙相承，三代拔贡，我的族曾祖张文藻先生，道光17年（1837）丁酉科拔贡，铨选八品教谕。族祖张穉唐先生光绪11年（1885）乙酉科拔贡，次年丙戌科朝考一等，钦点七品知县，历任河南九个县的实任，很有政声。其在河南淇县任内，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曾接待过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避难西安“回銮”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叫办皇差）。后迁直隸知州（五品）以三品封典花翎致仕（即按副省级待遇退休），诰封通议大夫。民国初又复出作过一任商城县知事，民国八年在湖北厘金局任内逝世。我的族伯张叔远先生，宣统元年（1909）己酉科拔贡，候选直隸州州判，民国后未曾作官，以教书为业，即吴伯厚先生在《六十年来麻城教育史简略纪要》中写的死于阎河小学讲堂上者。（148页）

由于我是二代拔贡张穉唐先生的嫡孙张孝咸先生的学生，故对拔贡及各类贡生，知之较详。

文字粗俗，请恕冒昧。错误之处，还请斧正。

致

敬礼

张文振，住武穴水泵厂

94.11.9

编 后

当麻城市人民仍沉浸在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麻城的幸福情感之中时，《麻城文史》第五辑即将付印了。这不是巧合，是缘分。

今年，麻城人民欣逢盛事，喜讯接踵而来，尤其是丹桂飘香的时节。本辑资料编辑出版亦恰逢其时。9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麻城视察；今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来麻城视察；9月1日，京九铁路北京至深圳开通往返首列旅客营运列车；9月28日我市隆重举行建市十周年庆典；实现新老城区对接，基本上形成了中等城市雏形……

这些喜事、喜讯均是我市现代史上的辉煌篇章，必须载入史册。作为《麻城文史》刊物的工作人员的我们，自然是重任在肩，责无旁代。因此，本辑资料除原已征集整理的有关史料外，我们将以上珍贵资料包括90年乔石委员长和94年吴学谦副主席视察麻城的情景，在目录中增设了三个新栏目：“来自北京的关怀”、“市庆欢歌”和“大京九”。值得欣慰的是，以上资料综合收录成书，在本地可能是本刊“抢占先机”，就政协应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社会主义旗帜”的宗旨而言，也应当是当仁不让的；同时也让我们再一次深刻领会中央领导视察麻城的指示精神，再一次感受

来自北京的关怀和温暖，为此，我们感到幸运，亦感到自身所作之不足。因而，在本辑资料征集、整理、编辑过程中，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亦感知识和经验之不足。其心情有如婴儿在母腹中躁动：企盼、沉重、欣慰、担心。截至草拟本文（11月3日晚）止，今年市政协文史委已开展了六次活动，其中四次是专门研究本辑编辑、出版事宜的。本委一位成员曾说过，办任何（有益的）大事，不怕“不重要”，就怕不重视。意即只要领导重视了，再难的事也可以促其办成。

本辑文史资料能够付印，取决于文史委96年9月20日也就是江总书记视察麻城后的第二天，在新华书店召开的那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李蔚青主席亲自委托分管机关的副主席郑科元同志主持的。郑主席在会上说：“本届政协的文史资料出版工作一定要破零”，“借贷款也要出书”，“一定要让江泽民总书记等领导同志视察麻城的情景尽早载入麻城史册。”这些话既是婴儿出生的助产士，又是营养品，既是工作动力，又是工作压力。与会人员明确地意识到，这既是业务任务，更是政治任务；既是我们的荣幸，又是领导的重托。我们只有竭尽全力，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力求完成好这一光荣、严肃的任务。从这天起，在李蔚青主席的支持下，从资料内容的征集、出版经费的筹措，到图片版面的设计，郑主席都亲自筹划和督办，使本委成员深受感动和鼓励。也是从这天起，我们的编辑工作进入倒计时，自动取消假日，有时夜以继日。

在书稿送厂付印之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导的支持和有关方面的协作。在此，借印刷厂的铅字印下我们的心里话：谢谢领导，谢谢你们！同时感谢市文化局和新华书店、

市广播电视局、市化工机械厂的负责同志和朋友们，为我们提供了决定此书出版命运和策划的会议场所。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阜九铁路指挥部、麻城报社、有关乡镇、市直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学术界、文化界许多人士在感叹“出书难”，尤其是严肃文学。如今我们也有体会了。然而这个“难”，我们总算克服了。这再次印证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真理。

如果把我们比作酿酒师的话，主观上我们想奉献给社会和读者的是一杯色香味佳的美酒。然而，由于编者的学识和认识水平所限，自知难尽如人意，有负领导重托和读者厚望。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不吝赐教。文史资料的功能是“以史鉴今”在吸取历史营养，提高道德修养、改进工作等方面，我们的工作岗位则是“近水楼台”。今后，我们在学史、写史、编史过程中，尽可能地吸取历史营养精华，力争“酿”出人们喜欢的好酒来，同时让人格和学识得到升华和增长。

编者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

《麻城文史》第五辑编辑委员会

顾问：李蔚青（市政协主席）

主任：范志斌

副主任：蔡昌益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邹永浩

严顶文

范志斌

程敬顺

蔡昌益

责任编辑：

范志斌

程敬顺